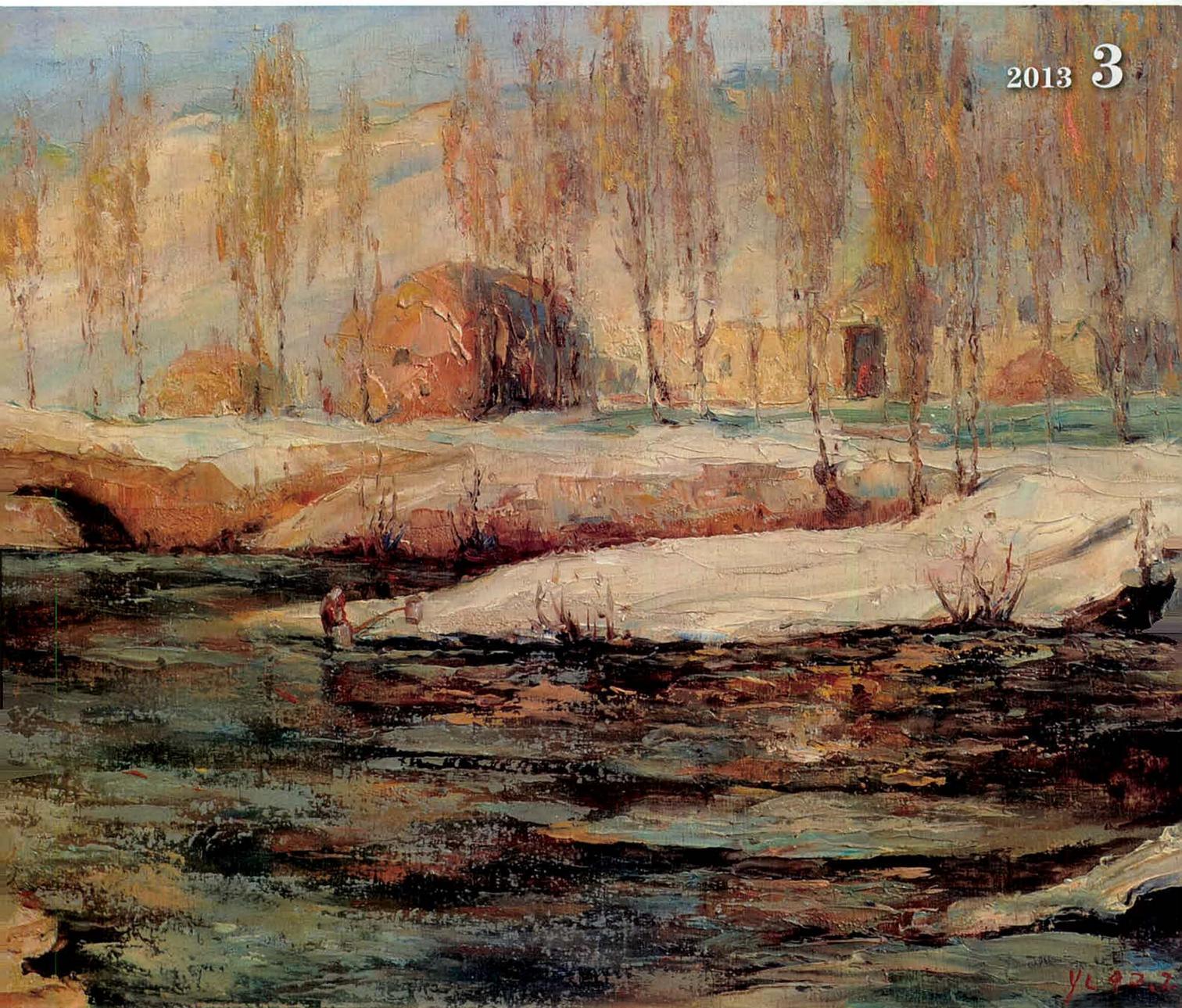




# 甘肃史志

2013 3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组织干部职工向岷县漳县地震灾区捐款



7月22日7时45分，岷县、漳县交界发生6.6级地震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消息传来，深深牵动着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干部职工的心。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在第一时间向定西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并岷县、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负责人打电话慰问，表达了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对灾区广大地方志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深切的关怀。在为灾区人民祈福的同时，7月26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干部职工踊跃为灾区捐款，奉献爱心，共捐款6800元。



# 做好地方史志工作是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现实需要

## ——三论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意义

钱 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学习历史，对每个人都有用。古人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就是学习历史对于人们立身处事的重要性。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其学习历史的作用更大、意义更为重要。首先，学习历史有助于领导干部加强政治修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要不断兴旺发达，就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忘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断的发展史；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独立富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的创业史。深入学习这些历史有助于领导干部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体会成败兴衰、荣辱得失的经验教训，从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次，学习历史有助于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历史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提供有益启示。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多了解一些历史事件、多掌握一些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和胸襟，在认识问题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内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需要深入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很多。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需要通过学习历史来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在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中准确把握现实、正确创造未来。第三，学习历史有助于领导干部增强工作能力。历史是现实的

镜鉴，历史的经验值得吸取，历史的教训值得警戒。历史上关于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思想十分丰富，包含着许多为政用人、做事故业的深刻道理。尤其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中披荆斩棘、不断开辟胜利道路，展示出了令人惊叹的勇气、智慧和力量，展示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干部学习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可以从中学习借鉴如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学习借鉴如何驾驭复杂局面，确定合适的工作方法和思路，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一个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是最权威的地方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当地委书记时就讲到：“我来宁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他还讲到：“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才能使人们从一种混沌状态，转为一种清楚明白的状态；才能知道过去人类社会种种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做好地方史志工作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学习党史、国史的学习要求，更是对地方史志工作者提出的工作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编修好各级地方志书、年鉴，并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史志工作机构的资料 and 人员优势，编写出更多的地情资料和历史文化丛书，以满足各级领导干部和全社会读志用志、学习历史的需要。



# 甘肃史志

## 季刊

2013年第3期  
(总第15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 卷首语

做好地方史志工作是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现实需要

——三论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意义

.....钱旭(1)

### 工作论坛

主动融入大局 服务转型跨越

——努力推动天水市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

.....蒋晓强(4)

### 志鉴编研

浅谈《年鉴》资料报送中的几个常见问题 .....阎晋平(6)

史志几个常用语之我见 .....李拾良(7)

地情资料搜集与应用 .....魏惠萍(11)

### 史海钩沉

浅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文化与医药 .....桂霞(13)

甘肃汉、藏、回民族的构成成分探索 .....陈启生(15)

货郎蜀道行商的民间传说 .....彭战菽(23)

### 史地考证

商周时期甘肃部落氏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刘光华(29)

兰州黄河河道变迁与生态环境 .....薛方昱(37)

汉代屋兰县遗址——东古城 .....黄杰(42)

### 理论研究

陈云与知识分子“异己”论的矫正 .....王杰(44)

# 录

## 陇原人物

从容赴北去 誓死灭倭寇

——抗日英雄令光琪二三事…………… 包永庄(52)

烈火铸信念 风雨见真情

——习仲勋与金天华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

…………… 金侠云 姚婷文(54)

清代隐士阎佩璋…………… 常登成 赵永全(60)

## 乡土民情

岷州遗风…………… 潘硕珍(63)

## 转载

《水经注》选登…………… (67)

## 简讯

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第一次评审会议召开 …… (79)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78)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观

八路军驻兰办事处…………… (10)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全力推进教育实践活动

深入展开……………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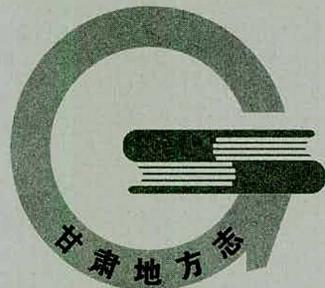
天水市志办总结 2013 年上半年工作

安排下半年工作…………… (43)

酒泉市政府副秘书长、史志办主任孙占鳌

督查县(市、区)史志工作目标责任书

完成情况…………… (53)



##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 任 编 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 期 责 编:高天成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 子 邮 箱:g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 主动融入大局 服务转型跨越 努力推动天水市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

天水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蒋晓强

地方史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个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承担着“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功能。加快推进地方志工作,为特色文化大市建设提供服务,在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地方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地方志工作作为本县区、本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以对人民、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好修志编鉴等工作,为推动天水转型跨越发展、与全省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一、在保证质量上下功夫,努力推出精品良志。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志书不同于普通的书籍,具有为党为国为民立言的重要历史传承功能,记载的内容不仅要客观、公正、准确,而且要体例规范、行文专业。因此,要始终把志书质量放在第一位,把精品意识贯穿于志书编纂的全过程,正确处理质量和进度的关系,以科学认真的态度,严谨务实的作风,全面准确地总结和反映全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主要成就、宝贵经验和地方特色。要严格执行志书质量管理规定,认真落实“一评三审”制度,建立健全志书质量控制和责任体系,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把好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保密关和审核关,确保所写的志稿观点正确、内容翔实、体例完备、特色鲜明。要下气力解决志书篇目编排没有新意,志书体例不够严谨,

收录资料不够翔实,志稿差错率偏高等问题,精心编修,反复推敲,仔细打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抓好志书编纂质量管理,努力编纂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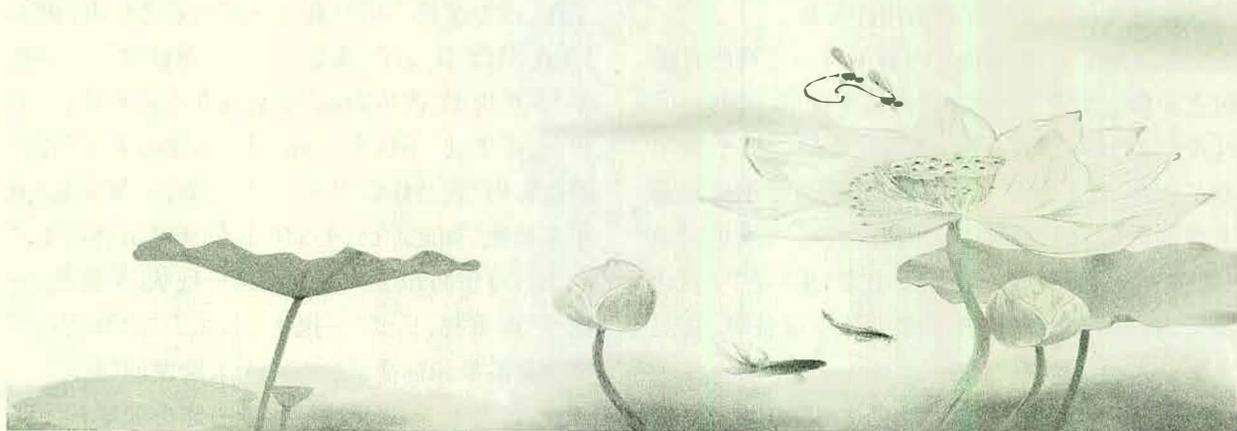
二、在加快进度上下功夫,按期完成二轮修志。编纂出版第二轮志书是指令性任务,是“十二五”时期全市地方志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市二轮修志业务开展正常有序,普遍进入攻坚阶段,评、审、修、撰、排、校工作同步开展。按期完成二轮修志任务,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难度相当大,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确保二轮修志计划的如期落实。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修编进度。地方志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一部志书是一个整体。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倒排时间,细化任务,靠实责任,加快进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好攻坚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志任务。要紧扣时代发展大势,创出地方志书特色。二轮志书所记载的历史时期,是天水经济社会发展经历的一个不平凡时期。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地记述这段时期内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就要对这段时期的情况有一个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要突出时代主旋律,加强调查研究,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广泛收集地情资料,深入研究编纂内容、组织形式、体裁体式、记述方式,力求材料真实可靠,观点鲜明正确,内容充实深刻,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确保使二轮志书符合时代特征、具有地方特点、经得起历史检验。

三、在创新形式上下功夫，提升年鉴编纂水平。综合年鉴信息量大，编辑出版周期短，集资料、数据、知识于一体，是反映各行各业年度发展情况的综合性地情信息资料，是展示各级各部门年度发展成就的重要平台。要加大创新力度，找准工作切入点，完善业务培训机制，切实提高年鉴撰稿队伍的专业水平，推动年鉴编纂和出版发行工作正常化、规范化，努力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天水年鉴》作为市委、市政府的年度公报，记载着完整、翔实的市情资料，是展示全市地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总纲目。要积极探索创新编纂体例、行文风格和编排形式，关注群众热点，体现社会民生，凸现天水特色，进一步增强《天水年鉴》的权威性和可读性，提高编纂质量和出版水平，更好地发挥《天水年鉴》存史资政、传播交流的重要价值。

四、在开发利用上下功夫，提高服务发展能力。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要使地方志作为地方权威文献，被社会、被文化研究者所广泛采用和引证，从而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要切实增强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意识，整合地方志资源，拓宽用志渠道，积极探索服务发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的新思路、新机制、新途径，真正让地方志成果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要广泛开展读志、用志和宣传志书活动，推进志书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军营、进农村，扩大地方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要整合各级地方志协会和相关研究力量，围绕学科建设及地方志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开展课题研究，深入挖掘整

理，多出研究成果和地情丛书，为群众提供多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的地情资源服务。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加快构筑志书开发利用平台，努力开发一批可听、可视、可读、可体验的地情产品，让志书深入千家万户，满足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需求。要把地情网站建设纳入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加快信息基础建设和网站改版升级，做好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与地情信息资源开发相结合的文章，提高地方志系统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建设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综合性地情信息平台，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优秀文化，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五、在加强领导上下功夫，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地方志工作涉及面广，工作周期长，任务繁重。要继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必要的工作措施，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努力做到领导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要高度重视修志队伍建设，加强业务培训，改善知识结构，构建起既包括一批综合素质较高、年富力强的专兼职方志工作者，又有一些专家、学者和熟悉情况的离退休老同志共同参与的修志队伍。地方志工作者要发扬甘于清贫、默默奉献的优秀品质，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努力塑造方志队伍的新形象。要严格落实修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对修志编鉴工作的督查和指导，确保修志编鉴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 浅谈《年鉴》资料报送中的几个常见问题

阎晋平

应当说,经过几年的编纂,各单位对报送年鉴资料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即使存在问题,也不是大问题。但实际情况是,符合体例和标准要求的资料占比并不大,多数资料都是同质化、同条名,没有特色可言,放在一起比照,除基本业务内容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乡镇,只要换个地名,下面的内容就能任意“嫁接”了。这些问题,主要是“一捆草”、“放空炮”、“戴错帽”、“剥洋葱”、“泼凉茶”。

“一捆草”,就是以工作总结代替年鉴资料。懒得动手,懒得思考,毫不顾及年鉴资料的词条性和服务现实的功能性,只要是认为有利于为本单位工作“增光添彩”的,有用的、没用的,实的、虚的,就一齐充塞进去,使资料冗长繁杂,有如一捆乱草,清理起来既费时又费力,无形中加大了编辑难度和成本。

“放空炮”,就是以空泛议论代替年鉴资料。这问题是明显违背“述而不论”原则的,不是让数据和事实说话,而是直接站出来讲,动辄“在…领导下”、“在…指导下”、“抓住…契机”、“坚持三…四…”、“以…为抓手”、“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等等。这样的“空炮”没有任何资料性和实用性可言。

“戴错帽”就是词条与内容不符。虽然比直接报送工作总结进了一步,把资料也批成了词条,但这仅仅是“形似”而不“神似”,也就是说样子像年鉴了,但内容不是年鉴,因为词条的意思不能涵盖下面的内容,词条“姓李”,内容“姓张”,或是词条“姓李”,内容既姓李,又姓王。比如词条是“项目建设”,内容中又出现购置了多少计生设备等,含混不清。

“剥洋葱”就是材料没有重点,没有中心,主次

不分。虽然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机构的“主干业务”是基本确定的,不可能一年一变或几年一变,但每一年的“类工作”下的“属业务”却是具有不同特点和亮点的,必然有其年度重点和年度中心。一些单位往往“数年一词”。或者一个条目下的内容尽是“细枝末节”,没有“主杆”。如写“作风建设”,学了什么文件,开了什么会议,干部职工工作了多少笔记,领导进行了几次督促检查,但对核心问题和具有说服力的成效却一笔带过:“通过开展作风建设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作风进一步转变,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就这样,“洋葱”剥到最后,你就会发现除了皮还是皮,哪有“心”?

“泼凉茶”主要指“领导班子名录”而言。在同一年内,由于组织人事的调整,同一个岗位有可能先后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任职。而在次年报送资料时,却有意无意地只报送现职,将年度内曾任者则摒弃于“领导班子名录”以外。这种“泼凉茶”式的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年鉴中年度人事资料的缺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有可能被大多数人“认同”。

在年鉴资料报送中,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主要原因是一些部门和单位的“一把手”不重视这项工作,认为这是一项没有“门槛”的业务,即使做不好,也不会“让位子”或是少一笔“项目款”。“一把手”不重视的“次生影响”就是承办人员不热心、不积极、不主动、不认真、不钻研。而承办人员的“扩散性影响”就是你做我学,此行彼效,今年如此,明年亦如此。如此而已,他们报送的年鉴资料可用度大小就可想而知了。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是“一把手”要重视,只要“一把手”重视了,所报送的年鉴资料质量和标准就会有一个大跨度的提高。

(作者单位:甘肃会宁县地方志办公室)

# 史志几个常用语之我见

李拾良

在史志工作中,有一些词语耳熟能详。听得多了或看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受到这些观点和提法的影响,被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长此以往便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还不容易改变,往往会导致轻信和盲从的结果。如果对这些司空见惯的词语作深入的研究,便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如果在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些词语的基础上,联系工作实际和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一、甘肃有八千年的文明史。

甘肃有八千年文明史的观点,其依据是秦安大地湾遗址的文物遗存。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硬度相当于低标号水泥的地面,都证明甘肃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现在社会上不少人都认同这个观点,其实这个观点或者说法是不正确的。甘肃并没有八千年的文明史,大地湾遗址的文物遗存也并不能证明甘肃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里的问题出在文明和文化的不同含义,尤其是在历史的层面,决不能混淆文明和文化的区别,应该说甘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不是历史文明。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的产物,具有较高的文化形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类文明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阶段。

关于文明史,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sup>①</sup>。”人类历史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史,而文明史则与阶级有紧密的联系。在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有所发展,随着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在部落内部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其中,富人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奴隶

主,穷人和战俘被沦为奴隶。从出现阶级这一点来看,已经是奴隶社会了,但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则被认为是奴隶社会开始的主要标志。夏禹在位时,已经把禅让制变成了终身制,禹的儿子启杀了禹的继承人伯益,将终身制变成了世袭制。这个故事说明,当时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已经彻底瓦解,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也由此开启了中国的文明史。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

始于我国夏代的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国际上是不被承认的,由此引起的争论由来已久。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金属冶炼、特别是城邦国家的出现,必须以当时社会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证明。国际上认可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殷墟位于河南安阳,距今约3300年。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遗址,早于安阳殷墟,距今约3570年。考古依据: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的标志性器物——司(后)母戊铜鼎;城邦国家的物质形态——城垣遗址。因此,甘肃有八千年文明史或华夏文明八千年的说法都不能成立。

分清文明和文化的准确含义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2013年6月,每年一度的颇有影响的兰州国际马拉松赛和兰州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兰州街头出现“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的横幅标语<sup>②</sup>。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要让世界了解甘肃,让甘肃走向世界,首先要有严谨务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杜绝一切虚假的宣传和虚张声势的标语口号,以免造成事与愿违的不良影响和后果。史志工作者更需要弘扬

这种精神,做到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对人民负责。

## 二、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此语源自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质疑并考证,认为这条史料至少有夸张之处,不可信以为真。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当时陇右这块地方是很富裕的,但依据“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句话,一定要说“天下第一”“全国之最”,就有自我膨胀之嫌。唐代在陇右及河西地区采取屯垦实边、发展生产、扩大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又经历长期相对安定的和平发展时期,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状态,史称“开元之治”。陇右的发展繁荣是全国的缩影,但与关中平原的京畿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为什么史学家司马光还要这样说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强调“是时中国盛强”;二是突出盛世危局;三是强化鉴戒作用。唐代在陇右地区经过长期经营,使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陇右属关中原的外围地区,周边多为游牧民族控制区,陇右的稳定,就意味着国家的稳定;陇右的繁荣,更能体现出国家的繁荣;而稳定和繁荣的丧失,则更加具有震撼力和警示作用。此时唐王朝已处于安史之乱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是时”为天宝十二载(753年)。之前的天宝十载(751年),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边兵近二十万。十一载(752年),宰相李林甫死,杨国忠(杨贵妃的族兄)继任宰相,兼领四十余使。从此,专决朝政,公卿以下,均受其颐指气使。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即司马光所指“是时中国盛强”的第三年,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此,祸乱继起,兵革不息,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盛唐的景象不再。唐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东移,陇右乃至西北的“社会经济虽有局部的、暂时的发展,但总的趋势是停滞甚至

倒退的”<sup>③</sup>,并逐渐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明显差距。“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的绝响,同样也成为史学家司马光留给人们的思古之幽情。

司马光是一个聪明人,“司马光砸缸”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与《史记》齐名的史书,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一个方面来讲,史书都包含着作者的思想观点,而这些思想观点可与后人评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句话,有其特殊的语言环境,同时,由于汉语言文字的简略、概括和蕴含丰富的特点,对这句话还可以作更宽泛的理解。比如,司马光在同一部史书中评说李林甫,“世谓口有蜜,腹有剑”。如果把“天下称”和“世谓”作一类比,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广泛流传”“大家都说”“普遍反映”的意思,“天下”或“天下称”都为泛指,只不过司马光用“天下称”来说事,而用“世谓”来记人。

## 三、盛世修志。

盛世修志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也是无论官方或民间都乐于接受的一种说法。一般认为修志是文化建设,需要和平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时要有一定的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但是自古以来大量的修志实践证明,这种大家普遍接受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志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保证了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名志佳作,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修志作为一项文化传统,成为历代地方官员名流、文人学士义不容辞的责任,保证了修志活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连绵不断,世代沿袭。历史传承是志书的客观功能,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文化传统则是志书编修事业内在生命力的体现,具有自我发展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规律性。甘肃修志始于汉,盛于明清。至清代,地方官员就有“征粮、断案、修方志”的说法。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官府都曾成立专门的机构编纂志书。现存的甘肃省级志书《甘肃通

志》《甘肃新通志》和《甘肃通志稿》，都不是在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编修的。

清代(乾隆)《甘肃通志》(又称《敕修甘肃通志》)。这是清康熙六年(1667年)陕甘分治以后甘肃历史上的第一部省志,雍正年间编纂,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由甘肃巡抚许容监修,李迪等编纂。全书50卷,36册,约88万字。据有关资料记载,雍正皇帝是一位勇于改革、勤于理政的杰出政治家。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了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雍正统治的13年是清朝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为以后乾隆时期的繁荣鼎盛奠定了基础。雍正执政的时间不长,是一位过渡性的皇帝,正是在他短暂的执政期间,推动了全国的志书编修。

雍正是一位勇于改革的皇帝,同时又是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富有争议恰恰与改革密切相关。即是贵为天子,要想有所作为,也会面临许多难题。因此,雍正皇帝刻下了一枚“为君难”的印鉴。“为君不易,情深不寿”。雍正在位13年,享年57岁(1678—1735年)。影响最大的民间传说篡改遗诏和荒淫暴死之说都是站不住脚的。而现存大量的批阅奏折和推动全国志书编纂的事实,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第二部甘肃省志为清代(宣统)《甘肃新通志》(又称《甘肃全省新通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始编纂,由陕甘总督前任升允、后任长庚监修,前任总纂丁喜翰、后任总纂安维峻。成书时间是在末代皇帝的宣统年间,但究竟为哪一年说法不一。《甘肃方志通览》第89页表述为:“宣统元年(1909年)成书,凡100卷,81册,计325万字。”第219页认为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张维《陇右方志录》则称宣统二年(1910年)成书。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张维之说可能更接近事实。

据记载,“全志上溯开天辟地,下至宣统元年,记述甘、宁、青三省之事。”如果志书下限为宣统元年,则当年不可能成书。而该志凡例又说,“由于此志工程庞大浩繁,仅费时两年而成……”好像又支持宣统元年成书之说。但仔细分析,则可理解为定稿,不包括出版印刷时间。在该志卷首有成书呈报

之文而无具体落款日期,是否呈报都是疑问。从志书编纂的一般规律来看,两年时间成书似乎过于匆忙。另外,从志书的文字和内容来看,略显粗糙。对农、工、商、矿等经济方面的记述仅3000多字,存在文字过分悬殊、比例失当的现象。据此,我们可以把该志作为珍贵的史料而无须当作成熟的志书对待。清朝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完成一部煌煌巨著,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部甘肃省志未能成书,仅存写本,被称为《甘肃通志稿》。刘郁芬监修,杨思、张维、慕寿祺等编纂。全志上迄远古,下至民国17年(1928年)甘宁青分省。全书130卷,450万字。该志民国18年(1929年)开始编纂,此时的中国,正面临强敌入侵,时局动荡,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经过多方努力,历经艰难曲折,费时8年,终于在民国25年(1936年)编纂完成。志稿虽未成书,但从体例和内容看,与其他旧志相比,多有创新和独到之处,对前两部省志也有校正补阙。虽然存在旧志经济记述薄弱的缺陷,但是仍然具有较高的存史和使用价值。在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如能把《甘肃通志稿》列为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使它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将会弥补陇上学人的遗憾。

#### 四、天下方志半人物。

凡方志必载人物。在志书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中,传就是指人物。旧志记载人物以传为主体,附以表、录,或不设表录,除此之外采取以事系人的手法记述。在人物传记中,又分为众多门类,如:名臣、良将、义士、隐逸、儒林、孝子、烈妇、流寓、外徙等。旧志的人物传记倍受重视,刻意经营,所占篇幅较大,但能占到全志一半篇幅的似不多见。在我翻阅过的部分旧志中,仅清代《甘肃新通志》的人物部分几占全志的一半篇幅。全志计325万字,人物志多达150万字,占全志的47%。可见,“天下方志半人物”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方志的编纂实践中,对人物记述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般采取人物放入志书正文作为一篇(编)而不作为独立的体

裁,人物在志书中的份量大大减轻。旧志记载人物以传记为主,而逐渐演变为以简介为主,甚至不设传记,或名为传记、传略实为简介。入志人物少有按照传统的方法,以职业、身份和籍贯分类,在收入的各类人物中官员所占比重过大。分析上述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编志书,尤其是第二轮的续志,从总体看,入志的人物少、份量轻,从局部看,在入志的各类人物中官员所占的比重大,而前一问题又使后一问题更加突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切社会发展都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史志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史观,弘扬先进文化,使社会主义新方志充分体现时代的主旋律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志书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志书除了记述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社会状况、发展沿革、重大成就外,还要充分记述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展现他们的精神风

貌、道德情操、学术专长、突出贡献等。入志标准应以事迹和贡献为准绳,不单纯以职务和评奖级别划线。记述内容也应以主要事迹和贡献为重点,而不只是简单的人物介绍。志书要以其权威性树立时代的楷模,以其身边人和身边事的典型性来感染人、教育人、塑造人,同时也可以提高志书的可读性和影响力。总之,新方志特别是第二轮志书的编纂,应顺应社会变革的需求和民众的愿望,坚持改革创新,扩大人物记述的范围,强化对各行各业各类人才的记述,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倡导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功能,提高志书的人民性和社会性。

注:

-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 ②横幅在滨河中路市民广场西侧路口悬挂
- ③李清凌《西北经济史》第217~21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系省志办省志编纂处处长)

##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观八路军驻兰办事处

为增强教育实践活动学习环节的针对性,7月29日上午,省史志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参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光辉伟业,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接受党的传统教育。办领导班子成员一同参观。

全体党员干部先后参观了“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思想发动”、“实施西北开发”、“奔赴抗日前线”等展览内容。大家一边听讲解,一边看展出。一幅幅历史画卷,一件件革命文物,一个个英烈的名字,铭刻着那段让人无法忘却的历史。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条件下,依靠坚定的革命信念、

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这次参观学习使我办党员干部受到一次革命的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 and 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继承和发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决革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自觉做到自重、自醒、自警、自律,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更加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高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史志事业的健康发展中来,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力量。

# 地情资料搜集与应用

魏惠萍

地情资料内容包括:区域环境、人口、资源、组织机构、历史沿革、社会民生、现实状况、民间传说、事业发展和产业状况,主要工作进展情况、较大社会活动、重要成果、重要人物、存在的问题等。

## 一、资料种类

### 1.资料载体形式分四大类

(1)实物资料是指可以反映和传递历史信息的物体。如反映农业生产的土马车、石磨、水车、纺车、牛车、水磨、水烟枪、碾子、锡壶等,反映人民生活的粮布票、油票、糖票、肉票等票据。

(2)行为资料指今人行为中保留的历史沉淀。如各地不同的礼仪礼节。

(3)文献资料指人们对历史的文字记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地方各级单位编纂出版的综合、行业和企业性质的年鉴、年刊。二是地方文献,包括各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团体编辑出版的反映政治沿革、经济发展、文化源流、风俗民情的各类出版物(书刊、影音制品)和个人著述。三是地方及其主要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规划与重大计划、工作、工程(项目)、总结、汇报和调研成果、工作专题研究文章等图文、影音文献资料。四是史志、文史、统计、档案、高校和社科团体等单位形成的理论和业务研究文章及相关材料、人物生平事迹和传记等资料。

(4)口碑资料是指人们口头讲述的对历史的回忆。主要包括歌谣、民谚和方言。民间文化艺人的唱腔、唱词,能工巧匠艺人的加工诀窍和游方郎中的祖传秘方等。

### 2.资料存在形态上分两大类

静态资料:包括档案、报刊、史志族谱、图表照

片、私人著述笔记、网络、金石碑刻以及其他形成文字载体的资料。

动态资料:包括口碑、实地考察、民间传说等流传人间未形成文字载体的零次性文献资料。

## 二、资料搜集

### 1.方法

细化篇目,制订收集资料提纲。如《庆城县志(1986—2012)》栏目中的篇目:社会篇中的卫生,应从机构建革、医疗制度制定与改革、医疗队伍建设、医疗活动、医疗保健、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医疗卫生监督管理、爱国卫生运动、地方医疗资源利用开发、民间验方游方郎中的祖传秘方等方面列出提纲征集资料。

摸清家底,熟悉本单位档案馆藏。

明确分工,做什么管什么写什么。尽量收集自己熟悉的行业,专业术语不能改,这样基本可以避免专业性的错误。

抽调人员,专业培训,掌握规范。

全面发动,发函启事,社会支持。

重点采访,实地考察,专题调查。

如《庆城县志(1986—2012)》卫生篇中的歧黄养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篇中的养老保险;旅游篇中的特色景点及产品开发;教育篇中的“四制改革”等。

### 2.顺序——“六先六后”

先面后点 先内后外 先今后古

先易后难 先动后静 先急后缓

获取资料手段:抄录、复印、网络传输、照相、录像、刻录光盘、拓印、测绘等八种。数码相机是查阅资料的最有用的武器,数码照片可用软件转换成文字。

### 3. 线索——“四求”

因人以求。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如人物资料的收集。

因地以求。根据事件所发生的处所顺藤摸瓜，实地考察，并在与该地有关的文献中去查阅资料。如 2011 年 11 月 17 日正宁校车事件

因时以求。根据时间去寻物、寻人、寻事。

因类以求。图书目录学上有“即类求书”之说，社会分工、科学分类、档案保存都是分类有序

### 三、资料鉴别

鉴证方法书证：以文献证文献；物证：以实物证文献；

人证：以当事人材料证文献；理证：以逻辑原则和经验进行推理判断。

#### 鉴别资料“六准则”

- (1) 以时近的资料为准。“时近则迹真”。
- (2) 以本地的资料为准。“地近则易核”。
- (3) 以原始正式档案资料为准。
- (4) 以“三亲”的资料为准。
- (5) 以数说同证的资料为准。
- (6) 以符合逻辑的资料为准。

### 四、资料整理

(1) 形成载体。口碑资料要整理书面记录、文献资料复印备份、网络资料拷贝备份并出书面载体、实物资料要有记录和照片。

(2) 摘作卡片(或录入电脑)。一事一卡(目)、专志资料按篇目分类、大事记资料按时间分类、重要资料按专题分类。

(3) 分类归档。按主题、时间、事件、材料载体分类。编号造册：篇目分类号、主题年代号、资料种类号。健全管理制度。

### 五、资料应用

抓主题资料的应用。起始资料；梳理主线，形成主题线索，构建框架。过程资料：完善甄别资料；现状(结果)资料。形成资料长编者。

注意背景资料的应用。自然背景、社会背景、时代背景。为主题资料服务，说明事件发生的客观条件和背景。如网络的普及，人们对文化电影、戏曲的需求明显减少，导致地方传统戏曲文化日

渐衰退。

突出典型资料的应用。地方之最、时代之先、代表人物、代表年份。开展社会调查。撰写和整理专题调查，专记。深入各部门、家庭等进行访谈，捕捉典型资料，以文中附、专记、延伸阅读等形式，收录在正文中。如甘肃省 2012—2020 年联村联户活动，百名干部下企业等活动。

挖掘对比资料的应用。横向区域对比、纵向时代对比。对续志中社会现象与各种数据，重点对比起始年份 1986 年与截至年份 2012 年，中间的可以总结写出变化规律如教育中的高考人数

注明资料出处。搜集资料时一定要注明资料的出处、搜集的时间，因为资料需要不断地核实与考证。做到凡是资料都有据可查。资料的出处能够为资料的真实性和评审时提供依据。

建立健全方志资料征集制度。把修志期间的资料集中征集改变为常年征集，实现法制化、规范化和长期化，改变随机性、临时性和凭关系征集资料的状况。建立方志资料年报制度，由下一级行政区、部门和重点企事业单位把工作与事业规划、重大计划、总结、汇报、调研等重要文献汇编成系统资料，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方志部门报送。

资料汇编。资料汇编是原始资料的汇总，不需要编辑加工，按时间梳理、排序即可。100 万字的志书，涉猎要征集到 1000 万字的数据。将各单位提供的资料梳理分析、编排、润色、补充。

资料长编。按照续修方志所需资料和内容，按志书的体裁即述、记、志、传、图、表、录编排，形成文字长编。

(作者单位：庆城县地方志办公室)



# 浅谈肩水金关汉简中的文化与医药

桂 霞

肩水金关汉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出土了大量的简册,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价值之高均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以甲渠侯官(破城子)保存的完整册书最多,弥足珍贵。这些简册出土时或被堆储在一起,或与杂草、畜粪混合堆成积薪,或垫在圈底,或当作垃圾抛在各地,有的仍编联成册,有的编绳虽已朽断,但出土时仍保持册形,有的虽已散落,但还可以编联成册。从遗存简册和编绳痕迹来看,编绳有二道、三道两种,饶有兴趣的是新莽时期还有用红绳编联的。简册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各类簿籍等。此外,还有《九九术》、干支表、各种形式的历谱、医药方和《苍颉篇》《急就篇》等残简。特别是发现了详细载有长安至河西的二十个驿置的里程简,途经京兆、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等郡,对确定西汉时长安以西、敦煌以东的交通路线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一、肩水金关汉简记日办法

肩水金关汉简中,纪年简有 2000 余枚,这些纪年简,是研究两汉时期肩水金关一带历法的珍贵资料。

归纳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的记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不仅日序自明,而且可以核定百年之内的日序,同时也可以确定何月为闰月。

居延历谱,就其形制而言,可分为编册横读式、编册纵读式、横列直书式、单板纵读式和数板纵读式等五种形式。

1、编册横读式。系一年之历谱用 30 支简组成,每一简是一日。每简自上而下分为 13 个横格,第一格写日数,即自一日至三十日,均纵书。第二格至十三格为正月至十二月的干支,均横书,字小

于日数,自右至左。干支下记八节诸事纵书,字大于干支。闰月写于简背上端,也有写于正面的。

2、编册纵读式。一年历谱用 12 支简组成,每简为一月,闰月就多出一简,共 13 支。每简上端为月名,下列二十九或三十天干支。

3、横列直书式。一年历谱用 12 支简组成(有闰月为 13 支),每支简为一月,从右到左,横列直书。左边留有空白处可以穿孔。

4、单板纵读式。一年历谱书写在一个长方形板内,正面为正月至八月,反面为九月至十二月,仅记朔日、月大小,八节、伏腊等。

5、数板纵读式。正板面记七月、十二月建除神杀,背面记闰月建除神杀。这应是由六板组成之一年历谱。

## 二、肩水金关汉简记时办法

从出土肩水金关汉简考古证实,汉代肩水金关一带采用“刻漏之制”计时,即一昼夜为一漏,分为一百刻,一昼夜的太阳行程分为 18 个“时称”,以漏刻来计。依次为“夜半、夜大半、鸡鸣、晨时、平旦、日出、蚤食、食时、东中、日中、西中、时、下、日入、昏时、夜食、人定、夜少半”。其中“夜半”和“日中”平分日、夜之中。东汉初期民间流行 12 时称计时法,这 12 时称依次为:子夜半、丑鸡鸣、寅平旦、卯日出、辰食时、巳禺中、午正中、未日、申润时、酉日入、戌昏时、亥人定。

## 三、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医学

汉代肩水金关一带,中药已得到普遍应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和丸、散、丹、剂等治疗药物配伍,都能在出土肩水金关汉简中查到实例。

在肩水金关汉简中,发现有记载患病士卒的症状及医疗过程,记载了治愈、继续治疗、用了什么药、采取了什么办法等多项内容,这与今天的病

历很相似,所以,居延医简可以称之为我国最早的病历记录之一。居延医简中载有“四节不举”、“病苦心,腹丈满”等病症,实际上就是感到四肢无力和恶心、腹胀一类的疾病。

居延先民当时治疗疾病,就十分注意对症下药,边塞吏卒一旦生病,必须及时治疗,经医生诊断切脉后,根据病情开出处方,然后取药煎药。

肩水金关汉简中记载所用药物,可分为植物、动物、矿物和其他等四大类;记载的药物剂型有汤、丸、膏、散、滴等,以“分”为计量单位。简文中有如何用药、药物用量以及诊断方法、病情特征等记载。

#### 四、肩水金关汉简中的书法与书简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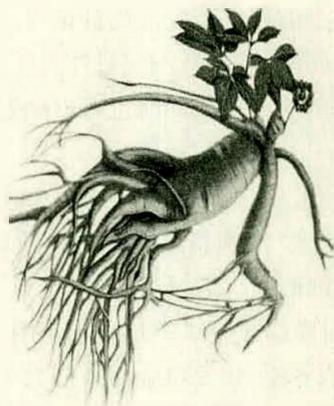
据《汉史演义》记载:“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据考证,肩水金关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为书信记事、或为公文报告,不拘形迹,以草率急就者居多。虽然肩水金关汉简受简面狭长的限制,但在书写时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肩水金关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俱有。目前,从肩水金关汉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时期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居延简牍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变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国使用简牍上起春秋战国,下迄魏晋乃至宋代,长达100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简牍书法在不断地成熟完善,从而形成一种简牍书法体系。汉字书写手法发展到秦汉之际,经过了简朴浑穆的雏形期和凝重流转的成长期,已臻成熟。这一点可以从简牍的书体上窥见一斑。虽然秦汉时代书法还没有进入自觉的艺术时代,但从简牍上书写的文字来看,书法已基本趋于成熟。从点画到结构,从布局到行文都极其讲究。工整的隶书端庄严谨、笔笔不苟、飘逸俊秀、爽爽有神;而大量章草简册,用笔自然简洁、运转流畅、衔接自然、中规中矩。这些简册多为下级小吏所书,由此可见,当时书法的整体水平是很高的。

肩水金关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章草即隶书的速写。肩水金关汉简文字用笔自然简洁,挥洒随意,变化流速而不拘束。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逸,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而这些肩水金关汉简多为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士吏和士卒所写,由此可见,当时的书法已经有了很高的整体水平。总之,秦汉之际,是我国书法各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在简牍出土以前,金石碑刻书法占据了我国书法史的重要位置。

肩水金关汉简中有不少书简抄本,如《相利善剑刀》,很可能就是汉代《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这是一本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简中阐述了区分善剑、弊剑及花纹的14条标准,涉及到剑的形态、纹饰、成分、制作技术、发展史等重要问题,对研究古代兵器很有参考价值。出土肩水金关汉简中发现有《九九表》抄本。据推测,“九九之术”起源于春秋时代,《孙子算经》全载为四十五句,居延《九九表》从一一如一到九九八十一,也是四十五句,从中可以证实,“九九之术”在两汉时期已被居延先民广泛应用。另外,还有《算术书》《九九术》《苍颉篇》《急就篇》《论语》等专著简以及各种形式的“历书”、“干支表”等。这些书简抄本字形工整,结构严谨,书法已基本趋于成熟。

(作者单位:金塔县博物馆)



# 甘肃汉、藏、回民族的构成成分探索

陈启生



甘肃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活动聚居的地区。千百年来，生息在甘肃境内的众多民族通过迁徙变动，长期碰撞接触，相互混杂、联结和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骨肉相连，血脉相通，最终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人口为主体，藏、回、东乡、蒙古、裕固、哈萨克、萨拉、保安、土等 10 多个民族共同聚居的民族构成格局，而回族和藏族又是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历史上还将东乡族和撒拉族归于回族，称“东乡回”和“萨拉回”。

探讨了解甘肃汉、藏、回三个主要民族的具体构成成分，不仅对了解其发展演变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真实直观地理解甘肃当代各民族之间血脉相通的亲密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从而对增强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和思想文化交流，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根据地方史志资料，对甘肃境内汉、藏、回三个主要民族的构成成分作一些初步考察探讨，以供有关方面工作的参考。

## 汉族

《庆阳地区志·民族宗教志》记载庆阳民族说：“秦代之前区内有众多的戎狄部落，至汉代均融合于汉族。汉代以后至明清之际，庆阳地区为各族聚散、诸族融合的地方。先后融入汉族的有众多的戎、匈奴、氐、羌、屠各（休屠）、鲜卑、卢水胡、敕勒、突厥、沙陀、吐谷浑、吐蕃、党项羌、女真等族”<sup>①</sup>。新编《永登县志·民族》记述：“西汉元狩二年（前 121

年），汉王朝迁徙内地汉族约五、六万人在朔方至今居（今永登县）一带充田官塞卒。唐代吐蕃占领永登，县内遂成为多民族聚居之地。明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清雍正年间，组织移民迁到河湟、河西一带屯垦，一些游宦、商人也来此定居，各民族融合，汉族人口猛增。跟随连城鲁土司来永登的蒙古族人及驻满城的满族士兵，还有一些土著藏族、土族到民国至解放前后已同化为汉族。永登县的汉族基本上是多民族的融合体。”<sup>②</sup>就甘肃全境来说，整体情况与上述庆阳、永登是一致的。

氏族成分。陇南是古代氏族生息活动的中心区域，氏作为民族今已不存，但陇南现代居民中有着大量氏族后裔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清嘉庆吴鹏翔《武阶备志》说，仇池政权灭亡后陇南氏人“庐落耗散，其种人留居武都者有符氏、杨氏、窦氏、强氏、苟氏、毛氏诸巨姓，皆与汉民杂处，不复为乱。唯杨氏据爵士三百余年，西魏灭武兴，其子孙流移送、宕、沙、岷等州者，仍为酋豪，迄今千余年，世承不绝。”民国《西和县志》记载，西和境内“有氏族令狐氏之裔，今去狐而以令为姓者。”1949 年 7 月以甘肃省长郭寄嶠名义为当时岷县良恭乡（今宕昌南阳）捕获甘南民变领袖王仲甲而发给岷县县长孙伯泉的电报称：王仲甲“潜匿岷县双嘴里氏人杨龙祥家中，即被杨与爱妻以斧枪击伤”。<sup>③</sup>今陇南各县，上述杨、符、蒲、强、苟、毛、窦等大姓分布广泛，人口众多，往往整村或数村、数乡甚至跨县区为一家族，不少家族历代相传，其为当地土户。新编《武

都县志·民族》章记述说：“今武都之蒲、杨、符、苟、皮、王、巨等姓之一部分为其(氏)汉化了的后裔。”<sup>④</sup>原武都地下党主要领导人王锐青在自传中写到：“我是高山(武都县与宕昌、礼县相邻的金厂、蒲池、池坝一带)的土户，但土户究竟是什么民族，一直没弄清，一般认为是藏族，实际不是。据传说前辈人是番夷，但明、清以来，封建统治准予参加科举考试，本族人也有秀才、举人，生活习惯又没有特殊处。我以往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既肯定不了什么族，也不想冒充少数民族之籍，也就算作汉族吧。据县志载，所谓土户者已与齐民无异，我想算作族吧，也不一定是。我想从现在起，我就填为土户。”<sup>⑤</sup>该地的这种土户，既然不是藏族，就只能是氏族。

鲜卑、吐谷浑及党项族成分。“唐代，今庆阳一带有因吐蕃攻击迁来的吐谷浑国慕蓉氏部落。宋代今庆阳地区有党项羌人慕氏部落，熙宁九年(1067)环州有归顺宋朝的党项羌人慕恩、慕化家族。鲜卑慕蓉氏后裔在明洪武五年(1372)受朝廷命令去掉蓉字为单姓慕氏。明天启年间环县贡生慕永忠为镇原教谕，辞官后寄籍镇原，其后裔到清代已成为镇原大姓，人口逾千。明、清两代庆阳、镇原、环县有慕姓进士、举人40多人。”<sup>⑥</sup>甘南草原及周边地区，“后来吐谷浑民族融入藏、汉、土等多种民族中”<sup>⑦</sup>。

蒙古族成分。“明初，元平章政事脱欢率部投诚明朝，安置在连城。其孙失伽以军功升世袭土司指挥使，赐姓鲁……直至民国21年(1932)改土归流。据乾隆年间统计，鲁土司辖民8698户，204051人……明代永登居民中蒙古族较多。以后，永登县的蒙古族逐渐被汉族所同化。自民国时期，逐年减少，至1954年底，只有23人”<sup>⑧</sup>。“仅十四世以后的土司亲房，在连城、民乐等乡镇居住的不下百户，近千人，可现在族别基本都是汉族”<sup>⑨</sup>。“元时人居陇南的蒙族，经明清两朝，也已完全与汉族融合，现今陇南九县，以蒙族为姓和村落居住着，早已不存。如礼县元帅安竺尔之后代，至赵世延起即改汉姓。赵氏家族在礼县延续很广，自亦称汉民，不以为蒙族。其中元帅翔啸石磷，子孙居住礼县，改石

姓，为大族，亦自认为汉族，不以为蒙族”<sup>⑩</sup>。东乡县“分布在东塬、河滩的祁姓石蒙古人朵尔只失结祁土司的后裔，元时曾任甘肃行省右丞，世居民和上川口，其族人住在黄河南北二庄及永靖、青海一带。百和、那勒寺的卜姓其祖先为蒙古族镇西武清王卜纳刺。”<sup>⑪</sup>

满族成分。“乾隆初年，平番(今永登)县有满族506户，2000余人。……宣统时，有满族721人。……以后，满族遂分散谋生。大多散居于满城南门、坪城、城关、连城、中堡、古山、河桥等地。其生活、语言、文字、习尚逐渐混同于汉族。”<sup>⑫</sup>清乾隆二年(1737)武威城东修筑满城一座，派驻满族旗兵4000人驻防。至1949年武威有满族214户，810人。“满族在武威长期与汉族杂居，通过彼此接触和影响，基本上与汉族融为一体。”<sup>⑬</sup>

藏族成分。甘肃汉族中的藏族成分比重是很大的。“古代分布在安多地区被汉文史籍称为羌或西羌的部族，实际上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而作为吐蕃前身的土著羌人是后来形成甘肃地区藏族的主干。”<sup>⑭</sup>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今甘肃大部分地区，后尽管部分地区逐步被唐王朝收复，但社会基本构成在相当时期内仍是以吐蕃和吐蕃化了的各部落为基础。至宋代咸平元年(998)时，凉州府旧领姑臧、神乌、蕃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一千九十三，“今有汉民300户，”<sup>⑮</sup>余皆吐蕃。当时仅今平凉、天水地区的秦凤、泾原各地的吐蕃部落即有800多个。元明以来，河西和陇东周围地区众多藏族部落在州县地方行政机构管理下逐渐解体，日益汉化。清代后各地土司不断改土归流，各土司所辖藏族部落一批又一批地先后汉化。“北宋时期包括今定西地区在内的东至秦州夕阳镇，西至河、湟边境内外的广大地区，散居着由青藏高原陆续东迁的吐蕃部落和政权，洮河以东蕃、汉交错杂居，其中以分布在渭源县、漳县、岷县境内的俞龙柯部势力最大。后宋将王韶劝降俞龙柯，又请准宋神宗赐姓名包顺，其后包氏世居岷州，并和汉族逐渐融合，今渭源、岷县、漳县的包姓多为包顺后裔，包姓为岷县大姓之一。……渭源县明代封置土司，管辖藏族48族，至

今在半阴坡和鸟鼠山梁山南,仍保留着‘西番沟’、‘醋那’、‘苏布鲁’、‘贡巴’、‘露巴’等藏语村名和寺院,这些村民还保留有一些藏民的风俗。岷州设置土司后,管土民 89 族,清时达 91 族,这些藏民相继改土归流,招中入籍。”<sup>②6</sup>岷县境内多纳土司绰斯觉、阎井土司祥古巴子、攒都沟土司后永庆、宕昌土司司马珍、麻龙土司党只官卜等土司所辖番民至清时总数至 1800 户以上,遍布岷、宕各地,绝大部分都已汉化,成为汉族赵、后大姓,《元史》本传记为汪古族,而部分学者认为是当地藏族的元巩昌总帅府元帅汪世显家族经数百年发展,形成遍布今陇西、漳县、武山及成县广大区域的汉族巨族大姓。康乐县“明朝时期,以苏家城为中心,东至果园,西至沙马关,南到安龙关,北至陡石关的现今苏集、八松、白王、附城、上湾、八丹、鸣鹿等地区为岷州沙马里。明洪武初,有苏姓土司归顺朝廷。清雍正四年土司苏成威统辖沙马一族 2000 余人,有士兵 500 多,耕种土地千顷。后苏成威因讼谪戍,沙马一族逐渐汉化。今洼滩、苏河苏姓自认祖上为吐蕃。宋时,吐蕃有乔家族番(今康乐有多处地名乔家)、大小马家族活动在秦、渭一带(今苏集、八松历史上叫大小马家滩,或因其族居住而得名)。熙宁五年十一月,河州吐蕃首领瞎药等降宋,赐名包约,并命为本州番部都监。历史上中砥川称包家川,现苏集乡包姓、普巴乡八龙包家自认为祖上也是吐蕃,还有黎、钱、鲍、牛,八松高姓自认都是汉化吐蕃。……康乐吐蕃族,部分融合至汉族,部分向西南迁徙,演变为藏族。”<sup>②7</sup>东乡族自治县,“境内赵姓,其远祖可追溯到宋代吐蕃唃廝囉,唃廝囉孙巴毡角归宋,宋朝皇帝赐名赵顺忠,其后辈历任节度使、元帅、达鲁花赤、总兵、指挥使等。被封为世袭土司,原居临洮,后部分向会川、渭源一带迁徙,是吐蕃人,现全部汉化。”<sup>②8</sup>积石山县“元明以后形成吐蕃与汉族共居的格局,早先的羌、鲜卑、吐谷浑、吐蕃除一部分东下和迁向西南外,留居下来的均融合于汉族,如乜藏的王姓和郭干的乔姓,都是吐蕃演化而来的汉族”。<sup>②9</sup>临夏“番僧端月坚藏于明洪武六年(1373)同袍弟韩哈麻率韩家集、漠泥沟、槐树关等 15 个村庄,珍珠、打拉二族

738 户归附明朝,招中茶马。永乐四年(1470)钦赐韩哈麻‘镇抚司’之职,准其‘世袭’,其后辈世袭至清末。民国中期改土归流,均融合于汉族之中”。<sup>③0</sup>永靖县“居住在三塬、杨塔、王台等乡的何姓,祖先是何锁南普(又称姬锁南普),是元朝吐蕃宣慰使,明洪武三年(1371)降明,封为土司,其后裔由吐蕃演化为汉族。明初部分后裔移居河州北乡百塔寺川何家堡,后逐步分居各地。小岭乡陈山和朵坪村的韩姓家族,从元代流居韩家寺,现分居在该乡老庄、新寨、韩家寺等社的韩姓有 80 多户,400 多人,公认他们的祖先父系汉族,母为藏族,至今仍保留一些藏族的习俗,如人死祭祀时不吃荤,不戴孝等”。<sup>③1</sup>和政县“明代以后,吐蕃族部分人口南徙,部分留住。后来,留住吐蕃族部分融合于汉族。据传说,今日牙塘一带的一些汉族,其祖先是吐蕃族”。<sup>③2</sup>临夏市郊南龙乡马家庄亦为何锁南普所辖之土民,“河州吐蕃后裔自明以后,日渐同化,大多融合于汉族”。<sup>③3</sup>“据考,康乐县八松乡高姓,巴扎村的黎姓,鹿鸣乡苏姓,苏集乡的黎、鲍、钱等姓,临夏县的韩姓,积石山县乜藏的王姓,东乡县百和、关堡的何姓、羊姓及部分杨姓,和政县牙塘的白、罗、石、苟等姓为吐蕃演化而来的汉族”。<sup>③4</sup>清末民初时,岷县“汉民之中,有曰族夫者,现七百四十八户,前明旧为番族,隶诸土把总者也。今每筑城垣,则州檄各土把总派拨以应役。有曰寨军者,向系汉番各民兵把守诸隘寨者也。今隘寨久已湮废,寨军与齐民无异。……土民:旧归土司管辖。雍正初,已废土司赵廷贤所辖之四十八族,今为归安里。光绪初,改袭把总故土司后振兴所辖之八十余户土民,改土归流,今附属阎井里。二里已为汉民,归州编户矣。现南路宕昌土司马继贤管土民十六族;东路麻龙土司赵士林管土民三族;北路攒都沟土司后漣管土民二百九十名。此三土司所辖,虽号土民,久与汉民无异”。<sup>③5</sup>武都明初时有番将王祥,“后裔繁昌,编次民籍”,<sup>③6</sup>均汉化。文县清末时,“文番即氏羌遗种,昔年舍书乡居多,雍正八年改土归流,谓为新民,已与汉民无异。上丹堡、下丹堡、柏元、糜地、岷堡、黄土地、白马峪、七山头等处仍与汉民杂处。富者衣服与汉同……已二百年于此矣,人输

向日之忧,户习华风之美,浸浸乎已臻用夏变夷之盛,又何番俗之足云”。<sup>⑧</sup>临夏州境内,“活动在临夏地区的鲜卑族、吐谷浑、羌族的一部分融于汉族,就地定居。明代以前吐蕃有55族,明初有29族,清初为中马19族,据考,康乐县八松高姓,巴札村的黎姓,鹿鸣乡苏姓,苏集乡的黎、鲍、钱等姓,临夏县的韩姓,积石山县乱藏的王姓,东乡县百和、关堡的何姓、羊姓及部分杨姓,和政县牙塘的白、罗、石、苟等姓为吐蕃演化而来的汉族。和政、积石山县乔姓,宋代喃厮啰之妻乔氏为河州乔家族人,现已融化为汉族”。<sup>⑨</sup>

回族成分。兰州红古区海石湾“旋子村《马氏世系源流》载:‘我族源发扶风,明洪武来甘定居马家台’。马姓自称原系回族,后融合为汉族,迄今祭祀祖坟时用牛羊肉,不用猪肉。马姓家族现有百余户,分别在红古区旋子、下海石和青海乐都蒋东山、永登大有一带居住”。<sup>⑩</sup>“现陇西县巩昌镇有鲜姓数十户,百余人。同治年间,部分回族鲜姓改为汉族,多居陇西县”。<sup>⑪</sup>

### 藏族

藏族和汉族一样,是甘肃境内历史最为悠久,活动地域最为广泛而发展演变错综复杂的民族。“古代分布在安多地区被汉文史籍称为羌或西羌的部落,实际上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他们与后来在西藏兴起的吐蕃是同源的,是藏族先民中以游牧为主的和以农业为主的两个部分,因此吐蕃统一西羌各部落,并不存在西羌被吐蕃同化,或者是西羌文化被吐蕃文化所同化的问题。”<sup>⑫</sup>“毫无疑问,古羌人是藏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早在新石器时代,藏族地区的原始文化与甘青地区的氏羌原始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昌都卡若文化表现出的多重性特征,就包含着甘青地区氏羌原始文化南移的因素,其中半穴氏房屋、种植粟米、使用肩石斧等,明显是属于氏羌文化的特征。”<sup>⑬</sup>在汉文史籍中,对藏族先民和藏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称谓,商周时称戎,秦汉至南北朝时称羌,唐宋时称吐蕃,元时称土伯特或蕃,明清时又称番或西番,清末民初,按照藏区朵、卫、藏三部分的划分,而取其“藏”之音来称呼整个藏族地区

和生活在此地区的民族为藏族。同时,历史上对藏族的称呼又沿用或前后称谓公用。如羌、戎并用,羌、番并用,直到明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志对藏族或称番,或称羌,并不统一,但均指藏族。如1933年的《礼县新志》“古迹”条,记崖城为“元时命秦国公石吉连御西戎城址尚存”,野麻关“明宣慰使杨清御番之处”。仍“戎”“番”并用。民国3年(1914)甘肃省裁撤设在今永登的庄浪茶马同知,设庄浪茶马理番委员,由永登县长兼任,仍称“番”。秦汉时期,甘青地区“羌人的遗裔,因为在唐代属于吐蕃,所以称为番民;又因接受西藏佛教和文化,和西藏没有不同,所以称为藏民”<sup>⑭</sup>。至唐代,“吐蕃在控制了甘肃全境之后,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地方,除了驻军和从吐蕃迁来部落驻牧外,亦在当地羌汉人中编制部落,以便于统治。随着羌人各部落的吐蕃化,以及当地的汉人被编进吐蕃部落,甘肃境内的羌人和吐蕃人及部分汉人实现了结合,并以吐蕃部落的组织形式出现,这为甘肃藏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以后,在经历了吐蕃政务崩溃后各部落互不统领,互为雄长的长期动荡,而各部落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均未发生大的变化,到了元明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甘肃少数民族——藏族已经正式形成了。”<sup>⑮</sup>“凉州六谷部是由西藏本土军旅将士、东迁部落、温末起义的奴部和平民,同本地羌、小月氏、吐谷浑、汉等民族融合而成,是现代天祝藏族的雏形。”<sup>⑯</sup>因此,藏族是一个极为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将唐宋以来的蕃或番人正式称为现代意义上的藏族,是孙中山在建立中华民国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后方逐渐形成的。

汉族成分。唐时吐蕃占领甘肃陇东外的全境后,境内原汉族人民全部被吐蕃化而成为吐蕃,当唐朝派往吐蕃的使者刘元鼎经过兰州、永登到青海入藏时,被吐蕃同化近80年的兰州“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到今永登、民和时,“耆老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sup>⑰</sup>公元849年,从吐蕃占领下收复地区的原汉民,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辨易服。至宋初建凉州府,汉民仅300

户,“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sup>④</sup>而此时,东至平凉、天水,南至陇南,均是被吐蕃化了的各部落分布区,仅陇山西南地区的吐蕃化部落就有800多个,而这些部落中无疑大量的是汉民。“盖汉人有人番赘婚者,又有兵燹时规避差役及犯罪遁入者,故彼族以为非真种,谓之‘铁布’。”<sup>⑤</sup>卓尼土司统治时期,境内土地属土司所有,“一批从外地迁到卓尼定居的定居户(俗称‘孛居子’)没有林权和土地权,为了生存,租种土司老佃户田地,习惯称作‘吃田地’。这部分外来户大多数是汉族,是因逃荒、逃壮丁、避难、经商等原因迁徙来的。特别是(1928年)西北河湟事变时,从临夏、和政等地迁徙流落在境内定居的汉民很多,几乎遍及全县各乡(镇)”。<sup>⑥</sup>这些汉民中不少人被藏化而成为藏民。卓尼录巴湾苏土佐,“字星菴,统称苏三爷,现年四十八岁。自十三岁起即以负贩走藏地,后丘儿寺老谷招之为婿,生一子,为主藏民事务者多年。”<sup>⑦</sup>卓尼大峪沟“藏民绝无后(因男子出家为僧故极易绝后),招汉人为婿或养子,藏人死后为之送终,即承袭其户,照样为土司纳粮当差。”<sup>⑧</sup>临潭阎家寺“宋堪布即为汉人。”<sup>⑨</sup>卓尼王某“即‘吃田’之汉人也。王某本为临潭西乡丁家堡人,以继承方式取得藏籍,曾随故土司入送部‘黑番’各地。”<sup>⑩</sup>

吐谷浑及土族成分。南北朝时以吐谷浑及其子孙为首的慕容鲜卑部落在甘青地区长期繁衍生息,与当地羌、汉等民族长期融合形成吐谷浑族。唐代吐谷浑亡国后,吐谷浑人一部分降于吐蕃而继续生活于故土,一部分东迁内地,“降附土蕃的部分,后来逐渐融于藏族”。<sup>⑪</sup>“吐谷浑政权被吐蕃消灭后,其属民尽管有一部分迁移到凉州、灵州等地,但还有不少吐谷浑人仍长期定居原处,称为吐蕃属民;一小部分因躲避战乱,隐居深山,独成一支。宋代以后甘青地区的大部分吐谷浑人逐步融合到藏汉民族中,只有一小部分尚存,即繁衍成为现在自称土户家的勺哇土族”。<sup>⑫</sup>“抗日战争结束后,马步芳大规模扩军,互助、大通等地的一部分土族不愿当兵而避居天祝加入了当地藏族部落,给天堂寺和其他部落头人当‘牛户’。”<sup>⑬</sup>

蒙古族成分。蒙古青海和硕特黄河南亲王部所据包括今拉卜楞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和硕特蒙古人长期与藏族交往杂居,其语言文字及一切生活习惯均已藏化。”<sup>⑭</sup>清康熙四十八年(1790)黄河南亲王察罕丹津迎请一世嘉木样创建拉卜楞寺时献出自己的属民500户作为拉卜楞寺的香火户,另一蒙古首领额尔德尼台吉也献出部分土地和属民,这些赐给寺院的属民,应该基本或大部分是蒙古族,但至1990年时,甘南全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121人,其中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县仅77人。这说明众多蒙古族人口已经藏化。原西藏僧人哥哥把失游至敦煌一带娶蒙女为妻,后代繁衍,部族繁盛,明初时“混称元熟达(蒙古族),修贡自为属番。”<sup>⑮</sup>“天祝的蒙古族,人数不多,主要是三、四十年代零星迁进的。至今部分已融合于藏、汉民族中。”<sup>⑯</sup>西藏万户扎才秀盘的后裔勒辛本玛带领许多族人来到多麦东部的天祝一带,他的大儿子与蒙古大臣伊古照海的女儿结婚,生育了三个儿子,后形成札提部落。元太祖窝阔台的第三子阔端所部屯驻西凉府后,今武威为中心的河西便成为蒙古部落屯驻重地,众多蒙族定居于此。这些蒙古人元代以后逐渐汉化,而成为汉族或逐渐藏化而成为藏族。永登连城鲁土司脱欢乃蒙古宗室,至清乾隆时,其所部辖民有蒙古族等土民21686人,番民2365人,如今永登南乡大姓张、员、把、满4姓即为其所辖土民,这些土民由于和藏族长期共处,又信奉藏传佛教,因此不少被藏化,“故《五凉考治六德集》认为永登的藏族就是蒙古族。现永登藏族多居住在天祝及坪城、中堡、金嘴、武胜驿等乡镇。”<sup>⑰</sup>

回族成分。夏河县十三庄部落又称拉得四部翼,清代属黄河南亲王管辖,最初只有洒易昂等少数几个村庄。拉卜楞寺建立后,亲王将此地献给寺院,“后来青海等地不少牧民以及外地的一些回、汉民相继迁来长住。或畜牧,或经商,遂形成后来的十三庄部落。”<sup>⑱</sup>“据说最初迁来永登的有52人,这些人与当地人结婚,繁衍生育,就是回族,后来陆续又有迁来或迁出者。在鲁土司辖区居住的回民,有的还信奉了喇嘛教,自然成了土民的一部分”。<sup>⑲</sup>

## 回族

回族是以元蒙时期进入中国的回回人为主体,包括唐宋时的蕃客后裔在内,通过伊斯兰教纽带的联结,融合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于元明之际逐渐发展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汉族成分。一是回汉通婚。普遍而长时期的回汉通婚不仅是回族形成的重要条件,更是回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因素。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至今仍广泛存在的不争的史实。各地均有回族家庭一般三代之内必娶一名汉女为妻的说法,而汉族男子入赘回族女子之家亦很普遍。如岷县南路回民聚居的今麻子川乡占礼录村在上世纪30年代有回民51家,“村内回汉关系甚洽,回民可娶汉女,回女亦赘汉夫,唯不能外嫁,今村内二种情况者各有六七人”。<sup>⑤</sup>二是随教。康乐回族马益寿在上世纪30年代收留了两名流落红军,原籍礼县的王全福和原籍四川绵阳的马八娃,两人都信奉了伊斯兰教,王全福改名马全福,马八娃改名马明德,娶妻成家,已有数代。<sup>⑥</sup>武都回族陈氏家族是原籍四川后定居武都的汉族,有一位祖先为清营书吏,“习读阿文经典喜爱而入伊斯兰教。”<sup>⑦</sup>后代繁衍发展成为武都回族中的名门望族。“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民对汉民贫困户的扶难,周济,解危,汉民或个人或一家,改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回民。丰台杨、王二姓,东沟年家,八丹线家,流川范家、高家、王家,磨羌马家等都是随教成为回民的。年家现在又200多户,分布在东沟、关扎、麻家,据传说是年羹尧的后代。……范家是北京罗罗儿巷人,始居临洮,后有兄弟3人,老三改信伊斯兰教。他们回汉同住一村,排行未乱,和睦相处。过去汉民唱社火,回民还参加打旗、奏乐等活动。磨羌人与马家嘴马家汉民民国初期还走家务,汉民还去磨羌上坟。”<sup>⑧</sup>“永靖县内孔姓回族是今永靖县刘家峡乡大川等村的孔姓汉族随演而来,至清同治年间后孔氏回族共38户180余人,迁出大川村,移居喇嘛川,至光绪九年(1883)又移居境内今新寺乡后坪、三湾村,段岭乡魁山村及川城乡上王家等村。民国17年前这门孔氏家族的汉、回之后,每逢清明节时,仍还不忘祖宗,同上总坟扫墓祭奠,各献祭品,汉

为通用食品,回系清真食品。自此以后,孔氏回族在四沟村朶子沟、高崖根、红沙地等处,还拥有60垧耕地,作为祭祖之田,托嘱当地孔氏汉族家务代耕代祭,这分祭田,直至共和国建立后,土地改革时才被政府没收,分配当地无地少地的贫困农家。至1985年境内孔氏回族发展为200余户,840余人,分居新寺、段岭、川城、王台乡。”<sup>⑨</sup>广河县“随了教的则多数保留着原来的汉姓,以此为特征,一般可分辨出那些人家可能祖辈上是随了教的。经初步调查,涉及的姓氏有:潘、童、希、席、苟、刘、曾、朱、王、张、魏、黄、祁、杨、周、康、薛、裴、孔、李、龙、白、徐、许、汪、麻、范、董、陈、方、孙、洪、冯、姜、秦、关、毛、司、虎、边、豆、沈、高、吴、邓、罗、丁、金、牛、任、同、唐。这些姓氏中,有的姓一部分随了教,另一部分还保留着其汉族之属,双方都知道本出一源。有的住在本县的随了教,而迁居邻县的则仍是汉族,彼此都知道原来是一个家族。”<sup>⑩</sup>三是长期相处一地,逐渐融入回族。积石山县“成吉思汗西征并胁迫签发西域诸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色目人随元军东征西讨,攻占积石山全境后,遂留部分军吏屯田戍守,后转为民籍,与当地汉、藏民族长期相处发展而成回族。”<sup>⑪</sup>东乡县“回、汉杂居,平时互相交往,情感加深,逐步融为回族。唐汪川汪姓就是这样产生的。……个别汉民因族内矛盾,而皈依回族,如唐汪乡唐姓回族。”<sup>⑫</sup>而曾被称为“东乡回回”的“锁南镇的王家、张王家、汪集高家、大树的黄家、五家的李家及唐汪乡的一些东乡人,说祖先为汉族。”<sup>⑬</sup>

蒙古族成分。元“安西王忙哥刺驻守六盘山时,统帅的十多万蒙古兵编驻各地,境内(平凉)为其屯兵重镇。忙哥刺死后,由皈依伊斯兰教的长子阿难达袭位。阿难达在所辖的蒙古兵中传布伊斯兰教,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后随着战争的减少,又多受命于各地‘随处入社与编民等’,成为境内定居者。”<sup>⑭</sup>原被称为“东乡回”的“东乡族形成中融合了一些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元代安西王阿难达部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部众有可能到东乡地区。东乡语属蒙古族语,东乡族形成时受到蒙古族的影响。”<sup>⑮</sup>康乐县“据传,回民

线家和汉民线家原是蒙古族,后来部分汉化,部分改信伊斯兰教。丰台拱北庄和马家集贡布一族,是因为家中不合赌气而随为回民。”<sup>⑥</sup>1938年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等考察广河时,“承马国礼教主谈,其先乃元人之裔,居红柳滩(临夏境内洮河西岸,在唐王川东南方),入明后始奉回教,在清雍正、乾隆年间,马呈瑞朝天方归,成立门宦,称为红门,又称胡门,后改为宏门,遂移居于此,今已传至第七代。自买家巷以下之教民约百余寺,皆属之,南北乡从之者甚众。”<sup>⑦</sup>

维吾尔族成分。“回族冶姓家族祖先为维吾尔族薛笃尔丁(后代改为冶姓),是元朝甘肃行省监事,明朝洪武四年(1371)归附明朝,封为土司,世居青海民和县米拉沟冶家堡,因与当地回民世代相处,融合为回族。清光绪年间部分冶姓互带迁居今永靖县段岭乡马家川、段岭等村。”<sup>⑧</sup>清末民初这一家族从青海民和有一支迁入今红古,“窑街的冶姓回族,现有40余户,200余人,其祖先为维吾尔族薛都尔丁,后改姓冶。”<sup>⑨</sup>

藏族成分。历史上称为“东乡回回”的“东乡县百和乡羊腊家村等,说其祖上是藏族。”<sup>⑩</sup>《东乡族自治县志》也记载说:“县内百和乡一带一些少量东乡族,自说原为藏族,因随义萨尔塔,成为东乡族成员。”<sup>⑪</sup>历史上曾属甘肃的青海化隆县卡力岗地区1万多操藏语的回族,则是中国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之华寺门宦始祖临夏人马来迟传教时,当地藏族信奉了伊斯兰教而成为回民的,后来变“白认为回族。”<sup>⑫</sup>

注:

①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庆阳地区志》P575

②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永登县志》P142

③宕昌县委党史办1990年内部出版《宕昌党史资料》P229

④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武都县志》P1057

⑤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拙著《陇南地方史概论》P72

⑥《庆阳地区志》P598

⑦蒲文成、王心岳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汉藏民族关系史》P22~23

⑧《永登县志》P149~150

⑨苏裕民著《永登历史与文化》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P145

⑩《陇南地方史概论》P70

⑪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东乡族自治县志》P125

⑫《永登县志》P148

⑬武威地区志编委会编《武威地区志》送审稿P1962

⑭渊塔著《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13

⑮《宋史》卷492《吐蕃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P14115

⑯定西地区志编委会编《定西地区志》送审稿P2016

⑰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康乐县志》P355~366

⑱《东乡族自治县志》P125~126

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P405

⑳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临夏县志》P567

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永靖县志》P101

㉒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政县志》P409~410

㉓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临夏市志》P779

㉔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临夏回族自治州志》P1290

㉕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年编印《岷州志校注》P439~440

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阶州直隶州续志》P279

㉗文县政协、文县县志编委会1984年重印光绪《文县志》P82

- ⑳《临夏回族自治州志》P1290
- ㉑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兰州市红古区志》P141
- ㉒《定西地区志稿》P289
- ㉓毛儿盖·桑木旦论述,转自州塔、乔高才让《甘南藏族通史》P33
- ㉔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转自《甘南藏族通史》P99
- ㉕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1 期 P125
- ㉖《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P11~12
- ㉗甘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版《天祝县志》P129
- ㉘中华书局 1975 年版《新唐书》P6102
- ㉙中华书局 1977 年版《宋史》P14152
- ㉚《岷州志校注》P440
- ㉛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卓尼县志》P16
- ㉜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28 辑《甘青闻见录》P211
- ㉝《甘青闻见录》P185
- ㉞《甘青闻见录》P164
- ㉟《甘青闻见录》P198
- ㊱《武威地区志稿》P1958
- ㊲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甘南州志》P991
- ㊳《天祝县志》P137
- ㊴《甘南州志》P993
- ㊵高厚安、邝惠莉(明)《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P276
- ㊶《天祝县志》P138
- ㊷赵鹏翥《连城鲁土司》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P65
- ㊸《甘南州志》P984
- ㊹《连城鲁土司》P65
- ㊺《甘青闻见录》P142
- ㊻《甘肃文史》第 9 期 P39
- ㊼《武都县志》P142
- ㊽《康乐县志》P357
- ㊾《永靖县志》P102
- ㊿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广河县志》P82~83
- ①《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P404
- ②《东乡族自治县志》P124
- ③《东乡族自治县志》P113
- ④中华书局 1996 年版《平凉市志》P662
- ⑤《临夏回族自治州志》P129
- ⑥《康乐县志》P357
- ⑦《甘青闻见录》P293
- ⑧《永靖县志》P102
- ⑨《兰州市红古区志》P142
- ⑩《临夏回族自治州志》P1294
- ⑪《东乡族自治县志》P113
- ⑫喇秉德等《青海回族史》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 P45
-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 货郎蜀道行商的民间传说

彭战荻

漫漫陇蜀古道，斗折蛇行，穿云破雾，入峡越谷，险境重重。自古骡队马帮、背脚货郎、文人骚客、官军响马，取道往来，不论寒暑。世事风云变幻，朝代兴衰更替，特殊的古道上依然是客商不绝，热闹繁忙。春风吹盛世，天堑变坦途，今非昔比。今天，当你漫步古道，在饱览秀美山水、探访名胜古迹时，那出自田夫野老的一串串风物传说和故事，将会更让你感到魅力无限，浮想连连。

美丽的传说遍古道，动人的故事出民间。这里拣一个说说，故事就发生在早年间和西和县南路。

夏日当空，骄阳似火。

位于陇蜀道上的页水河畔的峡谷中，一位中年汉子喘着粗气，揩着满脸的汗水，歇息在道旁的崖坎下。他头戴麦秆草帽，身着麻布汗衫，脚蹬半新不旧的棉线麻鞋，坐在一块略微突起的光滑石头上，神情显得有点沮丧。他是四川人，凭着一点小本钱，承袭父业，长年在外当货郎，赚钱养家糊口。在他的身旁，放着沉重的一副货郎担子，少说也有一百来斤；那柄响彻山乡的牛皮拨浪鼓，不知摇动了多少年月，早已伤痕累累。

货郎客疲惫极了，躲在凉阴下，摘掉头上的草帽充当临时扇子，驱赶着热风。他仍觉着闷热难挨，便敞开衣襟，袒露胸膛，尽情用衣襟搨起凉来。

“唉——，我真傻！”货郎客将身子挪了挪，擦掉额头的汗水，头往石崖上一仰，长嘘了一口气。

他是第一次走这段山道。

早在幼年四川老家时，就听说西和有座横岭大山，横在甘蜀古道上，难以绕行。后来，走川过县跑腾生意，又多次听人提及横岭大山，说什么“西和有座横岭山，仰躺睡下碰着天。”听其传言，飞鸟也难以逾越，甚至连当年神通广大的杨二郎也只有望山兴叹。昨天下午，他和几个伴儿老早便住进了城内一家“羲皇客棧”，匆匆吃过晚饭，趁早就歇

息了。他心里清楚，为的是养足精神，好翻过那座险峻的横岭山。就这样，待到东方一动，店家就唤醒了他们，喝了一罐茶就匆匆上了路。整整一个上午，边问路边往前赶，好不容易才爬上了二垭子，可人早已累乏瘫了。前面就是横岭山，路上行人越来越少。他不敢停下来长时间休息，惟恐误了时辰，天一擦黑，就难以翻过此座大山。于是，脑瓜子一动，便花了一块白元，在路边农家雇了一匹骡子当脚力。肩上没了担子，步子也迈得大了。没多一会儿，就轻松的翻过了一座小山包。骡子的主人说是已过了横岭山，主动又将他多送了几里路程。他起初咋说也不相信，但打问了几个路人之后，才信以为真。

其余同伴怕花钱，没雇脚程，就自然落在了后边。

“横岭大山不见山，二垭子爬了多半天。”货郎趴在石隙下，喝了一口山泉水，紧皱着眉头，仍在长吁短叹，“我怎么这样傻，一点点路程，白白丢掉了一块白元！”

生意人是精明的，也是奸诈的，吃亏的买卖很少做。

货郎客心情不好。他刚才仿佛是遇到了一伙剪径贼，又好像生意场上遭到了别人的暗算，失了血本，有口难言，有苦无处诉，只好打落门牙——连血咽。一块带着体温的白元，掂在手里并不见得多么沉，可跑绽脚底也要好些日子的挣哩。怪怨不了别人，只怪尽信传言，没在地方上好好打听打听。就是那脚价，还是他亲口出的，当时自以为山里人憨厚，便于糊弄，还凑上午饭时辰，顺便白吃了一小块青稞面饼子，捎带着喝了两土巴碗酸菜拌汤。他自作聪明，占了便宜，结果却付了个大脚价，吃了闷亏。

路怕生人走，花钱买教训。

懊恼归懊恼,多想也无益。

日上中天,山谷中形同蒸笼,路上泛着白光,青草打着卷儿,一丝风也没有。天气太闷热,似乎行人都绝了迹。河对面的山腰上,凡是平缓地带,因势利形,都开出了大大小小的架板地:青稞金黄,洋麦泛波,豌豆菜绿,高粱举纓……勤劳的山民们,并不因炎热而躲在自家的茅草房或土墙板屋里,仍在挥汗如雨地劳作着,粗犷、缠绵的山歌声不时在山谷里回荡,此起彼伏,荡人心魄;放牧牛羊的牧童,相约似地奔下山来,一丝不挂地扑进山湾河流中,尽情地嬉闹着,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

天上不见一丝浮云,毒辣辣的日头烘烤着大地。

货郎客不敢再停留下去,挑起担子又上了路。他的下一站是“三关”之一的石峡关,错过了投宿之地,麻烦事儿就多了:山里人烟稀少,傍晚时分又常有土匪出没;几个同伴又落在后头,一时半会等不上来。虽然他有武功护身,但需时时谨慎,连睡觉也得睁只眼睛。石峡关是人来客往的大站,互通有无,早些赶到那里,说不定还能趁空搓和几桩小买卖,以补横岭山上的一点损失。

货郎客肩挑重担,竹板扁担在肩头弹跳晃悠不止,咯吱咯吱的声响中卸去了许多重负,走起路来似乎非常轻松。他沿途从不放过一丁点商机,逢村必进,遇户就入,摇动梆当梆作响的小鼓,挨个叫着货名,有板有眼、拖腔扯调地吆喝着,招徕着顾客。虽然是些小物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牟利是比较丰厚的。尤其他长期从商,脑瓜子精灵,再加上能说会道的八哥嘴,常哄得妇人娃娃肯出个大价。

出了坦途关山庄,又往前走了一程,觉着口干舌燥,便卸下担子,寻到路旁的冒水泉中喝了一气凉水。刚才在几个小山村,着实赚头不小。前面再有几歇路程就是石峡关,离天黑还远着哩,趁四下无人不如在路旁的河水中洗个凉水澡,解一解连日浑身的乏气。

货郎客蹲在路旁抽了一锅旱烟,拿目光在四周来回搜视了几遍,确信没有杂人,这才放心地来

到河边。低头一看河水,清澈见底,最深处也淹不过人的腰部。正待脱衣下水,突然两眼愣住了:只见面前一丈开外的河底上,似乎有两件宝贝在晃动。他怀疑是自己的眼睛瞅花了,揉了揉,看了看,又揉了几揉,反复看了几十遍,才确信并没有看眼花,一切都真真切切,没有丝毫含糊。

“天佑我也,我发财了!我发财了!”货郎客欣喜若狂,上午的不快早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顾不得脱衣服、解麻鞋,扑通一下子跳到了河里,急忙向前趟去。可是到了瞅定的地方,除了淤积的河沙之外,什么也没见着。奇怪,分明在这个地方,怎么会不见了昵?

货郎客回到岸上,仔细辨认,那宝贝还在,只不过移动了先前的地方。他又下到河里,轻轻迈动双腿,双眼一眨不眨盯着前方,慢慢靠了上去。明明清清楚楚的,怎么到了跟前,却啥也没有,莫非掩藏在河沙下面了?心理这样一转念,便俯下身子挖掘起来。

是什么宝贝让货郎客如此惊喜呢?金钎子和银抹挂!金钎子活像木工师傅的曲尺,只不过格外粗大,黄灿灿映得半个水面也金光闪耀;银抹挂又宽又长,相映增辉。不要说是两件宝贝,若能得到其中任意的一件,准能发大财。

听当地人传言,远在农耕初期,人们还没有大量利用牛来帮人耕作,日子过得很累很苦。有一年,仇池大山里出现了一头金牛,主动帮助穷苦人家耕种。他来无踪,去无影,不吃农家的,也不喝农家的,耕种了一年又一年。这下,可惹怒了仇池山一带的几个山霸,他们千方百计设圈布套,围迫捕捉了多年,都没有获得成功。金牛是神牛。后来,金牛被激怒了,无奈之下别离山里乡亲,将尾巴一摆,扬开四蹄,经石峡、过坦途,越寒峡、出盐官地带,往返几个来回后,最终沿西汉水而下,奔四川投关中去了。据说,金牛出走,一步九回头,将携带的金钎子、银抹挂、银纒绳、金扛头等物件,全部遗落在了沿途。后来,三关一带的人有意寻找,偶有所见,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人真正得到过。没料到,四川上来的货郎却有了这番奇遇。

遍地有金银,专等的有缘人。

货郎客在蜀道行商多年，阅人无数，多次听到过此类传说，拼命用双手在河沙中刨挖着。他是连衣带裤下水的，分明变成了一只落汤鸡。好在是炎热天，除了行动上显得不大自如外，反而感到格外凉爽快意。然而，好长时间过去了，还是找不到金轭子和银抹挂，急得心里真有些毛燥发焦。

“喂，钻在河里干啥呢？太阳已经西斜了，还不快走！”一起的同伴从后面赶了上来，见道路上的货郎担，对着河里喊道。

货郎客的心思全倾注在寻宝上，对同伴的呼叫浑然不知。他似乎已将自己当成了百万富翁，全然忘了还是个正在赶路的货郎客。

“喂——，你耳朵难道聋了，在河当中犯什么傻……”同伴不停地督促着。深山峡谷里，行人稀少，生意人多数结伴而行，早成惯例。尤其傍晚之际，不时有小毛贼拦路，劫人掳货，最不安全。

货郎客打了个冷战，好久才惊醒过来。在这要紧关头，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坏了将要到手的财路，心里很不高兴，却也没办法。不过，诡眼珠子几转，便有了主意，搪塞道：

“天气热得受不了，钻在河里洗了个澡。你们一路没花那个横岭山的冤枉钱，反倒走得逍遥，跟三天没吃过东西的蔫牛一样，害得让我苦苦等了这么长时间。”

“你看你说的啥话？做生意鬼精鬼精的，我们谁也比不上你，平时就是把我們卖了，我们还帮你数钱哩！可今天怎么啦？是不是头脑里进水了，倒弄成了这个模样。”同伴们瞅着他湿漉漉的身子，其中一个笑道，“这回，我看你咋样出洋相。”

“人都有个吃饭的肚子想事的心，人不是四条腿的动物，路上人来人往，有男有女，光着身子在河里泡着像话吗？”货郎客说着话，慢悠悠地来到路上，从包袱里掏出一套干衣服，躲在石头后面的僻背处几下就换掉了湿衣服，手往扁担上一搭，挑起了担子，回头扮了个诡相：“人是活的，你们还有啥笑料看呢？不出一二里路程，说话之间就干了。”

水随山转，逆水而上。数人结伴同行，说说笑笑，太阳崦山之际，到了石峡关客栈。人们搭完火，洗过脚，店家早用茅草烧好了热炕，便各自歇息了。

路途劳累，头一挨枕头就都有了睡意。在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惟独那个货郎客没有睡意，眼睛越睁越大。他白天让同伴搅了好事，没来得及找见金轭子和银抹挂，一路上强装笑脸，沉默寡语，偶尔和同伴有心无心地搭几句话，但一直严守着这个秘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怎能和别人平摊分享呢？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好偕同上路。

货郎客在炕上辗转反侧，跟老婆烙死面饼子似的，眼前幻化出的全是金轭子和银抹挂的光影；几次试着闭上眼睛装睡，脑海里浮现的仍是金轭子和银抹挂。他失眠了，多半夜失眠了。失眠的滋味不好受，跟死囚犯人坐牢似的，一点由不得自己。好不容易熬到鸡叫前后，才恍恍惚惚入睡。睡梦中，他梦见自己不但得到了金轭子和银抹挂，而且还意外地获得了金杠头和银缰绳，翻越仇池山，途经武都、文县，回到了四川老家，建起了豪华庄园，购置了万亩良田，牛羊成群，骡马成队，富甲一方。后来，家也越发越大，奴婢成千上万，竟然在地方自设小朝廷，当上了小皇帝。文武百官每早朝见，宫娥彩女天天做伴，歌舞不停，酒肉不断。一日，正当他在宫中寻欢作乐之时，突然闯进一对寻仇的刺客，双双利剑直臂向他的胸膛。他吓得灵魂都出了窍，紧躲忙闪之间，着了一剑，疼得大叫一声，惊醒过来。他浑身冷汗，好久才从梦魇中回到现实。

货郎客心里有事，晚上根本没休息好。

清早，同伴要乘凉上路了，他仍赖在炕上，推说身子不舒服，不肯上路。同伴放心不下，要留下来陪他照料他，他死活不答应，口口声声道：“不碍事，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货郎客支走了同伴，趑身又来到河湾处。可是，整整找了多半天，连金轭子、银抹挂的影迹都再没见着。

难道让人拿走了？这是不可能的！晚上黑灯瞎火的，谁有闲情逸致到这河湾逗留呢？白天都觉着阴森恐怖，晚上岂不吓掉三魂七魄。况且，货郎客行事缜密，守口如瓶，绝不轻易放过这次发财的机会。

他在继续寻找着。

突然，眼前出现了奇迹，跟昨天午后见到的情景一模一样：金轭子和银抹挂依然还在河里，那么光亮！那么诱人！奇怪的是，任你将河沙翻来倒去，

任你往返来回跑动，金钹子和银抹挂老是在移动着位置，始终抓不到手里。渐渐地，他找出了移动的规律，但几番努力，仍徒劳无益，一无所获。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货郎客没有绝望。他太累了，仰躺在河旁的沙滩上，一动也懒得动。实在想不明白，明明就在河中，怎么就捞不着呢？他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脑袋嗡嗡作响。忽然，他一骨碌坐了起来，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两眼死死盯住了对面的山崖，脸上露出诧异的兴奋，自言自语道：“只顾在河里忙乎来忙乎去的，尽干了些猴子捞月亮的蠢事，想不到奥秘竟然在这里！”

原来，金钹子和银抹挂并不在河里，而是在对面的悬崖峭壁上嵌着。上半天的阳光根本照不到山崖，那里一直处在阴影中，到了午后，阳光将其光影反射到水面，才造成了一种假象。随着太阳向西倾斜，光影也随着在河里移动，这就是货郎客瞎忙活的原因所在。

货郎客如梦初醒，飞奔来到山前。山太陡，崖面太光滑，任凭他怎样努力攀爬，都难以够得着。他又选择了侧面，想揪住崖隙中的杂草靠近，但试了几次，仍然没有成功。头晕目眩，两腿打颤，差点掉下了悬崖。金钹子和银抹挂就在眼前，可就是拿不到手里。

货郎好做，奇宝难求。

货郎客束手无策，没急着再去起宝，因为他明白，山崖太险，再急也是徒劳。人生地不熟的，山崖前逗留时日长了，势必也会引起当地人和过路人的种种猜疑，闹不好还会招来灾祸。即使侥幸得到金钹子和银抹挂，也难以带出山峡，回到老家。为此，必须借货郎身份暂作掩护，走村窜户，薄利多销，守住金银，另觅良策。

货郎客美美睡了一觉，精神振作多了。它一改平日省吃俭用、吝啬抠门的惯习，要了一桌上好饭菜，烫了几壶酒，请来店东家和几位当地头面老人上座，认真款待了一番。临了，还每人送了一些针头线脑之物。这种舍小利的做法，再加上一番甜言蜜语，博得了在场人的一致好评。

一连数日，货郎客都没闲着。白天，他挑着货

郎担，出入山峡村头院落，摇动拨浪鼓，与人讨价还价，说说笑笑；晚上，有时不回客栈，便干脆歇息在农家，与人说古道今拉家常，没话找话闲聊。他处处做小，买卖随和，渐渐有了人缘。当然，也了解到了不少当地的历史传闻、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

其实，他可不再是过去惟利是图的小货郎，此时做买卖完全是个幌子。掩藏行迹，频频走动，为的是暗中守护住金钹子和银抹挂，不被别人盗走。行人是永远发现不了崖头之宝，但河对面的人就说不准了，万一再让人瞅出秘密所在，那就坏了大事。

货郎客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

早年间，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自白马氏杨建立仇池政权才闻名遐迩。杜甫涉足，苏轼梦游，吴玠、吴璠三关口抗金等等，有着讲不完的故事，也保留下来了許多独特的民族、地域风俗和掌故传闻。其春信说春拜年、巫师传爷和新春闹社火活动，更是独树一帜，久负盛名。尤其信奉山神和土地之神、推崇牛马王爷，每年不忘定期酬报祭拜。

货郎客灵机一动，沐浴忌口三日之后，挑着一担香、蜡、表纸，怀着虔诚之心，来到山神庙前，祈求指点迷径。

山神庙在石峡与坦途之间的河谷中。

宽阔的河谷旁，平地凸起两块高大的巨石，一高一低，相邻相倚。大者，高约两丈有余，上面平坦，一丈见方；小者，仅比高者低数尺，顶部建有山神、土地庙。

货郎客来到山神庙下，见巨石周围停放着数十口新旧不同、大小不一的明棺，骇得毛骨悚然。这种独特的丧葬风习，他已从当地山民那里了解清楚了，但仍然消除不了内心的恐惧感。当地人去世之后，除了部分及时进入祖茔，葬入土中外，有的便明停于河滩岸边、山崖底下，或寄于崖间幽洞。有女有儿者，葬仪相当隆重，并招待庄村族人。如山向不利，难进祖坟，暂且寄厝，再行二次葬；无儿无女者，便永远成为明棺，让其日晒、雨淋、风化，回归自然，养育万物。

巨石旁尽是纸灰和香蜡残余，看来敬山神的人是很多的。

货郎客强打精神，虔诚地点燃香蜡、磕着响

头、烧着一封封表纸，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着心迹。一切忙完，可他仍有些不放心，带着剩余的一点香蜡表纸，想亲自烧到上面去。攀上巨石顶部极其不易：小一点的，四面如刀削一般，根本就无法上去；高一点的，仅有几十根嵌进石中的木桩，早已朽脱不全，想攀登也太难。当地人到庙中，全靠连接几架木梯上去，可货郎客没有梯子可上，只好平手趴脚蹬。

心诚所致，货郎客不畏艰险，终于登上了巨石顶部。

山神庙坐落在小石顶部，而他却站在大石顶部。站在大石上俯视，两石相距只有三尺多一点。要想到庙中进香，必须要到另一块石上去。货郎客眉头一皱，办法就来了。他站在边缘，瞅准前方，轻轻一跃，便轻松地落在对面。听当地山民说，山神爷非常灵验，只要举心诚，凡事有求必应。他双膝跪地，炷香、点蜡、化纸，磕了不少响头，再次诉说了自己的心愿，请求保佑。可是，当他想顺原路返回地面时，不由得傻了双眼：两石之间还是那段距离，从高处跳到低处轻而易举，从低处回到高处比登天还难——那空隙似乎是增大了，怎么努力也难以逾越。要想从脚下的巨石上寻找路径，陡峭险削显而易见，稍有失足便会粉身碎骨。

这就是西和县南部历史上有名的“双石庙”，亦叫“双石寺”。旁边不远处有唐代摩崖石刻，其中写到“蜀门之隙”，记述的全是唐代成州之地修筑道路的真实情况。

货郎客稀里糊涂上了双石，却没想到会下不来了。

从地面远处望双石庙，只觉得奇特异常，引人注目。但当登上双石，那感觉就大不同，恍若身居半虚空，时时胆颤心寒。

货郎客命悬石上，急得挠耳抓腮。眼看快日落西山了，仍在上面干着急。也是情急智出，忙跪在山神像前，一迭连声地许起愿心来：

“山神爷呀，人们都说你灵验无比，香火旺盛，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当地人沾了你不少灵光。我是个川里上来的小生意人，走州过县无数，还没见过你这样灵的大神。

今天，我是特地诚心诚意慕名敬奉你来的，你就显显灵吧，让我顺顺当当下到地面，日后，我定然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经常来为你供奉香火。倘若保佑我得到金辮子和银抹挂，我自然会分出一半为你再塑金身，定会让你名扬巴蜀大地……”

货郎客恭维着一遍又一遍祷告着山神，额头也磕破了：“你有好生之德，就显显灵吧！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全靠我长年在外跑腾几个钱儿养家糊口，我吃些苦头没啥，更主要的是家里不能没有我。山神爷呀，我说的全是真心话，若有半句掺了假，就让天打五雷来轰！你快救我下去吧……”

山谷里起了一缕烟雾，转眼间不知不觉间笼罩住了双石庙。货郎客吓得手忙脚乱，不慎一脚踩空，从庙门口跌了下去，待睁开双眼看时，居然毫发未损，平安地回到了地面。

“山神爷显灵了！”货郎客仿佛做了一场噩梦，趴在地上朝上磕着响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一定会信守诺言，不忘报答你的大恩！”

货郎客历此奇险，惊吓不小，浑身乍热乍寒，一回到客栈就病倒了。这一病着实不轻，整整在床上躺了六、七天，多亏店主人及时请来巫师祛邪，再加上当地老人的几把草药，才得以脱险康复。“若要知人心，害病遇事遭年馑。”石峡一带民风纯朴，人性善良，货郎客在病中真正有了亲身感受。

货郎客在地狱门上走了一趟，可心里一直放不下金辮子和银抹挂。病刚一转头，他便借故出了客栈，偷偷来到河湾处，瞅着山崖反复看了看，见没有人动过，这才放下心来。山崖险要，无路可攀，让他连日犯难。思来想去，惟一办法就是挪几架木梯攀上去，或者在崖顶固定一条绳索吊下来，但后者实在太危险，没有这个勇气和胆量。况且，官道上人来客往，山中也时有山民，人多眼杂，容易被发现，弄不好还会招来麻烦，甚至于人去财空。

人都是惜命的，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很多人置生死而不顾，甘愿去冒险。货郎客便是其中的一位。

货郎客多了个心眼，接着又特地祭拜了两回山神。此后，他丢掉了货郎担，摇身扮成采药人，时常在山里转悠，并从当地人家借了几架木梯，谎

称发现了几株名贵药材,上了几趟山崖。金钎子和银抹挂完好无损,只是被青杏岩石包裹得太严,很难轻易取出。起初,他用药锄挖,竟然纹丝未动;后来,启用石鑿,岩石太坚硬,只是迸发火星。

货郎客的行踪遮遮掩掩,歇歇停停。他改用表纸烧岩石,岩石依旧是那样坚硬,一点也没变软变脆,反而将金钎子银抹挂熏了个乌黑,表面没有了丝毫光亮。不过也好,除了货郎客知道位置所在之外,谁也发现不了个中奥秘。遇到路人或山民经过,他假装在山崖石隙中寻找药材,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有人若注目问起,他随口便搪塞,完全是一位攀山越壁、敢于冒险的采药人。

一连数日,他在山崖上忙乎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获得核桃、豌豆大小的几十块散碎金银。金钎子、银抹挂太大了,若完整取下来,恐怕连搬也搬不动。

这一日,他累得腰酸腿疼,回到客栈匆忙吃了几口晚饭,便倒身躺在了炕上。实在太累了,头一挨枕头就沉沉昏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中房门一响,忽然撞进来了一位白发苍苍、手拄屈木拐杖的老者,面带笑容道:“客官,你远道而来,不忘来敬奉我,你的香火,我已受领,也救过你一命,算是有过答谢。你祈求取宝一事,我实在帮不了你的忙,也不敢满足你的欲望,因为你不知道,那金钎子和银抹挂是当年金牛大仙帮助山民时遗落在此地的,至今已有几千年了,五百年才会一现,谁也没发现过,谁也没动过,你有幸得到那么一点,是你前世修来的造化,但切记不可再贪。实话告诉你,我何尝不想让世人再塑金身,但无功不敢受禄。金牛大仙曾责令让我守住此宝,我一日不敢懈怠。昨天,过往神捎话给我,金牛大仙已知此间之事,让我设法及早赶你离开。若继续敲取下去,将会降下大难。到时,你不但性命有忧,恐怕连我也要受到惩罚!”老者话多,缓了缓气,又道:“这是天机,万万不可泄漏!积德行善,童叟无欺;知足常乐,平安是福,早早离去,做你的生意去吧!切记,天机不可泄漏!”

老者正是双石庙的山神。

货郎客惊醒,始知刚才才是山神给自己托梦。他

如同在三九天被人兜头泼了半桶凉水,浑身打着冷战,眼睛越睁越大,再也睡不着了。“积德行善,童叟无欺;知足常乐,平安是福……”山神的话言犹在耳畔,不时在敲打着警钟。

不该属于自己的不可强求,货郎客的身影在石峡关一带消失了。

“庄稼汉人的秆茬,生意人的打划。”十多年后,石峡关客站的老板到四川办货,见到了当年的货郎客。货郎客苦心经商,已非昔比,早成了富甲一方的茶庄大户。他曾多次得到过老板的帮助,也十分感激石峡关人的热情好客,将其邀请到家里,一连盛情款待了数日。此后,互通有无,生意往来频繁。他是个有心人,三年两头到石峡来敬山神。到了晚年,一次醉酒之后,才失口道出了昔日的一番奇遇——他是靠金钎子和银抹挂上的一些散碎金银发家致富的。

后来,据说他的儿孙后代,还长途跋涉到双石庙敬山神呢!

货郎客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渐传渐远,渐远渐淡。但在当地,却口耳皆碑,代代相传,越传越丰富,越传越神奇。

今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天堑变成坦途,人背肩挑畜驮的年代早已离我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往来不绝的各种车辆。那神秘的双石庙饱经历史沧桑,虽屡毁屡建,但至今依然耸立在河谷的巨石上;那五百年一现的金钎子和银抹挂,不知在等待哪个有缘之人,谁也猜测不出。

传说总归传说,并不代表史实。可是,在史料记载中,盐官、西和城、石峡关(俗称石家关)和纸坊镇等一直是陇蜀道上的必经之站,即便到了民国末年,民间脚户、背脚子、货郎客来来往往,歇脚经商,仍十分活跃。这则传说虽出自民间口碑,但也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和地域风情,对今天人们研究地域特色文化,以至蜀道“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注:文中故事,据西和县石峡镇坛土关唐东亮等人口述整理;流传于西和南部;搜集时间为2005—2008)

(作者单位:甘肃陇南西和县志办公室)

# 商周时期甘肃部落氏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刘光华



中国的文明时代是从夏代开始的。文明时代是与野蛮时代对举的。野蛮时代是氏族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而文明时代已经形成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国家。国家则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的,所以它的最高统治者除了有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和统治机构外,还要对直接控制地区之外的被征服地域进行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赋税,实现对被统治者的剥削。国家不仅有管理被剥削者的机构和职官,而且还有保证剥削、镇压被统治者的法律、监狱和军队。这就是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文明时代。

夏王朝统治的地区未达到今甘肃。商周王朝虽然势力达到今甘肃地区,但甘肃东部的许多部落氏邦,它们的社会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共同体,各自生存,以力为雄,处在文明的前夜。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只是一种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政治归属,还没有什么管理的概念,也没有派遣代理人,所以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把商周时期甘肃部落氏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作为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形成的绪论,以说明甘肃建置区划发生的过程。

## 商代内外服制下的甘肃封国氏邦

到了商周时代,今甘肃地区逐渐和商、周王朝发生联系。王是商、周王朝最高的统治者。商王所

在的京(王)畿,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居住着商王族及其同族近亲的“王族”、“多子族”以及和商族有姻亲关系的“多生”<sup>①</sup>,所以称作内服;“百僚庶尹”,不过是为王族近亲服务的职官而已。王畿以外称作外服,分布着商王通过武力征服而归属的一些部落氏邦。所谓“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它们在外服中的不同,反映着它们与商王亲疏关系的不同,因而担负着不同的贡纳义务。史籍记载,成汤时的外服中,分布有 3000 多个方国。<sup>②</sup>据研究,商王朝直接控制的,是以一个大邑为都城为中心地区;而“王畿之外的四方星罗棋布地分散着王朝所分封或承认的许多大小方国。它们杂厕于许多与王朝并立或敌对的其他方国之中。这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无主的荒地草原。”每一个方国,其实就是王朝控制的一个“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还散布着一些不属于王朝的方国。<sup>③</sup>这些“方国”的社会与商王朝一样,都是依靠氏族制残留的血缘关系维系的,它们并不完全具备国家的形态,所以有学者称之为“是自然长成的结构组织或由此发展而成的方国”。我们既可称他们为方国,也可称他们为部落氏邦;他们中的一部分臣属于商,是因为商王朝有强大的武装威慑力量。商王朝正是凭借强大的武力,规定了他们对王朝应尽的义务。所谓“侯、甸、男、卫邦伯”,据《逸周书》孔

晁注：“侯，为王者斥候也”；“甸，田也，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卫，为王捍卫也”。显然“侯”“卫”是兵役，“甸”是生产性劳役，“男”是其他专门性劳役。率领民众完成服役任务的，则是臣服于商的各方国首领——邦伯。所以有学者称之为“指定服役制度”。<sup>④</sup>商王朝没有向方国派遣什么官员，邦伯继续统治着本族族众。本族族众还是按原来的方式生活、生产。至于那些没有臣服于商王朝的部落氏邦，它们之间既没有政治关系，也就没有什么经济义务，理论上相互间是平等的。

商朝中后期，其影响已经到达今甘肃东部。1978年在庆阳市董志原，就曾出土过一件有“乍册吾”铭文的商代青玉大戈，就是证明。见于记载的甘肃东部地区方国有豳国、密须国、阮国、共国、吕国、芮国、虞国、彭国、卢国、奚国等，其中有些是商王朝的属国，有些则不是。下面兹对其情况作一些简单的介绍。<sup>⑤</sup>

**豳国** 这是姬姓先周族建立的方国。夏代末年，先周族的不窋率领族人，迁徙到“戎狄之间”的今庆阳市庆城县一带。商朝初年，先周族的公刘又率领族人，从“戎狄之间”的庆城县一带向南迁徙，到达陕甘交界的豳地（包括今甘肃宁县、陕西旬邑一带），建都于京，史称豳国。据研究，描写公刘迁豳的《诗经·豳风·七月》中，有管理农业生产的“田峻”；农民除了耕种、收割、采桑、育蚕、狩猎、纺织等基本劳作外，还要在许多方面供贵族役使。贵族们过着悠闲奢华的生活，庶民大众则终年忙碌，苦不堪言。诗言“其军三单”，“单”是指挥部众的旗帜。旗帜既是贵族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也是军事编制层级的标识，又是指挥、调动军队的令箭。在甲骨文中，表示血缘共同体的族字，字形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旗下是一支箭，意在显示血缘共同体与军事编制的合一。所以，《七月》诗中的“其军三单”，可能是指周部族所含的三个胞族。用军事编制术语划分族体，说明其超越军事民主制社会发展阶段的时间还不是很久。

商王朝前期的先周族，与商还没有发生联系。而到了商代后期，古公亶父又从豳迁到岐山之下周原，建立了周国，商周之间不仅发生了联系，而

且成为商王所封的“西伯”，即西方方伯，说明周国势力已经强大，直到取代商朝。

密须国《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三年“伐密须”，《集解》引应劭语，说须密是“姑姓之国”；引臣瓚曰，说密须国地望在“安定阴密县是。”《正义》引《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按：汉安定郡阴密县即唐泾州鹑觚县，在今平凉市灵台县境。又民国《灵台县志》记载：“密须国故城在今县西五十里，即今之百里镇也。”考古工作者在今灵台县百里镇西南达溪河与南川河交汇处的三角台地内，发现了三处城垣遗迹，认为即密须国故城遗址。

关于密须国的历史情况，我们只知道在商代晚期，它是商的重要方国；同时活动在今陕西西部的周国逐渐强大，在其国君姬昌称文王的第三年，发动了对密须国的战争，理由是它侵略了与之相邻的阮国、共国和莒国：“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sup>⑥</sup>今本《竹书纪年》亦载，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西伯，即周文王。当时的周国准备取代商朝，因而对属于商的密须国进行讨伐。而密须国不顾周国的强大而进攻其属国阮国和共国，是向周国公开挑战，说明密须国有抗衡周国的实力。而周国为了与商朝斗争，也必须稳固后方，所以灭密须是其战略上的考虑。战争中密须国虽经过顽强抵抗，但终究失败了，其国灭亡。密须国的特色手工艺品：“密须之鼓与其大路（一种只限于天子和诸侯乘坐的车子）”<sup>⑦</sup>被周军抢去，作为国君大规模田猎活动时举行大蒐之礼的祭器；后来周初大分封时，又赏赐给了唐叔虞，作为镇国之宝。

19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周原发现了一批甲骨卜辞，其中几条与密须国有关，兹引述如下：

今秋王西克往密（H11:136）

王其往密山昇（H11:80）

于密（H11:31）

密西城（H131:5）<sup>⑧</sup>

这些新发现的资料，是与周灭密须国之事相关的。另外，今灵台县之名，也与文王伐密须国有关。据说周文王灭密须国后，曾在其境筑台祭天告祖，该

台被称为灵台。今灵台县城南尚存古灵台遗址。

阮国、共国和莒国有关阮、共两国的事情,仅见于《诗经》,已叙述于密须国目中。这里要说的是这两个小国和莒国的具体所在。

《通典·氏族略》记载:“阮氏,商之诸族,国在岐渭之间,周文王侵阮徂共,见于《诗》,子孙以国为氏”。杜佑说阮国是“商之诸族”,不详其依据;而说阮“国在岐渭之间”,亦有误差。又云:“共氏,亦作恭,商末侯国,今河内共城,即其地也。”《通典》对阮、共两国地域方位的判断,并不正确。据“侵阮徂共”,则阮、共两国是近邻。若据《通典》,共国在“河内共城”即今河南辉县,而阮国在“岐、渭之间”,则在关中西部,两国相距太远,而且共国远到了商王朝之中心的殷都附近,故不足为据。朱右曾《诗地理征》卷五“阮”字条云:“张氏曰:阮,国名,在今泾州。右曾按:《地理志》安定郡有爱得县,爰重言之为阮。故城在今泾州东南,于密须为东北也。”则阮国在今泾川县东南。同上书同卷“共”字条云:“张氏曰:泾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右曾按:共池在泾州北五里。”又甘肃学者慕寿祺认为,共国因共池得名,“共,池名,在泾川县北五里兼山下水泉寺,方广一亩。”唐泾州治所,在今平凉市泾川县城泾河北岸的水泉寺。朱说是对的,即共国在今泾川县城北泾河北岸水泉寺及其以北一带,阮国在今泾川县东南一带。

关于莒国,上引《皇矣》之末句“以按徂旅”,“按”音遏,遏止;“徂”,往;“旅”,孟子作莒,古国名。而王肃释诗云:“密人之来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于是整其师以止徂旅之寇。”<sup>⑨</sup>则旅即莒即吕,与阮、共同为被密须国进攻的小国。

吕为夏商时代姜姓族建立的小国,旧注以为在今河南南阳一带,不妥。古文《尚书》逸篇有《旅獒》,言周初“西旅贡獒”。“西旅”即西土之旅(吕)国,既为周人伐密须战争涉及到的几个方国之一,其必在阮、共附近。传世铜器有吕王壶、吕王鬲,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高足鬲,出土于灵台县独店乡吊街村;鬲内底有“吕姜作簠”铭文。吕为国名,吕姜为吕国夫人。独店乡在灵台县东北不远

处。

芮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看来虞、芮两国是周的属国。虞、芮在《诗经·大雅·绵》中也有记载:“虞、芮质厥成”。虞国与芮国应是近邻,据研究,虞即吴,虞山即吴山、汧山,在今陕甘交界一带。它们之间曾发生纠纷,后来由于受到周文化的影响,化解了矛盾,并归附了周国。

芮国,旧注以为在今晋西南,不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第9-10图,标芮、虞于今陕甘交界一带。《汉书·地理志》记载,雍州的大川有汧水,颜注“汧在邠地”。汧水即芮水,发源于陇山,是流经今平凉市境的汧河。芮国当因汧水为名,当在今华亭、崇信县境,是周的属国。殷墟出土了一片《小臣墙刻辞》,记载周国一次征伐陇东小方国的战斗中,曾俘获“内人五百七十,奚女百六十”。“内人”,即芮国的部众,说明芮国与商王朝有矛盾斗争。

奚国在今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地中,有一座奚(不是双人旁,而是阜旁)伯墓(M2),为奚邑之主。奚地因山得名,故字从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西至于崆峒,登鸡头”,《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的鸡头、鸡头山之“鸡”,繁写为“鷄”,鷄字从鸟,奚声,故鸡山即奚山,亦即平凉市境内的鸡头山、崆峒山。殷墟卜辞有“甲辰卜,殼贞,奚来白马。王占曰吉,其来马五。”(乙8449)反映的是奚国对商王朝的贡纳。“奚”即奚国,说明周军俘获了两国的男女七百三十;又,周原甲骨卜辞有“奚子来降”(h31:2),说明奚国原属商王朝,后来又归降了岐周。宝鸡竹园沟出土了一件“奚父乙壶”,亦说明奚国的存在。

蜀国商周之际,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军有八个盟国参战。它们是:庸、蜀、羌、鬲、微、卢、彭、濮等国,而且誓辞中明确被指为:“远矣西土之人”,是西方反商的方国。<sup>⑩</sup>这里叙述在今甘肃的国家。

蜀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泛指蜀国在今四川。顾颉刚认为:“蜀之北境本达汉中,故《蜀王本纪》有‘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之事<sup>⑩</sup>。”王宗维说:“据《华阳国志·汉中志》,武都、阴平多氐、叟的记载,则氐、叟杂居,因此参加武王伐纣的蜀,实际就在甘肃东南部。”<sup>⑪</sup>即今陇南市。综合言之,蜀北境达于今汉中、陇南。

髡国 商周之际,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军有八个盟国参战。它们是:庸、蜀、羌、髡、微、卢、彭、濮等国,而且誓辞中明确被指为:“远矣西土之人”,是西方反商的方国。髡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姚府以南,古髡国之地。”唐姚州治今云南姚安,髡国辖地就到了今云南昆明及其以西地区。顾颉刚说:“‘髡’、‘茅’同声,疑即一族,盖居今山西南端者。”<sup>⑫</sup>王宗维认为:“髡不是茅而是苗,舜曾‘窜三苗于三危’,三危在‘鸟鼠山西南’,即今洮河上游,苗与羌是杂处的,所以髡就是苗。”<sup>⑬</sup>在今甘肃境内。

卢国 商周之际,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军有八个盟国参战。它们是:庸、蜀、羌、髡、微、卢、彭、濮等国,而且誓辞中明确被指为:“远矣西土之人”,是西方反商的方国。卢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戎府”,指唐代剑南道之戎州,治夔道县即今四川宜宾市,则“戎府之南”,包括今川南及云贵一带,这里的卢国,显然不符合“西土之人”的泛指。顾颉刚说:“微”通“眉”,是陕西的眉县,卢与微距离相近,认为“此四国(指庸、濮、彭、濮)与蜀均在汉水流域。”<sup>⑭</sup>然《甘宁青史略》认为:《牧誓》所言八国中的“卢”与“彭”,都在今甘肃境:“卢,古卢戎国,今平凉华亭县都卢山古城是。”

彭国 商周之际,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周军有八个盟国参战。它们是:庸、蜀、羌、髡、微、卢、彭、濮等国,而且誓辞中明确被指为:“远矣西土之人”,是西方反商的方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戎府之南”的彭国,显然不符合“西土之人”的泛指。顾颉刚认为,“此四国(指庸、濮、彭、濮)与蜀均在汉水

流域。”<sup>⑮</sup>王宗维认为:“渭北有彭衙(今陕西白水县),郑(陕西华县)东有彭戏氏,此八国中的彭当时就在关中地区。楚西北的彭,当是后来迁去的。”<sup>⑯</sup>也有学者认为,彭在今甘肃境内的。《今古文尚书全译·牧誓》注“彭”曰:“在今甘肃省镇原县东”<sup>⑰</sup>,是说彭国在今镇原县境之汉彭阳古城。

牧野之战中的羌、微、濮、庸四国,古今学者认为不在今甘肃地区,故不赘述。

羌方 与羌方国同族。羌方国是羌族中与中原诸族发生关系较早,社会发展较快的一支,活动在关中西部,学术界称之为炎帝后裔姜姓诸国。而分布于西北广大地区的羌方,社会发展落后,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所以它对其附近的部族、方国甚至对商朝的掠夺,被认为是“正当职业”。商王朝为了保卫自己,同时为了扩大领土、掠夺财物和奴隶,也不断对羌方用兵。卜辞有“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的记录,即调发13000人伐羌,可见战争规模很大;战争中的战俘源源被掠夺而来,所以商贵族祭祀祖先时以羌人作“人牺”的数量很大,如“三百羌用于丁”(《续》2.16.3);为了表示祭典的隆重,商王还用羌方的首领作人牺:“羌二方伯其用于且丁祖乙”(《京津》4034)。羌方被征服后,又成为商外服中最低一级的“卫”,如卜辞中的“羌卫”;此外还有“田羌”的记录,就是商王到羌方去田猎;羌方派人来朝见商王,商王还亲自迎接,如“王于宗门逆羌”(《甲》896),反映着商王朝与羌方贵族相互利用关系的非同一般。商对羌人的战争是残酷的,羌人被俘虏,甚至作为祭品遭杀害,其族还要按时贡纳,则反映了奴隶制的本质。

#### 西周五服制下的甘肃封国氏邦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西部反商势力组成的联军,向东进发,从孟津渡过黄河,陈兵牧野,与商王朝展开了大决战。“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sup>⑱</sup>商朝灭亡,西周建立。

西周建都镐京,其政治中心在陕西的中部和河南的西部地区。它对全国的控制,据《国语·周语》记载,是通过“五服”制度进行的。“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法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商朝实行的是内服、外服之制。而西周实行的是“五服制”,即将全国划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和荒服。所谓“邦内甸服”,是指京畿,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所谓“邦外侯服”,是指邦畿以外,是分封诸侯的地区;所谓“侯、卫、宾服”,是指已归服的前代帝王后裔的小国,是王朝要以客礼相待的地区;所谓“蛮夷要服”和“戎狄荒服”,是指东南蛮夷之族和西北戎狄之族的部落。“要服”,是王朝要加以约束的,因为其经济、文化与中原基本相同,要向王朝“岁贡”;而“荒服”,是西北戎狄族部落,王朝对它们的要求是“终王”,即《诗·商颂·玄鸟》“莫敢不来王”的“来王”,亦即王朝的先王去世、新王即位时,荒服的戎狄首领要来朝见新王。

今甘肃地区有封国,但主要是戎狄活动区,因而侯服、宾服与荒服并存。密须、西申以及封于秦邑的大夫嬴非子等就属于侯服、宾服。西周分封制是以宗法制为原则进行的。宗法制的继承原则即嫡长子继承为大宗,庶子分封为小宗;异姓诸侯、大夫的继承,也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所以血缘关系笼罩着整个政治生活,天子是天下的家长,诸侯是封国的家长,大夫是采邑的家长,全国就是一张用血缘关系编织起来的大网,是一个血缘大家族,既没有行政区划,也没有行政长官;有的只是大宗、小宗严格区别下的诸侯、大夫、士。

下面具体谈甘肃的方国、部族。

密须国 岐周国曾灭了姁姓的密须国。由于密须地区是关中西北的屏障,所以西周建国后,仍然封建了密须国。西周时的密须国是姬姓,还是姁姓?今已无法考定。如果是姬姓,则为周初分封之国;如果为姁姓,则为继绝之国。按五服之制,或属

于邦外侯服、宾服。《史记·周本纪》记载:“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三兽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粦。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粦,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这是说密康公未将来“奔”之三女献给共王,而是霸为己有;并拒绝其母之劝告,终于引来灾祸。周共王在位23年,约为前10世纪末,则西周之密须国存在了约140年。<sup>④</sup>

西周王朝在密须国地域驻有重兵。据《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一文,在灵台县百里镇附近的白草坡等地,清理、发掘了许多西周贵族墓葬,其中M1、M2所出青铜礼器铭文显示,墓主分别是溇伯和徯(耳旁)伯。据研究,白草坡墓地出土的武器戈共57件,包括10种类型,而溇伯和徯伯二墓所出即达53件,含7种类型,这表明墓主必定是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他们驻守原密须国地区,肩负着卫护王畿的西北门户<sup>⑤</sup>。当时西北地区戎狄势力猖獗,在这里驻守重兵,主要是防御涇水上游地区太原之戎的。

中国 在西周,史籍记录羌族的活动比较少。传世青铜器有《羌伯敦》,王国维考证曰:“铭中又述其祖有功于文、武,当指羌、茅从武王伐周之事”,其“形制文字与中原礼器无异”。<sup>⑥</sup>但在史籍中却找不到该羌伯甚至羌族活动的任何影子。因此有学者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的西戎,多是由羌族演化而出,西戎中包括了羌族诸部。只是由于不同时代人们记录民族活动用语习惯不同,造成了羌族在文献中的消失。这个认识不一定全对,但却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解释。

中国是姜姓,是羌族华夏化了的姜姓部族的四大族姓(齐、许、申、吕)之一。姬与姜,是古老的通婚族,周始祖弃的母亲就是姜嫄。周武王灭商的军师,就是姜尚,后来被分封于齐国。周初就有申国,据考证,其地域“当在今甘肃天水甘谷以西地区。”<sup>⑦</sup>周宣王时,中国的一部分东迁谢邑,在今河南南阳一带,《诗·崧高》就是反映这件事的。但原来的中国仍然存在,被称作西申。由于中国最早在

甘肃,所以它才能与西汉水上游的嬴姓族通婚,即所谓“申骆重婚,西戎皆服”。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废申侯的女儿申后,立褒姒为后,这件事引起申侯的不满。《竹书纪年》明确记载:太子宜臼“奔西申”。申侯遂联合大原的犬戎,进攻周王朝。犬戎入镐京,杀幽王及褒姒、伯服,灭亡西周。这里的申侯,只能是西申的国君。

附庸、西垂大夫 西周时期的嬴秦族,由于一直商王朝效力,起初曾遭到周王朝的镇压。飞廉及其儿子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sup>②</sup>蜚廉的一个儿子季胜的后代“别居赵”,传至造父,为周穆王“御”。穆王攻伐犬戎,“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sup>③</sup>恶来死后,其子女防一支的后代(大骆以前),“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依附于赵城赵氏。这时,犬戎被穆王从西犬丘迁到太原。女防一支传到大骆时,脱离了赵城的赵氏,移居到犬戎的旧地西犬丘,开始了在陇右独立发展的历程。这一支嬴秦族在陇右有两个据点,一个是西犬丘,一个是秦邑。

先说西犬丘。《秦本纪》记载说: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嫡。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邠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湣,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陆。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嫡者,以和西戎。

据上引资料,嬴秦族第一次与周国发生关系在商代后期,即中湣曾一度“归周,保西垂”;第二次与周王朝发生关系在大骆时,大骆迁居西犬丘,并与申侯的女儿结婚,以和西戎,“申骆重婚,西戎皆服”。《秦本纪》有“大骆地犬丘”语,《水经注》有“犬丘大骆之地”语,人名与地名发生联系,说明该

人首次居住该地。这是嬴秦族为周王朝保西垂的第一个邑,但没有周王朝等级制度中的名分。

犬戎邑的具体所在,《水经·漾水注》曰:

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径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犬丘大骆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又东南流,右会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东北流,径戎丘城南……又东北流,注西谷水,乱流东南,入于西汉水。

据此,犬丘在西汉水上游杨廉川水“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之后,“右会茅川水”之前的“西县故城”,今人考证在礼县红河乡的费家庄和岳家庄一带(今人对此有不同意见)。这是古籍中大骆之族在陇右的最早居邑,也是大骆、嫡子成“和”戎的中心。

关于秦邑,是嬴秦族为周王朝保西垂的第二个邑。上引非子善于养马,“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因为非子养马功劳,“孝王欲以为大骆嫡嗣”,让他取代嫡子成为嬴秦接班人的地位。申侯反对,遂说了上引“申骆重婚,西戎皆服”那一段话。于是孝王封非子为“附庸”,“邑于秦”<sup>④</sup>;“亦不废(居犬丘的)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保住了嫡子成的地位。

秦邑的具体地点,《水经·渭水注》记载:

(秦)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秦水西径降陇县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陇山,合而西南流,径降陇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历陇川,经六槃口,过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清水又西南得绵诸水口……清水东南注渭。秦水发源于今张家川县东北,清水发源于今张家川县东。秦水所经有秦亭,在降陇县(即汉陇县)故城北,然后经降陇县故城南西南流,于汉清水县西注入清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1953年以原清水县北部为基础新成立的,包括秦安、陕西陇县的部分土地,所以,《括地志》说秦亭在清水县。秦水只能是流经今张家川县的后川河,川有故秦亭。秦水在今清水县以西汇入牛头河(即清水)。所以,秦

邑或秦亭都在秦川,即今张家川县城附近。

到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并派他讨伐攻占犬丘的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有5个儿子,长子叫庄公。宣王乃召秦仲子庄公兄弟5人,与兵7000,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陇右的两支嬴秦势力才归统一。<sup>②</sup>嬴秦族遂从不达于天子的“附庸”,升格为西垂大夫,其政治中心又转移到西犬丘。成了周王朝镇压西戎的重要力量。

庄公有3个儿子,老大叫世父。世父给弟弟们说:“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于是将西垂大夫之位让给了弟弟襄公,自己将兵伐戎。襄公为太子。庄公卒,襄公代立,这已经是周幽王之时了。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戎归世父。”西周时期秦戎在陇右的斗争告一段落。

犬戎 西周时的西北民族。据文献记载,犬戎原为东方“九夷”中的“吠夷”。夏末,“吠夷入居邠岐之间”,东迁关中,后来继续西迁于陇山以西。先周族从公刘时起,就面临吠夷的威胁。西周建立后,它仍为王朝的劲敌。“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大原。”<sup>③</sup>这里的“五王”,或为犬戎的五个氏族;而白鹿、白狼,则是它们的图腾。周穆王西征的地域,大致在陇山以西。打败犬戎之后,穆王遂迁其于大原。大原累见于文献,如夷王时派“虢公伐大原之戎”,宣王时又“派兵伐大原之戎”等。大原亦作太原,地域十分广阔,但其中心在陇东一带。大原戎是以畜牧业见长的部族,一直与西周王朝对抗。甘肃的寺洼文化有三个类型,其中合水九站类型,或与大原的犬戎族有关。

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这引起申后父亲申侯的不满。申侯遂联合犬戎,攻入关中,“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西周灭亡。<sup>④</sup>犬丘大部分进入关中,后融合于秦人之中。

氏戎 我国上古就有氏族。《诗·商颂·玄鸟》:“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郑笺曰:

“氏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逸周书·王会解》记宗周属国贡纳的物品曰:“氏羌以鸾鸟”。孔晁注“氏羌”:“氏地之羌,不同,故谓之氏羌,今谓之氏矣。”这里的氏羌,被视为氏地之羌,即氏戎。

犬戎原活动于陇山以西。穆王打败犬戎,并迁其于大原,西汉水上游为氏戎占领;此后,嬴秦离开山西,向西逐渐进入陇右地区,并将政治中心迁入西汉水上游地区。为了生存,嬴秦与氏戎的斗争,遂成为西汉水上游秦戎斗争的重要内容。

西汉水上游地区既是秦人兴起的地区,也是秦戎斗争的重点地区。秦人在陇右地区是代表周王朝(以附庸、西垂大夫身份)“以和诸戎”的,并且从这里开始,逐步走向了关中和全国,所以西周中后期的秦戎斗争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近年国内一些文物考古单位和有关高校,联合组建了早期秦文化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地区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出版了《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据该《报告》称,根据西汉水上游河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镇到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秦文化分布区;石沟坪以南为寺洼文化分布区;而大堡子至石沟坪之间,为周秦文化和寺洼文化交错分布区,即两种文化的拉锯地段。这里说的周秦文化,就是指早期秦文化。而寺洼文化,则是戎人或西戎文化。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属于何种“戎”?有学者认为是犬戎,但他们忽视了周穆王曾西伐犬戎,并迁犬戎于大原的事实,这说明西周中后期犬戎的活动区移到了大原。所以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主人,不应是犬戎。据记载:

自冉駹以东北(冉駹“在蜀之西”,“冉駹以东北”,当指白马氏聚居区,主要今甘肃陇南地区,也包括与陇南接界的川北、陕南一些地区),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

(《史记》、《汉书》、《西南夷列传》) 氏人“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着袒露,

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氏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獠道者也。

（《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

这里的“氏”，与以游牧为生的犬戎族显然有别。据此，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主人，只应是以白马氏为主的氏族。（参见刘光华《关于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族属问题》，未刊稿）就是今天天水地区“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獠道者”，也是氏族。氏族对周王朝有服有叛，可谓叛服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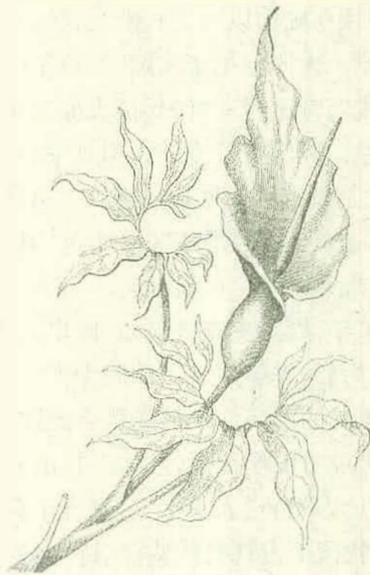
注：

- ①有学者认为“多生”即“多甥”，见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第42页。
- ②见《逸周书·殷祝解》、《尚书大传》、《战国策·齐策》等。
- ③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335页。
- ④赵世超：《三代的指定服役制度略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9月第28卷第3期，5-10页。
- ⑤以下各国情况的介绍，是依据祝中熹著《甘肃通史·先秦卷》，恕不一一注明。
- ⑥《诗经·大雅·皇矣》。
- ⑦《左传》定四年。
- ⑧陈全芳：《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
- ⑨袁枚：《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53-354页。
- ⑩《尚书·牧誓》。
- ⑪《史林杂拾初编·牧师八国》，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页。
- ⑫《西戎八国考述》，载《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 ⑬《史林杂拾初编·牧师八国》，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页。
- ⑭《西戎八国考述》，载《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 ⑮《史林杂拾初编·牧师八国》，中华书局，1963年

版第32页。

- ⑯《史林杂拾初编·牧师八国》，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页。
- ⑰《西戎八国考述》，载《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 ⑱江灏、钱宗武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56-357页。
- ⑲《史记·周本纪》。
- ⑳关于共王在位的年代，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8页。
- ㉑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 ㉒《观堂别集》卷二《羌伯敦跋》。
- ㉓见杨宽：《古史论文选·西周列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 ㉔《史记·秦本纪》。
- ㉕《史记·秦本纪》。
- ㉖“附庸”，据《孟子·万章（下）》解释：“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故称附庸。”就是封地不到50的大夫，遇事是不能上达天子的。
- ㉗《史记·秦本纪》。
- ㉘《后汉书·西羌传》。
- 见《史记·周本纪》、《秦本纪》。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甘肃省志·建置志》总纂）



# 兰州黄河河道变迁与生态环境

薛方昱

黄河,造就了兰州。兰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黄河息息相关。本文要探讨的就是黄河流经兰州河谷平原时的河道变迁、成因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一、古代兰州河谷平原黄河主支道走向

古代的黄河,由于上游及兰州境内,植被良好,水量比现在大数倍。流经兰州河谷平原时,除主河道外,又分出若干支道和汉道。形成了大小不等的河心滩,如新编《兰州市志》第二卷《自然地理志》记述:“兰州黄河河谷盆地内,河心滩及两岸的边滩较为发育,在西固区有青春滩、新合滩、夹滩、蛤蟆滩,在七里河区有崔家大滩、马滩、骚孤滩,在安宁区有张家滩(七一滩)河湾滩、黄家滩、夹河滩、马家滩、刘家滩、迎门滩、孔家滩、和平滩等,在城关区有中心滩、雁滩等。”<sup>①</sup>

在七里河、安宁、西固区所属的兰州中平原,黄河支道都在黄河主河道近处,如崔家大滩南河道,迎门滩北河道,马滩南河道,距黄河主河道最远处约1公里左右,长约1—2公里。说明西固、安宁、七里河河谷平原的二阶地较为完态,河心滩均在主河道边缘。而黄河流经兰州东平原即今城关区后,由于桑园峡的阻碍,河流不畅,情况就大不一样,一是黄河支道、汉道多,交错纵横,二是河心滩遍布,如滩尖子、大雁滩、小雁滩、傅家滩、宋家滩、李家滩、刘家滩、小刘家滩、张家滩、苏家滩、北面滩、南面滩、均家滩、红柳滩、里五滩、骆驼滩、高滩、段家滩等18滩。另外还有中心滩和庙滩子。三是两条重要的古河道在宋代和明代先后堵塞,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研究兰州(金城)城址变迁的同时,就注意调查兰州河谷平原黄河支道的变迁,经过多年的实际调查,并参照有关文献资料,现重点就兰州东平原黄河支道的大致走向分述于后:

(一)金城临河道,即绣河沿道。该支道开口于省交通厅和兰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南侧,东南流经西关什字,永昌路百货大楼,绣河沿,又沿武都路东流,在酒泉路稍西,分为两条汉道,一条向南,至中山林微北,沿民主西路、民主东路东流…。另一条则沿武都路东微南流,经小沟头,东南流至民主东路原邮政大楼附近与前述的汉道汇合。又东流与另一条黄河支道河水道汇合。其主要依据是:

1. 隋唐故城北临黄河支道。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曾路过兰州时,留有《题金城临河驿楼》一诗。该诗云:

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  
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  
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  
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

隋唐兰州治金城(又名五泉),该城南依龙尾山根,北临绣河沿,西至上沟,东至南关十字以西约10余米处。详见拙作《兰州城址变迁考》<sup>②</sup>。唐代的金城驿,只能设在金城城内或城关,不可能设在黄河北面的金城关,更不可能设在远离金城的今河口,否则就不能称作金城驿。诗中“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是唐代金城依山临河的真实写照,从而证实确有一条黄河支道,从唐代金城的北城墙下向东流去。

2. 绣河沿,实为臭河沿,因臭不雅,故后来人美称其为绣。该地名尚存,在今双城门以北近处,为唐代黄河支道的南岸。在绣河沿稍北的今永昌路原百货大楼一带,地势低洼,地表一米以下为沙石层,证明这里曾为黄河支道流经之地。

3. 在今南关什字西约10米处,笔者在实际查看中发现有一段北南走向的垃圾堵塞坑道,起初认为是废城遗物,后经反复研究,才认识到是一条北南走向被填塞的古河汉道。

4. 小沟头,访问当地长老传说以前是一条干涸的河沟,后被填塞变成了行人小道,其走向是由西北向东南,说明是一条被堵塞的黄河汉道。

5. 今中山林、五泉山以北的民主西路,民主东路,地势低洼,最低处的铁路局以北至平凉路与民主东路十字一带,每遇大雨,积水深达0.5米至1米。在五泉山东北,民主西路稍南有一地名叫闵家桥,证明为古河道必经之地。

(二)河水道。该河道开口于滨河东路今兰州市政府一带,流经青年牧场、鱼池子。又东南流,经广场东口、平凉路、汽车东站、于民主东路与隋唐金城临河道汇合,又东流经定西南路、嘉峪关西路、嘉峪关东路、焦家湾,于拱星墩附近汇入南河。该河道一万年左右,为兰州东平原的黄河主道<sup>③</sup>。这条河道存在的主要依据是:

1. 河水道巷。为古河道地名,在清代东关城广武门外,曾因黄河支道而得名。

2. 鱼池子,在广武门东,明清时,曾利用这段黄河故道积水养鱼而得名。后因这条河水道被堵塞,今不见鱼池,而其地名却被保存了下来。

3. 一只船,据原兰州大学地理学教授鲜肖威先生的调查:“古代黄河经此,有渡船一只故名。”<sup>④</sup>

4. 今广场东口、平凉路、耿家庄一带地势低洼,逢大雨常有积水,深约0.5—1米。地表一米以下为沙石层。耿家庄,明清时又叫耿家滩,又叫泥窝子,说明当地有黄河支道经过。

该河道有一条汉道,开口于汽车东站,东流经一只船、兰州大学、兰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五里铺北汇入南河。

(三)南河道。又名教场河。该河道清代以前为黄河的主河道,开口于教场口,即今滨河东路的大教梁平沙落雁一带。清代的教场(兵营)在今省委家属院,名大教梁,该河道沿滨河东路东流,经今东教场,宁卧庄(原名泥窝子)段家滩北,南面滩南,于高滩东与中河(夹河)相汇,东北流,与北河汇。据雁滩、张苏滩老农言:“听老辈子说,清代以前南河岸宽水深,流量大于北河,为黄河主河道。民国时扩建东教场,向东向北延伸占去该河道南岸大片河滩地,使河道变窄。”

南河道有两条汉道:一是沙窝河,开口于宁卧庄稍东,向东北流经雁滩、张苏滩之间,于今雁滩乡政府西边汇入中河。民国以末,由于黄河水量减少,该河道泥沙淤积,流水不畅,故俗称沙窝河。另一条是段家滩南河道,开口于东湖批发市场,向东南流,经今东湖宾馆,五里铺北,又东流经段家滩南的鱼池口,沿东岗东路以北,又经拱星墩、东岗镇北,于世纪新村东北汇入黄河主河道。其据是:

1. 据清代光绪年间张国常撰的《新编皋兰县志》记载,清代晚期,该汉道水量很大,沿河设有段家湾渡口,拱星墩渡口,东岗渡口<sup>⑤</sup>。河岸有水车十余架,浇灌土地3000多亩<sup>⑥</sup>。据笔者实际调查,水车位置在今庆阳大厦以东五里铺村南一带,当地有一地名曾叫大水车。

2. 段家滩以南,拱星墩以西,在1990年以前,古河道尚存积水较深,有关部门曾利用旧河道养鱼,俗称鱼池口。1975年内部出版发行的《甘肃省地图集》和1998年出版的《兰州市志》第一卷《建置区划志》中兰州市街区图(1990年)对这段黄河故道的位置均有标示。

3. 今段家滩以东至东岗镇以北的一段低洼地,今叫雁儿湾,为河道沼泽,常有大雁,天鹅在此越冬。证其为古河道所经之地。

4. 今东岗镇北有一条小巷,名曰黄河沿,稍北为世纪新村,当地老人说,黄河沿为黄河南岸,世纪新村为黄河河道。

(四)中河道,又名夹河。开口于雁滩与宋家滩之间的黄河西岸,由西向东流,经宋家滩,北面滩南,均家滩,大刘家滩北,于高滩东汇入南河。

(五)北河。现为黄河流经兰州东平原的唯一河道,不赘述。

上述金城临河道,河水道,南河道,中河道,北河道,是自然形成的,出现于全新世(距今12000年)一直延续到宋代。另外,在雁滩还有一条小河,开口于滩尖子北,又俗称后河,东流经小雁滩,张苏滩北,于张苏滩东汇入南河。该小河不是古河道,可能是清代或民国因灌溉需要开挖的一条水渠。

## 二、兰州河谷平原黄河主支道的改变及其原因

今天看到的兰州河谷平原,只有一条黄

河河道。历史上长期自然形成的黄河支道, 汭道消失了, 那些大大小小的河心滩, 已与岸边连成一片, 不复存在了。这些黄河支道的变迁, 消失, 既有自然因素, 也有人为因素, 就自然因素而言: 兰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 青藏高原的隆起, 势必影响到兰州。由于全新世以来, 兰州市区的南山隆起, 使黄河主河道由南向北变迁。距今一万年左右, 黄河主河道流经西固柳沟大坪脚下和城关的皋兰山脚下<sup>⑦</sup>, 后逐渐变迁至兰州河谷平原的中部。但就兰州建县以来的两千余年中, 黄河河道的变迁, 主要还是人为因素, 现述如下:

(一) 金城临河道在宋代因筑城被人为堵塞。

兰州, 原名金城,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秋由李息所筑。初为塞, 后随移民的到来, 改塞为县。其故城在黄河南岸的今兰州市七里河区桦林坪北端。译见拙作《两汉魏晋金城故址考》<sup>⑧</sup>《兰州城址变迁考》<sup>⑨</sup>《梁泉白石山与金城故址》<sup>⑩</sup>。

隋唐兰州城筑于“皋兰山北少西滨河”即今城关区龙尾山脚下的胜利饭店一带, 因为这里是兰州东平原较高之处。该城为长方形, 东西 600 步, 南北 300 步, 西至上沟, 东至酒泉路微西约 10 米处, 北临黄河支道(绣河沿)北距黄河主河道二华里。唐代因之。

宋代元丰四年, 宋将李宪率军收复兰州后, 西夏数次来攻, 兵临城下。为加强兰州的防守, 在隋唐故城的基础上, 向北展筑新城。新城北至黄河主河道一华里, 其规模与隋唐城一致。详见《隋唐宋代明代兰州址变迁示意图》<sup>⑪</sup>。

金城临河道, 就是因为宋代向北展筑新城而被人为堵塞, 致使该河道从此消失。

(二) 河道因植被破坏, 水位下降, 于明代晚期淤塞。

河道堵塞于何时, 史无明确记载, 大致在明代的晚期, 这与兰州生态环境的恶化很有关系。

古代的兰州, 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 我们先从兰州一名的来源说起。隋开皇元年设置的兰州, 《元和郡县图志》《隋书·地理志》均言“取皋兰山以为名”那么“皋兰”是哪个民族语言, 又是何意呢? 史书和志书明确记载“兰州古为

西羌之地”具体地说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 兰州的主体居民为罕开羌<sup>⑫</sup>, 唐宋至明初为马兰羌<sup>⑬</sup>, 故我们认为“皋兰”为古羌语, 其意就是石羊出没在山路上。<sup>⑭</sup>说明古代的兰州南山, 森林苍翠, 在林间小道上经常看到石羊。石羊又叫青羊, 现代学名称岩羊, 与麝香、黄羊同为古代甘青一带的主要野生动物, 史书和志书均有记载。故从略不述。

其次, 兰州古代人口稀少, 《隋书·地理志》兰州: “金城郡统二县(金城, 狄道)户六千八百一十八。”《元和郡县图志》兰州: “唐开元户四千, 管县二: 五泉、广武。”《旧唐书·地理志》: 乾元元年, 兰州领县三, 户一千六百七十五, 口七千三百五。天宝领县二, 户二千八百八十九, 口一万四千二百二十六。《宋史·地理志》兰州: “元丰四年收复, 崇宁户三百九十五, 口九百八十一……辖县一: 兰泉。”这样少的人口, 况且是农牧狩猎兼营的少数民族——羌, 不足以破坏兰州的森林植被。当时的兰州, 山上森林密茂, “园花隐麝香”川里黄河交错纵横, 河心滩遍布, 一派江南水乡的自然景象。唐代后期刘元鼎路经兰州时, 看到的是“地皆秔稻, 桃李榆柳岑蔚。”反映了兰州古代生态环境的真况。明代开国后, 为巩固边防, 大量向甘肃、青海移民。由于人口的增加, 使黄河上游的森林植被不断遭到破坏, 致使黄河水量减少, 水位降低, 到了明代中期, 兰州河谷平原已不能自流灌溉, 遍种水稻, 于是兰州人段续发明了水车, 进行提灌。河道就是在黄河流量减少, 水位降低的情况下, 被逐渐淤积而堵塞的。

(三) 崔家大滩南河支道, 因保护兰新铁路于一九五五年人为堵塞。以前该河道水量较大, 向南冲刷至范家坪山脚下, 严重影响了兰州至西固的交通。1954 年修建兰新铁路, 崱山填谷才修通。1955 年, 为保护这段铁路及公路, 根据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富春来兰视察时的指示, 堵塞了这条黄河支道, 这是必要和正确的, 对生态环境也无影响。

(四) 段家滩南河道, 1958 年“大跃进”时, 被人为从开口处堵塞, 但河道仍在。1990 年后在兰州市区扩建中, 才被全部占用。

(五)南河道、中河道及小河,于1973年农业学大寨中,在“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口号下,由当时的雁滩公社、拱星墩公社,依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被人为堵塞。

我完全同意《兰州市志·自然地理志》中的一段记述:“六十年代以来,兰州盆地中黄河两岸的一级阶地及河漫滩多被开发利用,有的辟为农田,有的作为机关单位和居住用地,使黄河河道变窄,过水断面减少。因此若发生1964年、1967年、1981年超过5000立方米/秒的洪水流量,兰州盆地中的雁滩、马滩及被利用的一级阶地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到了本世纪初,基本建成了南北滨河及河堤,两岸景色如画,人们赞不绝口,成为兰州人的骄傲及旅游风情线。在充分肯定这一工程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不利的一面,新的设计和施工改变了原来的“规划”,过多地挤占了沿河的一些边滩和河滩,限制了黄河流空间。古代兰州东平原黄河岸宽除铁桥一小段外,大都在2公里以上<sup>⑤</sup>,即使50年前,黄河东平原的南河(含支道)中河、小河、北河加起来,河道也在1.5公里左右。现在只剩下一条河道,岸宽约在330—400米之间,而且还在不断与河争地,如金雁大桥东边南岸,体育公园侵占了大量河滩,实际黄河河道不足220米。

### 三、反思与应对措施

(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定胜天”的思维,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却忽视了自然规律,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实行了报复。”1973年,我们堵塞了南河、中河和小河道,好处是增加了耕地和后来城市建设用地,但却出现了城市污水和洪水无法排除,后又不得不花巨资,在原南河道,中河道开挖了人工渠道。更重要的是与河争地,使黄河变窄,给后代子孙留下了隐患。

古代的黄河上游及兰州境内,植被良好,水土流失较少,黄河的径流和水位相对稳定,明清以后,兰州境内及黄河上游的植被逐渐受到破坏,加

大了水土流失,使黄河兰州段的流量很不稳定,据不完全统计,兰州在西汉金城建县以来至明代中叶的1500多年中,共发生洪灾7次,平均约200余年发生一次,明末至清代200年中,发生洪灾14次,平均14年发生一次。其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六月初,兰州及黄河上游连日大雨,黄河暴涨,流量达8500立方米/秒,水位1517.41米。城东十八滩全部被淹,水至东稍门,泡塌城墙丈余。“登城遥望,几城泽国,灾民连万……避居五泉山。”<sup>⑥</sup>

民国以来至1990年的78年中,据新编《兰州市志·自然地理志》记载,兰州市区及所属三县共发生大小洪灾25次,平均每三年发生一次。其中1946年9月初,黄河泛涨,流量5900立方米/秒,中山桥墩被淹,沿河河心滩多被淹没,农田被冲坏。

1964年7月26日,黄河上游暴雨连日,黄河兰州段流量5660立方米/秒,水位1516.57米,雁滩、崔家大滩大部被淹。

1981年8月9日,因黄河上游连日暴雨,兰州黄河段流量5600立方米/秒,雁滩乡的北面滩、刘家滩、南面滩、均家滩、骆驼滩被淹,洪水到达今雁滩乡政府驻地附近。

兰州黄河的流量,主要来源于上游,而上游现有刘家峡、龙羊峡等大型水库,还在开工修建新的水库蓄洪,故容易使人们放松对兰州水患的警惕,从而认为黄河上游的洪水威胁不到兰州。但天有不测风云,谁能保证兰州境内及黄河上游不降暴雨?兰州市区近50年最大日降雨量96.8毫米,发生于1978年8月7日,黄河上游及支流大夏河,洮河最大日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若遇连日暴雨,上述水库蓄水到一定位置,为保水坝安全,必然放水,这将会给兰州造成水患。据《兰州晨报》记载:2012年8月28日,龙羊峡、刘家峡水库放水,兰州黄河段流量3490立方米/秒,比1981年8月9日5600立方米/秒的流量相差甚远,就冲毁了部分河堤,故不能掉以轻心。

(二)城市规划建设,要立足长远,为子孙后代着想。

2012年夏,北京连日暴雨,市区西南新建的

一些地方,遭受严重洪灾,而北京明代建的老城区却安然无恙,其原因是600年前修的下水工程,仍在发挥效益,地面积水较少,值得深思。唐代的长安城筑于当时地势较高的五龙原上,不临渭河,泮河和霸河。明代筑的北京城东距温榆河30公里,西距永定河20余公里,也不临河。究其原因,就是古人考虑到当时已出现的水土流失,为防止洪水威胁,保证京都的安全,故才这样做。现在我们的一些居民楼及机关学校,建在易受洪水威胁的河滩上,甚至原来的河道上,若遇连日暴雨,黄河水涨,后果可想而知。我省舟曲县2010年发生的洪水、泥石流毁坏县城的教训,我们应牢牢记取,究其原因:就自然因素而言,一是地处震带,近期又受汶川地震的影响,山体结构较为破碎;二是连日暴雨。从人为因素讲:一是近50多年来大量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二是与河争地,对流经县城的罗家峪沟、三眼峪沟及白龙江,未能留出足够的水道空间;三是新修的城北三眼峪、罗家峪沟防洪工程质量欠佳,没有起到防洪作用,故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其损失估计远远超过了近50多年砍伐森林收入的总和。说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战国时我国思想家荀子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兰州河谷平原,地域狭小,寸土寸金,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但我们欣喜的看到,近年来省市党委、政府已着手在秦王川开辟兰州新区的建设,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成为第五个国家级新区。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兰州发展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从而也为解决兰州老市区人与河争地的矛盾,指明了出路。

(三)要防患于未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兰州有两大隐患,一是人与河争地,势必造成黄河水溢;二是皋兰山滑坡,据地方志书记载和实际查看,该山历史上曾有数次大的滑坡,最后一次是在清代光绪年间,具体地点在今兰州东火车站以南,红泥沟以西,皋兰山顶的东北麓。至今滑坡的痕迹犹存,依稀可辨。由于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就不详述了。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头探讨如何避免因人与河争地带

来自自然界报复的具体措施:

1. 停止在雁滩东部、北部及黄河沿岸易受洪水威胁的低洼之地,新建机关,学校,医院及居民楼房,严禁再挤占河滩。

2. 在雁滩东部、北部及崔家大滩、马滩、迎门滩等地,因地制宜地选择大片低洼之地,作为黄河分洪蓄洪之用,平时种菜,洪水来临时蓄洪,还给黄河足够的空间,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现有的湿地,面积太小,起不到蓄洪的作用。

3. 对现有南北滨河路部分河堤应加固加高,如金雁大桥东至盐雁大桥一段的北滨河路河堤较低,难挡洪水,应加高。雁滩北河因乱占河道太窄,又无坚固河堤,存在严重隐患,应及时处置。对已建设在河滩河道上的茶楼、游览、文体等设施,视不同情况先后予以拆除,保证黄河河道的流畅与安全。

上述想法,仅为笔者一孔之见,如有不妥,望教正。

注:

①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⑨⑩见《兰州历史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③⑦⑮见李森等人《黄河兰州谷地新构造运动的初步研究》转载《兰州市志·自然地理志》附录。

④见《历史上兰州东平原的黄河河道变迁》1982年一期《兰州学刊》

⑤⑥见张国常《新编皋兰县志》

⑧见《兰州学刊》1993年第二期

⑩待出版

⑫见《舆地广记》兰州条下

⑬见《读史方輿记要》兰州马兰滩,州东大河南岸,明初扩廓围兰州,别将于光自巩昌驰救,至马兰滩为廓所袭,兵败被执处也。

⑭薛方昱《兰州名源释》载2009年3月20日《兰州日报》

⑮详见张维《兰州古今注》《兰州市志·自然地理志》

⑰见《兰州晨报》2012年8月29日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编审)



## 汉代屋兰县遗址——东古城

黄杰

出张掖城往东南 25 公里的甘州区碱滩镇古城村,至今尚存留一古城楼门,门楼高十丈余,门垣用青砖灰瓦砌筑而成,上建门楼,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凌空里,风铃悠悠,瑞气环绕,古城村因此得名。春到此处,柳吐新绿,如烟似雾,天蓝云白,几只祥鸽栖于瓦脊,且有一对老姬,荫凉处,依墙据凳而聊。在周围白墙红瓦的现代民居的映衬之下,古城楼显出一派古雅泰和之气。

据史料记载,现存碱滩东古城遗址,起源于汉代,属古张掖郡辖十县之一的屋兰县。《甘州府志·风俗》称:“屋阑今屋笆也,西汉以名县,东汉晋魏讹阑(兰)。”《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有屋兰县。《读史方輿纪要》上说:“其位置在张掖县东北,与汉张掖县相邻。屋兰得名自当地居民的称呼,屋、乌同音。兰、阑声母相同,收声略异。屋兰当为乌犁(匈奴)部旧居之地,部落王降汉之后,汉以其地置屋兰县。清时仁寿驿,也称仁寿堡。俗叫东古城,在今张掖城东 25 公里,碱滩乡古城村。”《甘州府志·古迹》载:城东五十里,今仁寿驿,俗称“古城”是也,汉张掖郡屋阑县,东汉及晋作“屋兰”者即此……屋兰东古城东西辟门,西门顶上保存重歇檐山顶阁楼一座,城周三里有奇,城堡内居民人口不足百家。

碱滩东古城原是一座完整的古城堡,周长约 2 公里,城垣黄土夯筑,筑有内外城,东西两面正中辟门。为无瓮城,俗称算盘城。城内东西向主干大街,建有寺庙、牌坊等。始建于西汉,明代曾重

筑,到清时才称仁寿驿。现城垣及其庙宇已淡然无存,仅存城门楼系古城堡西城门。

随着历史的变迁,东古城从一个古县城变为清代的交通驿站,与甘泉驿、沙井驿同为甘州三驿。又据史料载,我们现在的甘州城始建于隋唐时期。据此,古甘州城起始年代要比屋兰古城晚约八百多年的时间,当地百姓中流传着“先有东古城,后有甘州城”的说法是不无历史依据的。以古甘州城据中,东西有仁寿和沙井两驿古城堡遥遥相望,成为其所辖地域的东西两大门户。现存东古城楼门而东的檐下还悬挂一块明代书写的匾额,上书“张掖锁钥”。后来的历史便演绎出东、西古城之说了,这种说法也许就始于清代。

2002 年出版的由河西学院方步和教授主编的《张掖史略》称,目前现存的东古城遗址,属十六国时期(397 年)时称北凉王的段业所筑,名为西安城。这样,现存东古城就比建古甘州城晚了近 200 年。但张掖城更名甘州,确是在北周隋初。

时空漫长而久远,历史不会把所有的细节都清晰地留于后世,但屋兰确系在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霍去病驱逐匈奴后置县,为张掖郡辖十县之一。按照《史略》所执古时为了加强防御,置郡置县必先筑城的立论,今天的东古城遗址,还是要比现在的甘州城早 300 多年的历史。至于北凉的段业,或许是为了当时的军事防御之目的,在 500 年后,对屋兰古城的又一次重筑或维修罢了!

经过 2000 多年的历史源流,古城不仅为当地

环聚万象灵秀之气，也深深积淀了源远流长的人文民俗典籍。据说林则徐被贬谪伊犁时，曾在此驿站借宿三日。但最引人入胜的还数流传久远的当地民俗文化活动的“九曲黄河灯阵”了。据当地黄河灯阵传承人郭玉清介绍：灯阵是由一则“三霄娘娘”的神化传说演绎而来。为了劝化人心，弃恶扬善，百姓便以此将黄河阵布法演绎流传了下来，每逢丰盈年份，在元宵夜晚扎灯布彩。而今天，古城村的黄河灯阵传承人完全从古神话的传统援意中拓展出来，授以新的期愿，他们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俗语为意念，将历代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名流艺师视为心中膜拜的“神灵”，请进灯阵，以360盏灯冠名，又以农历一年为360天相吻合，意为每天都有一位“神灵”为地方赐福降祥，祛

病除灾，愿每个行业的人们都能求得一门绝技，出门求财到手，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一展才华，也寄喻了传承人对进得灯阵的每个人以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万事如意的真诚祝愿。

今天所看到的古城楼门，已是青砖琉瓦，雕梁画栋，铃音清脆，仿佛一个换了新甲的年轻英俊的古代武士，巍然屹立于村子中央。2003年张掖发生地震时，原土筑城楼多处开裂，面临倒塌，2006年5月由省文物局、区文化局及碱滩镇和古城村委会共同出资13万元，对其进行了加固维修，用青砖对城楼进行了包砌，呈目前的样子。这座古城楼遗迹现已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系张掖市甘州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 天水市志办总结2013年上半年工作 安排下半年工作

半年来，天水市地方志工作坚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效能风暴行动为抓手，业务编纂工作向规范化推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注重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开展联村联户、效能风暴行动，锤炼工作作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是认真开展效能风暴行动，切实加强地方志队伍作风建设。二是学习党的群众路线的论述，开展为地方志发展献计献策讨论活动。三是把创先争优与选人用人结合起来，抓好科级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后续工作。

二、重实绩，各项业务工作效果明显。一是筹备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地志办主任座谈会，明确目标，分解任务，表彰先进，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全面推进地方志工作。二是加大调研力度，组织参加业务培训，推动工作交流进展；协助省史志办在天水举办全省年鉴业务培训班，组织修志

人员参加口述史培训，配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一行天水调研活动。三是部门专业志的编纂已见成效，终审《天水市农业志》等3部、安排终审审稿《天水市商务志》等5部；《天水大辞典》编纂完成初稿，年内可付梓印刷。四是二轮修志，市县区志编纂进展良好。五是市县年鉴连续出版。六是天水方志网成为地方志信息交流平台。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一是以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条例》《规定》；将《条例》各项规定落实到基层具体工作中，对不符合《条例》要求的，逐一改正。二是持之以恒，扎实推进市、县区志编纂工作。三是加快专业部门志编纂，认真做好志书的评审、修改、审稿和出版工作。四是年鉴工作要不断创新，继续提高质量，重视实效。五是做好地情信息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

# 陈云与知识分子“异己”论的矫正

王 杰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知识分子理论是对政治及经济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问题。陈云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思考这一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形成的知识分子理论,对于系统反思既往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长时间的曲折和失误的经验教训,构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 一、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失误的显露

分清确定敌、我、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正确划分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又是确定敌、我、友要中之要的前提。划分包括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枢纽点。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马克思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的社会现象指出,这一分离在本质上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包括知识分子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的产品,尤其是“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资本和生产工人特殊群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马恩从俯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进程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现象的高度,统揽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十分明白地廓清了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阶级的阶级阵线,界定了被资产阶级招雇的包括脑力劳动者的雇佣劳动者,都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

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和生产工人的思想,并在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

阶级一部分的政策问题。1933年瑞金民主中央政府公布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瑞金决定》)明确规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出身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从事非剥削别人工作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本人当职员的是职员(1950年8月4日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充分肯定《瑞金决定》,并在“政务院补充决定”中明确规定:受雇于公私机关等单位的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的实践证明,虽然《瑞金决定》从政策上正确解决了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问题,但在此之前和当时,全党对这一重大问题在思想和理论上,尚未普遍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观念,以致后来发生了悖逆《瑞金决定》的反复。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分析排斥知识分子现象发生的诸多原因时,特别强调“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显然,《决定》已经明确表达了知识分子异己于“我们”范畴的思想。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决定》所表述的知识分子异己于“我们”的观点,否定了《瑞金决定》知识分子是职员——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规定,而且在于至少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全党从理论上对知识分子异己于“我们”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消除过异己论影响的记录。

《陈云年谱》载:“陈云参与了这一《决定》的起草工作。现因于无法查对原始资料,无法确定陈云参与到什么程度,但陈云大量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表明,知识分子异己于‘我们’不符合陈云一贯的知识分子思想。虽然后来——1942年,陈云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明确提

出包括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各种类型干部本身的品德修养的阐述,实际否定知识分子异己于“我们”的思想,并非再后来——1948年8月,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从分析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理论层次,更进一步明确肯定:旧社会企业中体力劳动的工人和脑力劳动的职员,“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接近工人的”,“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1p352)陈云的这一正确认识,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观具体化,显然具有矫正异己论失误的重要理论意义,但在实践中又未能转化为党的知识分子决策的指导思想。异己论长期存在并占据决策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这就为异己论后来进一步发展,酿成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在思想理论上埋下了隐患。

## 二、关于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

知识分子属于还是异己于我们,是关系知识分子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的重大命题。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正确与否。

### (一)划分社会成员阶级属性唯一的经济标准

划分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本来十分明确。列宁的阶级定义明确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十分清楚,阶级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的概念。划分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事实上就是确定人们归属于哪个社会集团。采用经济标准——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是依靠劳动还是依靠剥削,划分社会成员属于劳动阶级或剥削阶级,则一目了然,清晰可见。所以,这是划分社会成员的属于劳动阶级抑或剥削阶级的阶级属性无可选择的唯一标准。而且,以经济标准划分包括知识分子的

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划分阶级属性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一般操作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知识分子变成了雇佣劳动者的经济标准为据,确定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属性,就是典型范例。《瑞金决定》1948年8月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和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及1950年8月4日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都具体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经济标准的基本观点和一般操作原则,从理论和政策上就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明确规定。而且,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本身具备确界定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功能,是划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一切社会成员阶级属性普遍的和唯一的标准。亦即划分社会成员阶级属性,只能是一元的经济标准。

### (二)关于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三元标准的剖析

1956年以来,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迫切需要组建宏大知识分子队伍,另一方面随着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显露和发展,知识分子理论上埋下的异己论隐患也日渐深化并趋于激化,几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周恩来力图化险为夷,在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论断以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为论据,得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抑制知识分子问题上异己论“即发”,转化为决策的良苦用心凿凿可见。但有学者似未发现周恩来如此良苦心机的深刻策略内涵,认为周恩来主张采用多元标准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当时我国还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对旧知识分子界定工人阶级属性时只能将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两

个方面统一起来,还没有也不可能同他们的思想状况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本应及时地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界定知识分子阶层的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过了异常曲折的道路。”“1961、1962年间周恩来最早将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论者所指期间,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已经泛滥成灾,知识分子在承受了反右派的大规模肃杀后,继续在各个方面承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巨大政治压力,但在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由来已久的左倾错误又势难一步到位之际,只能策略地用为谁服务和思想状况,淡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的影响,抵制“左”的错误。正是基于此,周恩来提出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界定知识分子阶层的工人阶级属性。笔者认为,周恩来提出从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界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与将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理论化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三元标准,形徒相似而其实不同。史实可鉴,在“左”的错误占据主导地位期间,为谁服务和思想状并没有真实地充当过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但三元标准论毕竟是反思历史之际的一家之说,而且廓清为谁服务和思想状是否具备划分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功能,用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否科学?有助于从理论和政策上明确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

### (三)关于为谁服务标准

设若以为谁服务作为标准,就能够划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那就需要反思,为什么长期不懈地用服务论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而收效甚微?这里,试以为谁服务标准内在的逻辑关系,做一实证推理:

∵ 知识分子已经为新社会服务

∴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为社会主义服务与否,是界定知识分子是否属于工人阶级的标准之一

又 ∵ 旧社会的雇佣劳动者为招雇者提供了服务

∴ 雇佣劳动者是劳动阶级的异己

∴ 旧社会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据此标准推理得出的结论,显然违背现实生活事实。旧社会作为生产工人组成部分的雇佣劳动者知识分子,出卖劳动力的实现形式就是受雇于剥削阶级(如刘少奇指出的“聘请就是雇佣”),以脑力劳动形式参与剩余价值创造过程,用脑力劳动力创造被剥削阶级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这在客观上为剥削阶级提供了服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雇佣劳动者理论,明白无误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剩余价值创造过程这一事实。陈云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多数技术人员为了吃饭,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受资本家的支配和剥削”。(2p27)十分清楚,旧社会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知识分子,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实现形式,就是雇佣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将劳动力使用权让渡于招雇者,直接参与剩余价值创造过程,但这并没有改变雇佣劳动的本质。可见,服务论本身是一个形式否定内容、现象否定本质的内涵不严密的概念。用服务论纠正知识分子异己论等左倾错误,实际上是以错误批判错误,既难以达到纠正错误的目的,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其设计初衷背反的结果。这就是过去几十年来用服务论否定异己论,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因为比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知识分子观,“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理论不彻底的概念。本文前面引用《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论述,明确界定了包括知识分子的总体工人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属性。列宁也明确指出:“如果你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相提并论,即像雇佣工人和农民一样是占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社会集团是不恰当的,因为资本主义逐渐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寄人篱下的雇佣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观点十分明确:作为“总体工人”中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像雇佣工人和农民

一样是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寄人篱下的雇佣者”。“已经是”明显包含有知识分子过去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从为社会主义服务起才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含义。即使“已经是”专门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不符合事实。因为阶级社会中,社会各阶级都有属于自己阶级的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阶级构成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是革命的对象。构成旧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绝大多数是科学技术、工程、经济管理、教师、医生、工匠、艺人、账房先生、师爷等具体形态的非体力劳动者。毫无疑问,这个群体本来就是雇佣劳动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从旧社会过渡到了新社会,说他们过去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个时候才“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显然违背事实。

#### (四)关于世界观标准

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三元标准实践中,经济标准实际长期被弃置不用,为谁服务标准的实际作用也极其有限,而世界观标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世界观标准形成完整的体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1939年毛泽东起草的《决定》虽然已经显现了知识分子异己于“我们”的思想,但还没有提出理论支持。据本人目前见到的资料,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年3月,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进一步发展异己论思想,说:“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5p452)并以“皮”“毛”论佐证异己论说,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五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p452-453)这些论述表明,以“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作为划分知识分子

阶级属性的标准,事实上形成了知识分子异己于“我们”的理论支持。

世界观作为对宇宙的基本看法,主要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家。虽然世界观与人们的阶级属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世界观与阶级属性之间绝非固定的必然使然关系。不仅二者的联系极不确定,而且即便假设二者能够发展成为必然固定的关系——劳动阶级必然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剥削阶级必然坚持唯心论世界观,但这种必然联系的实现,又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极其漫长的转换过程,至少在已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还没有成为现实。这是第一。第二,世界观作为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本身又具有极为广泛的阶级兼容性。现实生活中,相当大批量信仰宗教的社会成员,虽然可以说他们世界观的主体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又毫无疑问是劳动者。用世界观标准划分阶级属性,岂不将大批量信仰宗教的劳动群众划入剥削阶级范畴。第三,作为划分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标准,毫无疑问必须是普遍适用于量度所有社会成员同一的尺度。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划分所有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正式文件和具体操作实践中,采用的都是经济标准,但到后来在“左”的错误深化大势之下,唯独对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实行世界观标准,客观上造成了衡量同一事物两个标准并行,从而在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实际没有同一标准的混乱。第四,列宁的阶级定义在内涵上也规定了划分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必须采用主要生活来源于劳动还是剥削的经济标准。世界观标准实际上将阶级概念的内涵,混淆、代换为意识形态,用世界观划分人们的阶级属性,形如用长度度量重量,实际上否定了阶级概念中经济关系的科学内涵,从而否定了阶级是经济社会关系范畴的本质。

邓小平论述世界观与为谁服务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但邓小平的这段论述只是阐释了世界观和主动服务的关系,并且强调指出为谁服务

只是世界观的“重要表现”(绝非唯一表现),并没有用为谁服务——世界观的“重要表现”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事实是邓小平在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上,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历来坚持经济标准的事实如山,无可置辩。他在讲话中重申列宁的论述——“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是一般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2p88-89)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既殚精竭虑扭转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更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层次严格区分劳动者和剥削者,廓清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从根本上推动了陈云、刘少奇、周恩来等诸多革命家矫正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可见,虽然从经济地位、为谁服务、思想状况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界定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意欲淡化世界观标准,抵制和消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但因为为谁服务和世界观本身不具备标志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功能,用以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在方法上形如用长度标准度量重量,不符合逻辑,所以得出的理论结论必然既违背事实,又经不起实践经验,因而未能达到设计预期。回眸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期间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历史,事实上是用世界观标准否定了经济标准,为谁服务和思想状况标准对于抵制和消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用极为有限。

#### (五)知识分子异己论的纠正

新中国史上,知识分子异己论从矫正发端到彻底否定,主要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期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三个大的发

展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1956年周恩来提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从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矫正知识分子异己论的发端(虽然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没有采用周恩来的提法)。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错误恶性发作,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危害日深的严重事实,矫正知识分子异己论谨慎而明显的趋向于深化。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国营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今后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向科技会议作报告,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准备向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其中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讲到知识分子,却是光头,既没有戴资产阶级之帽,也没有加劳动人民之冕。”70年代后期以来,基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向极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沉痛教训,适应大规模“四化”建设的需要,矫正知识分子异己论,进入了全方位彻底清理阶段,在否定“两个基本估计”,停止“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同时,从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深入批判以异己论为核心左倾错误的基础上,1983年3月13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万人大会的报告中,系统批判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错误,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并提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深刻观念的战略任务。至此,异己论被正式否定,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在经过长时间曲折和失误以后,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大变革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必须进行世界观改造,然而在异己论占据主导地位条件下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视作根本转变阶级立场的改造,显然是错误的。但作为整体的工农群众和整体的知识分子相比,前者有专门学习和接受系统教育机会少的客观限制,造就了世界观稳定程度有限的重要特征。而知识分子由于各种形式的长期学习和接受系统教育,经过千锤百炼形成的明显具有稳定性的世界观,既可能外化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旧制度冥顽不化的现象形态,更可能转化为先进知识分子“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信念,而且在社会大变革的新旧交替时期,也会转化为对旧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性的摒弃比工农群众更加维艰的现象。所以,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较之工农群众的世界观改造,难度相应更大,需要的时间也相应较长。但陈云早就十分明确的指出,改变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等旧观念和旧作风,“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有需要工人和职员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采取讨论会、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1p 58)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组成中文化层次最高的部分,居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中坚地位,只有不断自觉地用新知识充实自己,不断实现世界观科学化,同一社会制度下,才能更好地肩负起历史的重托。应当说,这是适应时代进步的全新意义上的自我改造,而且对于每个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都是必需的。

### 三、知识分子理论曲折探源

纵览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上,异己论之所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之所以经历大的曲折,毛泽东以异己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理论错误,确实具有导向作用。而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异己论思想由来已久。早在他 1925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将知识分子列入“小资产阶级”,而没有列入“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

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五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1p7-8)题在于,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把小资产阶级包含于“一般的资产阶级”,说:“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虽然当时没有明确回答是以何标准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直到 1957 年 3 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才给出了明确答案,“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世界观标准。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理论错误,确是新中国史上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全局性错误的指导因素。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伟人,毕竟都只是历史的标签。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发生和演化成为普遍性的大的社会现象,必然是社会经济内在矛盾外化的使然,背后肯定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

社会发展史表明,社会化生产方式取代小生产方式是不可逆的必然趋势,虽然实现取代的具体形式千差万别,但社会经济基础层而新旧生产方式彼消此长本质矛盾人格化,派生的社会群体对立,无可改变地贯穿于取代过程的相当长时期,并必然现象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无须证明,知识天然具有社会化的属性。具有社会化属性的知识,客观上是直接加速旧的小生产方式消亡和新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确立的物质力量。知识分子作为活的生产力和知识活的载体,创造性劳动科学化总结局部经验形成的系统化知识,更以乘数效应加速旧生产方式消亡和社会化生产方式的确立。马克思极其深刻的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存在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p427)所以,知识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化生

产方式确立“最强大的杠杆”活的代表,受到来自旧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排斥,则是社会存在必然的使然。西方发达国家在新旧生产方式取代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漫长过程中,也有过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大量的,甚至惨烈的血的历史记录,只是先于欠发达板块的国家完成取代过程,先期经历了长期痛苦的炼狱,直至知识分子融入社会化生产方式后,规模化的排斥才告一段落。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之时,恰当小生产方式向社会化生产方式转轨提速的历史发展时期,而小生产方式又是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所以,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化成为普遍性的大的社会现象,乃是社会经济内在矛盾外化的使然。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尊师传统,甚至将“师”提到了仅次于“天地君亲”崇高地位的事实,是否是对笔者关于中国社会具备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深厚经济基础观点的否定?

传统的家庭经济单元作为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细胞,蕴含着孕育社会全貌的基因。家庭经济单元囿于“三十亩地、两头牛”的小生产经营范围和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依靠经验进行经营决策。所以,对具有社会化属性的知识要求并不十分迫切,而且具有的排他性相当程度上可转化为抵制和排斥具有社会化属性的知识的行为倾向。社会经济细胞这种内在特性社会观念化的凝聚,就自然而然地构成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绝非仅仅是理论演绎的结论,而且无须证明是现实生活的抽象。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尊师传统,事实上不仅不是对社会小生产经济社会基础的否定,而且是强化这种济社会基础极为重要的环节。

传统家庭最显著的政治特征,是家庭经济生产、血缘和观念三位一体支持的家长制。由于血缘系统中,父子关系不可逆转,特别是经济关系中生产经验和技术的父传子传承方式,逐渐形成并确立了父为子纲——天下老子第一的父本位家长制度。家国天下,社会乃是扩大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家庭,传统家庭的父本位家长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化成为了社会的官本位制度。现象形

态就是天下百姓皆“子民”,大小官员尽“父母”,皇帝毫无疑问是“君父”——社会的总家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所当然的成为家国天下的最高政治准则。官本位制度对于官,既有例如名垂青史、封妻荫子、削职抵罪甚至抵死罪等等太多太多的特权;更有极高的经济内涵——“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致仕做官乃是百姓仕子的矢志追求。“师”正是因为处于通向官场桥梁的位置而受到特殊礼遇。所以,中国社会长期的尊师传统,本质上是官本位政治体系的延伸,并不是对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经济社会基础的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社会化进程的加快,加剧了新旧生产方式取代内在矛盾的对立,从而使旧生产方式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趋向激化。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2p76)中共及其领袖的包括知识分子理论的思想观念,恰在新旧生产方式取代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完善,必然地会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具体到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领域,现象为长期的曲折和上升发展,乃至不可逆的被最终否定,都是历史必然的使然。统揽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中共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的历史,经历了从正确到发生失误,从错误深化成为左倾指导思想,酿成全局性灾难,最终得以彻底纠正,其间,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也在抵制、矫正和彻底消除左倾错误过程中,彰显真理必然胜利的权威,实现了否定之否定,在小生产基础深厚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开辟了披荆斩棘的发展道路,最终确立了主导地位!

#### 资料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1),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09页

《陈云年谱》上,只要我想出版的,第263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p256-257)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  
10页。

《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162页

韩亚光:《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  
识的曲折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03期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44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版第409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93页

龚育之:《陆定一的最大失误——我所知道的  
陆定一》。《学习时报》,2006年10月2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322页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在办公室原副主任、中  
国延安干部学院原教授研究员)

##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全力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2013年8月13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召开  
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推动机关的教育实践活  
动进一步深入展开。会上,办党组书记、主任李虎对  
第一环节工作进行了小结,并结合单位实际,对如  
何贯彻落实王三运书记在全省第一批教育实践活  
动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精神,努力做好第二环节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李虎认为,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环节开展以来,  
办党组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精心组织,周  
密安排,认真开展理论学习,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参与,普遍接受了一次查找  
“四风”、反对“四风”、改进工作作风的思想教育,  
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初步成效。一是办党组高度重  
视,教育实践活动有序推进;二是学习讨论较为深  
入,普遍接受了一次思想教育;三是征求意见较为  
广泛,初步查找梳理了突出问题。

李虎强调,在看到第一环节取得初步成效的  
同时,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以改进。一  
是少数同志对我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二是学习还不够深入扎实;三是边查边  
改、即学即改做得不够。

李虎要求,要全面贯彻落实王三运书记对做  
好第二环节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为民务实  
清廉要求,扎实做好查摆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环节的工作。一是要继续进一步深化学习,不断  
提高思想认识。要把学习教育贯穿于整个活动的  
始终,反复学、深入学、原原本本学,不断夯实践  
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并在今后修志  
工作的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观点、群  
众路线;二是要继续征求意见,找准突出问题。教  
育实践活动自始至终,要聚焦“四风”问题,不断听  
取意见,不断进行边整边改,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推进机关和全省史志工作迈上新台阶;三是要深  
刻对照检查,开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党  
支部组织生活会。要对照“五面镜子”检查自己,  
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我教育;四  
是要统筹各项业务工作,切实做到教育实践活动和  
业务工作两不误、两促进。要合理安排工作布局,  
科学分配时间精力,既不能因为业务工作忙影响  
到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也不能因为教育实践活  
动耽误业务工作。要坚持用教育实践活动激发出  
的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促进业务工作,用业务工  
作的成效来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

## 从容赴北去 誓死灭倭寇

——抗日英雄令光琪二三事

包永庄

伟大的抗日战争，以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划上了句号。然而，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炎黄子孙负出了沉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日寇杀害中国军民达3千万人，残酷屠杀达578万人。国共两党为抵御外侮，仅10万人以上的会战就有22次，大型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阵亡少将以上的将领216人，牺牲的军人133万9千人，失踪负伤321万1千人。陇原儿女在抗战中牺牲者千余人之多，武山县有姓名可查的亦近百人。令光琪就是这众多英勇献身的英雄之一。

令光琪(1903—1933)，原名令兆琪，兄弟四人，排行第二。武山县城关镇腰庄村人。光琪自幼聪颖，敏而好学，少年有志，品学兼优，是桑梓出类拔萃的人才。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即兰州师范)，新的环境，给他的求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师范阶段，青年光琪更加勤奋超群，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意识十分强烈。他闻鸡起舞，夜阑方眠，由于他的勤奋，学业在校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显示了在文学、书法等方面的才赋。深得他的老师，陇上著名书法家、诗人刘尔炘先生的器重。为此，刘尔炘先生曾给其作诗、作画以相赠。

岁月匆匆，光阴易逝，几年的师范生活不觉已结束。1926年光琪从甘肃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不久，从兰州回到家乡。时逢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族多灾多难之日，目睹严酷的现实，身为书生，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他，放弃了教书谋生的想法，依然告别父母，投笔从戎，于1927年在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师长张维玺因爱其才，随即任命为排长。此后不久，光琪赴西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于宋哲元将军29

军38师师长张自忠部队。当时，国内形势异常严峻，日寇已大举进攻，侵占我东北三省，开始对我华北进犯。为防不测，西北军开赴中原，驻防开封。开封素有“十朝古都”“七朝都会”之称，是《清明上河图》的原创地，有“东京梦华”之美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戎马倥偬之际，一日病后，他和战友游览禹王台。站立台上，举目眺望古老美丽的中原，面对日寇的暴行，青年光琪不觉怒火中烧，充满了强烈的杀敌立功愿望。于是，在即将寄给妻子书信的照片背面，挥笔写了一首诗。现谨录于后：

虚度二十九，戍守已六秋。

从容赴北去，誓死灭倭寇。

令光琪于河南开封禹王台病中小吟题

该诗气势恢宏，铿锵有力，散发着豪迈的正气和浓烈的爱国主义之情。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光琪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时刻，从容赴国难，英勇杀倭寇的决心和勇气。是当前发现的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数以千计的陇原优秀儿女中为数不多的抗战诗作。至今读来，令人心旌激荡、思潮难平，仿佛回到了八十多年前的抗日前线。

在开封驻防期间，因光琪带兵得法、训练有素，旋即被张自忠师长晋升为上尉连长。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长城抗战从此开始。当年3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喜峰口。喜峰口是河北省迁西县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国难当头，29军急调喜峰口。军长宋哲元特地委任38师师长张自忠为前线指挥，令光琪连队随军前往。29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很差。根

据西北军传统，部队给每位士兵打了把大刀。当天，29军抵达喜峰口后，即与敌人展开激战。日军源源不断增兵，38师虽然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却未能攻克孟子岭高地。经过三天血战，几个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艰苦的拉锯战。由于受到敌炮火的猛烈射击，38师伤亡很大。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不是办法，于是组织大刀队对日军进行夜袭。在张自忠的动员下，很快一支2000人自愿组织的敢死队成立了。3月11日夜，敢死队兵分两路，身背寒光闪闪的大刀，在当地樵民、猎手的带领下，踏着冰雪分头出发了。光琪带着一支300人的敢死队，他站在队伍前，慷慨激昂地说：“日本鬼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有三头六臂的怪物，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与他们拼命，就一定能把鬼子消灭净。既就是战死，为国捐躯，虽死犹生”。午夜时分，正值鬼子酣睡之际，勇士们悄悄摸进敌营。随着一声令下，顿时大刀挥舞，杀声震天，日军尚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人头落地，身首异处了。鬼子被打的落花流水，当场砍死数百人，防线被迫后撤30余里，中国军队乘机夺回喜峰口。喜峰口战役后，大刀队吓破了日军的胆，从那以后，日军特别打制了铁项圈套在脖颈之上。日方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自此，29

军38师声震天下，音乐家迅速谱写出《大刀进行曲》，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且至今仍回响、激荡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头。

喜峰口大血战，是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不幸的是：令光琪在这次战斗中，因胸部中弹，血洒长城，年仅30岁的他永远长眠于喜峰口。为此，国民政府曾给予嘉奖，解放前武山县城东关魁星楼忠烈祠，他的灵碑名列第一。民国《武山县志稿》，新编《武山县志》，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陇原儿女抗日阵亡将士”碑等，均有记载。

最后需要简叙的是：光琪牺牲那年，其妻李海棠25岁，身怀六甲，三月后，生遗腹子令维荣。海棠缅怀丈夫，守志50年，含辛茹苦养育儿子成人，乡邻多赞之。20世纪80年代初辞世，享年75岁。儿维荣聪颖，少年笃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武山中学，后供职于武山县交通局，90年代退休。其有子女多人，均成才。

本文在撰写中得到烈士后代令军民、令爱军等人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作者单位：武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酒泉市政府副秘书长、史志办主任孙占鳌 督查县(市、区)史志工作目标责任书完成情况

2013年8月5日—8月9日，酒泉市政府副秘书长、史志办主任孙占鳌对敦煌、阿克塞、肃北、瓜州、玉门等县(市)就2013年酒泉市政府与各县(市、区)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完成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检查中，孙占鳌指出：各县(市)要抓紧落实和完成今年酒泉市、县两级政府签订的史志工作

目标任务，尤其是在机构人员编制、落实办公场地、县志编纂和年鉴编辑、地情信息网建设等工作抓紧落实，进一步抓住当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全面完成今年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督查组还就加快《肃北县志》编纂工作进度和修订《敦煌市志》等相关工作进行了业务指导。

## 烈火铸信念 风雨见真情

——习仲勋与金天华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

金侠云 姚婷文

查阅陕甘边和渭北革命根据地档案，“锦天花”、“天花”、“金天华”、“天华”等名字时有所见。从1933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华北宣言》中，知道金天华时任“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指挥部政治委员”，与汪锋、王世泰、金理科等人齐名。已出版的陕甘边和渭北革命根据地资料，对金天华虽有注释，但都语焉不详，含糊其辞。

《习仲勋传》上卷(第104页)记载，“1932年9月中旬，习仲勋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金天华兼任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治指导员”。

1989年10月，我们夫妇去看望黄罗斌伯伯，当得知我们是金天华的孩子时，黄罗斌不无感慨地说：“你父亲与习仲勋关系最好。他那时小学教师打扮。他是渭北游击队第一任政委，我是第三任政委。我们那时打仗，很多人都牺牲了，能活下来很不容易。你父亲与我分离50多年了，没见上他一面我很是遗憾。”

听了黄罗斌伯伯的话，我们有点意外，父亲生前多次要求我们要向习伯伯学习。我们只知道习仲勋是父亲心目中的良师，却不知道习仲勋还是父亲的益友。

自此，我们一有机会，就去访问父亲的战友，搜集整理习仲勋与金天华的历史资料。今年是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我们的父亲金天华诞辰100周年，为纪念他们，激励后人，我们经过多年努力，初步掌握了习仲勋与金天华参与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之间长达50余年的革命情谊。

### 与习仲勋认识前，金天华的主要经历

金天华(1913—1983)，化名锦天花、天花，天华，甘肃省榆中县金崖镇人。幼年入私塾，后因家贫，中途辍学。1929年，金天华由于生活贫穷，被迫离开养育自己多年的故乡，外出谋生。他先在冯玉祥部暂编十五师当兵。1930年秋，转投杨虎城第十七路军。1931年初，十七路军调防陕西，金天华被分配到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训队当学员。当时，干训队公开招募有文化的社会青年，中共陕西省委利用这个机会，派遣汪锋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干训队，秘密开展兵运工作。金天华和汪锋(原名王均治)同在一个班。3月，汪锋、王占鳌介绍金天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金天华接受组织安排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从事革命工作，被谢子长分到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一支队第一大队担任分队长职务。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金天华跟随谢子长、刘志丹转战陕甘边。从2月到5月中旬，他先后参加了攻打陕西省旬邑职田镇、阳坡头、耀县照金、旬邑县城、马栏镇等多次战斗，连战连捷。

6月下旬，金天华带领第一中队与刘志丹带领的第三支队合歼国民党军队一部。

7月，在国民党陆军新编11旅特务营搞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杨林、高鹏飞等在西华池领导两个连起义。金天华跟随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和骑兵队，前往接应。两支部队会师后，起义部队大部分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金天华任三中队中队长。<sup>①</sup>几天后，

在陕西省洛川一带，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与国民党一个特务团遭遇，由于敌我实力相差悬殊，游击队被敌人打散。金天华为了掩护同志，左臂中弹受伤，右手中指被打断，但他坚持战斗，不下战场。

战斗结束后，金天华被送到三原县的一个游击队员的姐姐家养伤。伤势刚有好转，他就离开三原去西安寻找党组织。

### 共同创建渭北根据地

7月下旬，金天华在西安找到汪锋（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汪锋决定派他到三原县武字区组建游击队。他拿着汪锋的介绍信找孙铭章<sup>②</sup>接头后，孙铭章领他去见黄子文<sup>③</sup>。黄子文看了汪锋的信后，根据省委指示与金天华一起筹备组建渭北游击队。

8月1日，黄子文与金天华将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sup>④</sup>。渭北游击队由中共渭北特委领导，马志舟<sup>⑤</sup>任游击队队长，金天华任政委<sup>⑥</sup>。游击队员多是当地穷苦百姓，有60余人，30多支枪。

渭北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根据地。8月至10月，渭北游击队和泾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一部两次攻打三原马额镇王茂臣民团，缴获步枪若干，歼敌一个班，击毙敌班长一名，初步打开了局面。<sup>⑦</sup>

9月中旬，习仲勋率领刘志丹留在照金的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到达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胜利会合，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同时，将武字区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马志舟兼支队长，金天华兼政治指导员。<sup>⑧</sup>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经常驻扎在甘涝池村，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渭北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此，金天华与习仲勋并肩战斗，为发展渭北根据地和红军共同努力奋斗。

10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在渭北特委领导下，成立共青团渭北特委。团特委领导武字区、心字区两个团区委，有二十余名共青团员。习仲勋和金天华等人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sup>⑨</sup>。

10月上旬，根据中共渭北特委指示，习仲勋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黄子文和金天华带领渭北游击队，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华里坊、让牛村、照金、高山槐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配合当地群众袭击扰乱民团，保护群众打土豪，分粮食，驱逐催粮要款的国民党政府差人，使之不敢在渭北催粮要款。游击队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闻风逃窜，广大群众热诚欢迎。

渭北游击队在高山槐打土豪、分粮食三天，300多群众参加，分粮300多石。期间，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密探混入分粮群众中，企图破坏分粮斗争，因慑于高涨的群众斗争情绪，终未敢轻举妄动。

22日，国民党军1个连配合胡景铨民团又进犯武字区南塬，被渭北游击队和赤卫队击退。<sup>⑩</sup>

11月6日，渭北根据地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万人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习仲勋和金天华率渭北游击队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以习仲勋带领的全副武装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金天华带领的第一支队担任后卫，数千名群众参加游行队伍，步行到武字区以北十多里地外的马额镇示威游行。11月8日，纪念大会进入第三天，共青团渭北特委组织化装演出新剧，举行游艺大会，散发传单七千多份。<sup>⑪</sup>

渭北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直接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11月9日，国民党调集了渭北6县民团和三原、小丘驻军，对三原县心、武两区连续实行围剿，杀害党员干部，烧毁房屋。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敌军突袭下，渭北游击队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金天华随游击队一起紧急转移。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工作被迫中止。

为加强对渭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取消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金天华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军委组织委员。<sup>⑫</sup>与此同时，共青团渭北特委改建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先任组织委员，后任县委书记，金天华任团

县委书记。<sup>⑬</sup>

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学运和兵运工作，在省立第三中学和驻三原的王泰吉部发展了一批党员。习仲勋与金天华并肩战斗的这段时间，正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时期，心、武地区联成一片，形成一个赤色区域。习仲勋与金天华领导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频繁作战。

艰苦的战斗岁月，使习仲勋与金天华的友谊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俩同庚，都刚满19岁，正值青春年华，对革命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在实际斗争中又充满了炽烈的战斗热情和牺牲精神。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金天华为习仲勋丰富的斗争经验所吸引，被习仲勋卓越的能力和人品所折服。

#### 与红二十六军并肩战斗

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恢复了渭北游击队。1932年12月下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派金理科、金天华、黄子文等人对渭北游击队进行整顿改编，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游击队下编为两个中队，各有20余人枪。<sup>⑭</sup>

渭北游击队改编后，黄子文、黄罗斌、金天华率渭北游击队到照金与陕甘游击队汇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他们参加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成立大会。<sup>⑮</sup>

26日，黄子文、黄罗斌、金天华率渭北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六军挥师东进，直捣宜君焦坪，首战告捷。之后，渭北游击队跟随红二十六军南下照金一带，发动数万贫苦农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布匹。<sup>⑯</sup>随后，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一起到高山槐和照金地区分粮。<sup>⑰</sup>

红二十六军成立不久，军政委杜衡便命令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团攻打夏老么民团，“红二十六军没有炮，缺乏攻坚能力，虽经多次强攻，终未奏效”，骑兵连损失很大。1933年1月25日，金天华即向中共陕西省委呈报了《关于红二十六军庙湾战斗情况的报告》。<sup>⑱</sup>

1月19日，黄子文与金天华将渭北游击队带回三原县武字区，与习仲勋带领的游击队胜利汇

合。21日，在习仲勋指挥下，游击队在富平尚村组织300多人分了土豪的粮食，击退尚村民团。<sup>⑲</sup>

庙湾战斗后，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二团返回照金休整。“2月4日，敌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庙湾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照金芋园。红二团英勇抗击。敌人火力很强，眼看战士们一个个倒下，红二团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后路又被夏老么民团截断，危急之际，习仲勋、金天华、马志舟率领渭北游击队赶到，及时阻击夏老么部队，使红二团顺利地跳出合围”。<sup>⑳</sup>

2月7日，金天华向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呈报《关于陕甘边区及红二十六军情况的报告》。<sup>㉑</sup>

#### 成立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

渭北游击队恢复以后，除带领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外，还积极帮助各地建起了一些小游击队。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队的行动，决定建立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李平<sup>㉒</sup>为总指挥，金天华为政委<sup>㉓</sup>。

渭北工农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率领下辖的三个游击支队和各个小游击队、赤卫队，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多次与红二十六军协同作战，积极配合红二十六军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为发展渭北苏区和陕甘苏区做出了贡献。

4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政委汪锋、团长王世泰，红二十六军直辖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李奎、总指挥李妙哉，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政委锦天花，总指挥刘捷三等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华北；号召全陕甘、全中国民众积极行动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而战！<sup>㉔</sup>

#### 渭北游击队改编，渭北根据地失守

6月，杜衡命令红二团南下渭华，不幸兵败南山，全军覆没。为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7月24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

28日，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将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状况及其下属组织领导人姓名和活动时

点,全部供给国民党,并带领敌人到处捕人。敌方得知红二团在南山失败,立即于8月间调集了六个团以上的兵力,对渭北革命根据地中心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进行第二次“围剿”,逮捕大批共产党、革命群众,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遭破坏,书记赵伯平等入遭敌逮捕。红四团撤离渭北,进入照金苏区。

渭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sup>⑤</sup>。也使习仲勋与金天华的革命友谊更加纯洁牢固。

渭北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根据杜衡的供词<sup>⑥</sup>,在西安城楼张榜悬赏通缉金天华和黄子文、黄子祥等一批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黄子文连夜派人给金天华送来一封鸡毛信(信上插着三根鸡毛,表示十分紧急)。信上说国民党正四处搜捕他,让他接信后立即撤离,回甘肃搞兵运工作。金天华接到信时正值半夜时分,为躲避国民党追捕,来不及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一一告别,立即动身返回家乡,自此离开了曾经生活、战斗的那片热土,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习仲勋。

#### 习仲勋对金天华的关怀

直到全国解放后,习仲勋与金天华才重新见面。此时,他们相互分离已19年。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战斗烈火浇铸而成的革命友谊却历久弥新,更加纯洁。

金天华回到甘肃后,在家乡榆中金崖村发展了魏贤存、祁良东、金耀轸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开展甘肃兵运工作秘密积蓄力量。

1933年12月,金天华在国民党新一军第十一旅一团与冯世光(任连长)一起从事兵运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冯世光的指示,金天华进入西北公路管理局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之后,按照冯世光“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指示,直至1948年中共皋榆工委建立后,金天华才与组织接上头。不久,金天华调任华亭县安口镇公路段,中共皋榆工委将他的关系转到中共平东工委。按照平东工

委安排,他主要从事地下工作。

1949年6月,华亭县安口镇解放,金天华任华亭县安口镇军管会副主任。1950年1月,任甘肃省华亭县法院副院长。

1951年冬,金天华专程赴西安去看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久别重逢,恍如隔世,两位战友紧紧拥抱,久久不肯松手。

当刚刚拉开话匣后,秘书进来说:“习书记,接见外宾时间到了。”习仲勋回头对金天华说:“我去见一下外宾,你等我。”他边说边甩下披着的黑色旧棉袄,换上中山装,仔细扣好风纪扣,匆匆走了。约一小时后,习仲勋回到办公室,一进门,就脱下中山装,披上棉袄。他笑着对金天华说:“老金,我还是穿这个舒服,穿中山装就跟穿盔甲似的。”

接着习仲勋和金天华相互询问对方这些年的经历,回顾渭北战斗的风雨,缅怀牺牲的战友,憧憬祖国美好未来。千言万语,表达不完的是别后的思念和对理想的追求。

195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级党员干部大会召开,习仲勋提议时任华亭县法院副院长的金天华列席大会,目的是要他多熟悉党的“三反”政策。会议开了三天,习仲勋作了《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开展资产阶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报告。会议期间,由于个别领导针对反官僚、反贪污、反浪费等问题说了一些不当言词,有位代表误以为是习书记的意思,就在会上给习书记提意见,言词很激烈。金天华听后很生气,几次想站起来驳斥,但他瞅了瞅习书记端坐在主席台上认真听那位代表发言,不时做笔记,就暂时把想要说的话咽下去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习仲勋在总结发言时却说:“有些同志话说错了,批评是应该的。话虽不是我说的,但我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西北局主要领导。”习书记讲完话后,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掌声,代表们无不对习仲勋宽阔的胸怀,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所感动,那位给习书记提意见的代表也惭愧地低下了头。

西北局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习仲勋与金天华等一起去易俗社看戏,当晚演出的是秦腔。戏演到一半,习仲勋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因听不懂秦

腔,随口评论说:“这是啥戏嘛,太难听了。”习仲勋听后回答说:“这个戏西北的老百姓最爱听,只要是老百姓喜欢的戏就是好戏。你以后慢慢会听懂的。”

第二天,习仲勋与部分代表参观西安民族手工业产品展览会,当走到小脚女人鞋柜前时,习仲勋的表情立刻变得凝重了,他对展馆工作人员说,“这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毒,目前市场虽有需要,但我们一定要根除它。否则,中国人民就无法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外国人也会瞧不起我们。我的意见可以卖,但不公开展示为好,到底对不对,请你们考虑决定。”

这是金天华最后一次与习仲勋见面。

1952年习仲勋调中央工作之前,推荐金天华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经建班学习,希望进一步提高他的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学习期间,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张治中、马明芳、赵伯平等人为金天华亲笔题词,鼓励他克服困难,努力学习。金天华毕业后任青藏公路工程局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任交通部公路总局(西安)第五工程局工程队队长。1956年二次进藏,任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五工程局二处第十一工程队队长。自1952年以后,他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藏,远隔千里,无缘相见。

1964年,《西北红军战史》编写组到兰州,经甘肃省委书记汪锋推荐,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邀请,金天华参加了编写《西北红军战史》的编写工作。直到这时他才得知习仲勋因所谓的“刘志丹小说案”正在接受审查。金天华当即向汪锋提出要去北京看望习仲勋,要向党中央证明习仲勋绝不会反党。汪锋知道金天华说的是心里话,但自己毕竟对党内的事要比金天华了解得更多,对产生的后果更清楚。于是,他劝告说:“我们都了解习仲勋,知道他绝不会反党。但眼下,西北根据地的革命历史问题已经够复杂的了。你去北京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给习仲勋带来更大的麻烦。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希望你三思而行。”

文革期间,金天华被污蔑为习仲勋黑干将,遭受迫害,先关进“牛棚”,又下放农村,反复批斗、游

街,饱受摧残。1968年的一天,家中突然来了两个习仲勋专案组成员,气势汹汹地对金天华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你认识习仲勋吗?”金天华一听口气,就知道来意,他没好气地说:“不认识!”其中一个专案组成员说:“我们现在有充分证据证明你认识习仲勋,你在渭北时就和习仲勋在一起,怎么说不认识?习仲勋是反党分子,你必须揭发他的反党罪行。”金天华说:“我们那时才十八、九岁,就知道参加共产党是为了解放穷苦百姓,解放全中国,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说习仲勋反党,毛主席应该早就知道,解放后怎么还让他当副总理?”那两个人无话可答,扭头走了。之后,他们到公社革委会,说金天华对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不尊重,反动透顶。第二天,公社便召开大会批斗了金天华。

金天华在农村期间,虽然遭受严重迫害,但都挺过来了。他每当遇到困难时,习仲勋就像一面镜子,时不时呈现在面前。习仲勋坚定的革命信念,宽阔的政治胸怀,求实的思想作风,深厚的群众基础,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不断激励着金天华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磨难。他经常给子女们说,你习伯伯说过:“共产党还比较年青,正在成长阶段,难免会犯错误,我们要相信共产党终究会拨乱反正。比起那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我们能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已经是很幸运了。”以此鼓励自己和家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底,金天华和儿子到北京去找交通部申诉冤情,儿子说:“咱们来一次北京不容易,找习伯伯证明一下你的历史吧。”金天华却说:“我和你习伯伯是生死之交,我们分离快30年了,我怎么不想见他呢?他为革命做出那么大牺牲和贡献,却被冤枉了整整16年,现在刚刚恢复工作,有许多重要工作等他去做,我的这点事算什么。他也很不容易,我们就再不要牵连人家,给他添麻烦了。”

1982年,在习仲勋和汪锋亲自关怀下,金天华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得以平反,并光荣离休。

1983年4月,金天华临逝世前嘱咐子女的

是：“你习伯伯做人特别谦虚，朴实，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与老百姓一样。你们要以他为榜样做人做事。如果有机会，代我去看看他。”

注：

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②孙铭章：武字区游击大队大队长

③黄子文：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渭北总队第一支队副队长，1947年在同敌人作战中壮烈牺牲

④《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3页

⑤马志舟：渭北游击队队长，1933年7月，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虎沟，全歼张德润民团，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⑥《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⑦《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486页

⑧《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04页。《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三原县组织史资料》（1925年12月—1987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7页）

⑨《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⑩《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7页

⑪《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07页

⑫《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⑬《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1页

⑭《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⑮《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第419页

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⑰《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页，黄罗斌：“对渭北苏区的一点回忆”

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⑲《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1页

⑳《王世泰回忆录》第74页，《渭北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㉒李平，又名刘捷三，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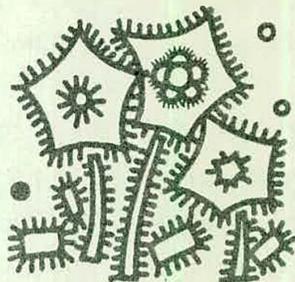
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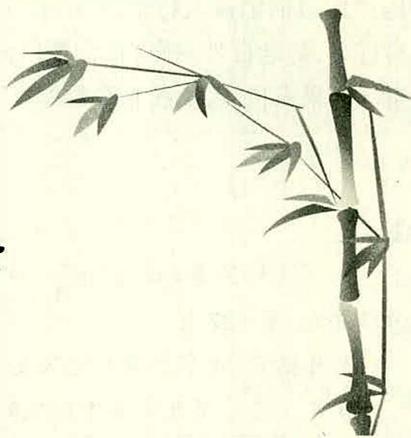
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㉕《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19页

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页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特聘专家魏其荣先生多次订正修改，特此致谢！）





## 清代隐士阎佩璋

常登成 赵永全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高台地处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塞，曾经演绎过无数壮怀激烈的历史篇章。那些人，那些事，都曾给高台这块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贫瘠的土地增添了浓墨重彩。张骞、霍去病、王维、沈青崖、徐家瑞、钱昌绪、董振堂、杨克明……但这些都只是高台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已，在他们的光环之外，由于地处偏远，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高台更多的是经济凋敝，政局更迭混乱，文化荒寒。

翻阅现存几个版本的《高台县志》，白兆庆、阎相师、阎御璋的名字进入眼帘的时候，眼前为之一亮，但在内心不免还是有些失落，在那个年代里，似乎高台永远都只是个武人争锋的蛮荒之地。终于，还是在民国十年徐家瑞编的《新纂高台县志》中读到了一首清新的诗：

灵岩洞壑绝尘嚣，鸟道峻嶒翠嶽高。  
山带夕阳烘古木，水从幽涧入晴皋。  
无穷胜概谱新韵，不尽风光著彩毫。  
底事仙人今已矣，乘时行乐醉琼醪。

县志里艺文卷中这首《题峡中鹑鸽仙洞》的诗，让人不胜感慨，本以为高台这个塞外黄沙、大漠孤烟的地方，在古代多的是响马匪盗、民族纷争、野汉刁民、军阀混战。但这首诗，绝决尘嚣的诗情画意，竟是出自清代高台镇夷石峡的一个隐士之笔，夕阳古木下，灵岩洞壑之中，坐在幽幽深涧旁，听着淙淙流水，时而有鸟飞过，此情此景，三杯琼醪下肚，充满了无限的惬意。这个隐士就是阎佩

璋。

仔细一看，在《新纂高台县志》艺文卷诗歌部分不多的篇幅中，阎佩璋的诗就录了八首，慢慢咀嚼，似有王维山水诗的神韵，又有陶渊明田园诗的纯朴自然。阎佩璋让古代高台这片在自身文化上显得有些荒芜的土地，沾染了淡淡的文化气息，只是他久久的被埋藏于这几卷厚厚的县志当中，随着岁月的流逝，阎佩璋这个名字和他的诗文也渐渐的被世人遗忘，久久的尘封在地方史志典籍里，人们恐怕就连这一点点淡淡的文化气息都快嗅不到了。

甘肃提督阎相师这个名字，高台人人皆知。他的大儿子阎御璋，中过武举，镇夷堡人蒋佩兰曾为其立传，说他“少精锐，赋气豪迈，不与凡儿伍”，戎马一生，最终卒于任所。阎佩璋，就是阎相师的第二个儿子，生于清朝乾隆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54年，字鸣玉，号梅溪。他“幼习文，能诗工书”，八岁时，父亲阎相师去世，“以家世武风，辞师改武”，老师说他“质之近文”，不忍心让他弃文从武，但他最终还是入武庠。在校场上，教官认为阎佩璋骑马射箭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其他人做得不标准的地方，都让阎佩璋给他们做示范。阎佩璋骑马射箭虽然很出色，但是连续考了两次试都不第，就对科举心灰意冷，毅然放弃科考，回家侍奉母亲张太夫人，县志记载，他对寡母“服劳奉养，恪尽子职，依依膝下者四十余年”。母亲去世，他耗尽家财为母下葬，使得家里一贫如洗。有人劝说，让他靠着死去父亲阎相师的名声再去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富贵，可阎佩璋说：“母亲去世后茶饭都不

思了,如今我已父母双亡,即使是再富贵又能怎样呢?”于是就下定决心不问世事、不求功名富贵。

母亲刚刚去世,可能让他暂时无法摆脱四十余年和母亲在一起时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快乐时光,走在父亲阎相师留下的这座大宅子里,每每触景生情,伤心不已,为了排遣内心的思念与忧伤,弱水流沙、峡谷寺院、郊野山洞成了他经常游走的地方。

峰峦杂处聚悲噪,怪石丛中锁乱蒿。  
地僻尚疑逢瘴疠,涧深犹恐涉波涛。  
一轮淡月秋风冷,万垒沙山旅雁高。  
最是荒凉惟北塞,据鞍应惜马蹄劳。

这首《秋夜过截沙》里所描绘的诗人,在秋天的夜晚,策马狂奔于镇夷口外山里的怪石乱蒿丛中,远处不时发出凄惨的悲噪之声,地僻涧深、孤月冷风、雁阵南飞,满目的荒凉,让诗人勒马驻足,“最是荒凉惟北塞”,失去亲人的痛苦越发涌上心头,一发而不可收拾。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母亲去世之后的悲痛心情渐渐舒缓过来以后,生活中的一切,已让他了无牵挂,耕田之余,读书、吟诗、喝酒成了他自娱自乐的方式。大有陶渊明“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风范。他开始津津乐道、悠然自得于凭高览物、踏雪探幽、寻仙问道的隐士生活。从《题洄澜寺山洞》和《谒香山寺中峰》两首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忘却尘世、置身荒野,流连于古洞寺院,寻仙访道的逍遥自在情形。

古洞连云锁峻崖,翠峦高耸绝尘埃。  
药炉岁远无烟火,石鼎年深砌翠台。  
流水一溪瑶草秀,香风几树碧桃开。  
月明五夜箫声近,道士仙人骑鹤来。

——《题洄澜寺山洞》

梵宇凌高岫,登临色相空。  
岩前青霭合,槛外碧流通。

法雨飞时妙,天花散处红。  
仙缘何处是?应在此山中。

——《谒香山寺中峰》

镇夷峡周围的村野水流,古洞山峦,成了他寄情山水的绝妙场所,我们已经看不到“最是荒凉惟北塞”这样的场景了,相反,诗人满眼都是香风秀草、青霭碧流、翠峦峻崖,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成了他的人生仙境。此时诗人纯朴的眼里,看不到一点点的凡尘琐事,他更向往法雨天花、仙人骑鹤,所以他感觉到他的仙缘“应在此山中”吧。地方志记载他“晚年尤好静”,当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于是就在道光年间,大概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在距镇夷西北十里许,石峡祖茔侧,找了一块如武陵桃源的地方,修建了一座结构精巧的茅草屋,名曰“晚翠山房”。如果以前他还过着半隐居生活的话,可能从建好“晚翠山房”以后,他就或许再也不问世事了。住进“晚翠山房”的心情可以从他那首《北峡祖茔新筑山房偶成一律》中读出。

峰峦秀处耸山房,卷雨飞云过曲廊。  
四面桐阴遮石壁,几群翠羽集雕梁。  
渔矶有钓凭溪引,浊酒无羹对客尝。  
几费匠心成别墅,流莺解语也歌觞。

茅屋建在峰峦之间,四面是高大的梧桐环绕,静看云飞雨过,偶尔有燕子落在梁上,诗人置身画中,与世无争、怡然自乐,或垂钓于溪边,或备几杯浊酒与客对饮,就连鸟儿也高兴的来歌唱助兴,神然一派恬静的隐士之风。周边的一草一木,都从他的笔下超凡脱俗的自然流露出来,不含一点俗尘杂念,饱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烂漫春光老,凭高览物华。  
楼边飞宿雁,槛外暗晴霞。  
芳草汀洲绿,银辉柳陌沙。  
何期飘六出,四野尽飞花。

——《暮春西城楼野望遇雪》

北塞生奇卉，芬芳榴艾边。  
旖旎秦汉地，烂漫伊凉天。  
不问何人种，休将岁月传。  
漫云无国色，十瓣共相连。

——《咏达碗花》

这时的诗人已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没有柴米油盐的牢骚，没有悲天悯人的困惑，没有怨天尤人的感叹，没有追名逐利的执迷，没有生老病死的恐慌。而且他还时常到镇夷堡附近的香山寺里，和一个八十一岁姓韩的酒泉籍老道人谈经论道。《访香山寺韩道》一诗正是他们一起交流炼丹修道、谈吐心声的真实写照。

问偈西岩下，行来万虑除。  
重峦当葦户，弱水绕蓬庐。  
云气生丹灶，花香馥道书。  
青牛与白鹤，送我过郊墟。  
羽客栖山寺，仙踪任步趋。  
乍来疑瘦岛，久坐似方壶。  
法演天花落，经谈水月孤。  
黄庭才一卷，顿觉出迷途。  
跨鹤来西域，飘然憩碧山。  
重楼临世界，方丈隔尘寰。  
鸟集花千树，风回水一湾。  
仙缘如可结，明岁更跻攀。

正是他这种常年累月修身养性达到的无欲无为、清心寡欲的至高境界，使得他“出迷途”、“万虑除”，进而去自由自在地忘情山水、寻仙访道。他能活到八十六岁，除了有少年习武的根基之外，修身养性、纵情山水恐怕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吧。

县志中还记载他著有《梅溪诗集》四卷“藏于家”，这可能是高台几千年历史当中，本地文人最早著有的一本诗集，但现在已然无处找寻，只留下了一个书名，那“晚翠山房”也一样在劫难逃，清同治十二年，被流匪白彦虎焚毁，“遗址犹存，结茅牵萝，差堪容膝”，这些都让人倍感唏嘘。

《天城志》里朱耀祖撰有《清代天城的四位诗

人》一文，将阎佩璋列在了第一位，并录了清代举人孙君揆作的《阎公梅溪像赞》一诗，总结其一生。

太公古心复古貌，梅溪逸人乃其号。  
生平嗜善兼嗜文，文经武略窥蕴奥。  
行仲继美桓肃公，燕桂芬芳饰紫诰。  
愤世不知老将至，晚向烟霞坚笑傲。  
诗书长留晚翠堂，神行官止全清操。  
我瞻德容宛如生，言笑不闻心中悼。

在此，我更想用儒家的一句经典“穷则独善其身”来概括他的一生，虽然科举考试让他对仕途绝望，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以他那纯真自然的乐观心态，用手中的笔，将家乡的一山一水以诗的方式，存留在了高台本土文化的史册里，濡养了高台那一点点淡淡的乡土文化气息，就如那千古不息的弱水一般，长流至今，哺育着高台人民。

(作者单位：高台县志办)





## 岷州遗风

潘硕珍

### (一)生鞋

根据《民俗常识》一书介绍：“靺鞨是在农村下层满族劳动人民中较为常见的一种鞋，人们多在冬季时穿用。这种鞋一般是由牛皮或猪皮缝制而成，其内絮有靺鞨草，此鞋轻便暖和，非常适合在冬季跑冰、狩猎时穿用。”《西游记》写作乌喇鞋，金盾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注释为牛皮靴子，这个注释是不恰当的。岷县人叫靺鞨为生鞋，没有腰子，连鞋带都是细皮条充当的。夏秋多雨季节，牛倌、羊倌头戴草帽，身披蓑衣，脚穿用牛皮或猪皮缝制的生鞋，脚窝里垫有青稞草或者燕麦草。冬天进山割柴或者打猎的人，也穿生鞋，鞋掌上还绑有铁匠用熟铁打制的鞋爪，在冰上行走时不易滑倒。进山人在冬季穿生鞋要比球鞋暖和。穿生鞋之前，要在凉水盆里浸泡一天一夜，等软和后再垫草。青海汉民叫生鞋为“挖泥皮鞋”，撒拉族人叫做“脚码子”：“系一种防滑鞋。为撒拉人过去在冬季野外劳动时所穿。此鞋用牛皮做成，鞋底横插两根铁条，连在脚面，横铁周围钉几根铁钉，形似当今的运动跑鞋。这种鞋一般在过去出外搞副业拉木时常穿，以免在冰封大地季节劳作时滑倒。”（《青藏高原的呼唤》，王志艳主编）

### (二)服饰

岷州卫和洮州卫是同时修建的。明朝政府为教化这两个地方的土著居民，曾迁徙江苏、山东、陕西等地居民长期定居。“这里人民至今保留着明

代江淮地区高髻银饰、凤头宫鞋的遗风和传统的集市旧俗……”（《洮州卫城》，《洮州文学》2011年第1期）“水乡的妇女对头发的梳理与装饰非常重视，她们习惯将乌黑的头发梳成硕大的发髻，并在其上点缀许多饰品，还有的佩戴精美的包头。水乡妇女的服饰极具地方特色，随季节改变，根据年龄差异以及礼仪的需要，其服饰还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一般来讲，春秋季节的服饰上装多以拼接衫为主，在面料选择上常将土布、花布及深浅士林布作为主要的基调，色彩对比鲜明，但鲜而不艳，艳而不俗。”“水乡妇女常穿的拼裆裤基本是用白地蓝印花布或是蓝地白印花布做成，裤裆以黑色或蓝色阴丹士林布拼接而成。之所以出现这些拼接的服装，最初是受布幅的限制及从省料的角度考虑……”“水乡地区的鞋，地方特色也很浓厚。当地的鞋一般呈小船形状，没有左右之分，因此得名船形绣花鞋。鞋面多绣花，色彩十分鲜艳，且花样繁多。”（周晓孟沈智主编《民俗常识》）

### (三)狗头帽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岷县部分地区（东南部）的小孩戴一种名叫狗头帽的帽子：黑布面子和白布里子中间夹一层棉花，缝成狗头状，再于“狗头”上钉上弹簧，拴有花瓣、小鸟、蝴蝶、珠子、银佛爷等装饰品；“狗耳朵”上要么悬挂红色或黄色流苏，要么悬挂响声清脆的银铃铛。《甘肃民间民俗美术》一书写道：“流行于苗族地区的狗头冠，在宕昌

大河坎一带藏族中很流行。这里已婚女性，均戴这种帽子。一般用黑布缝成，帽顶有两耳，垂飘带。”沈从文“用一句湘西话说：‘米(美)’极了！”(王锦慧《我来凤凰看望你——沈从文故乡感怀》，《党建》2013年第1期)古代岷州，肯定来过湘西苗民。岷县文斗乡一带人，也是将美说成“米”。

#### (四)火镰

《民俗常识》一书提到蒙古族和藏族男子腰间都佩带小刀和火镰等饰物。“腰后别的火镰和小刀、左边挂的荷包和烟袋是每个唐古特(青海藏民)男人必备的饰用品。”(《青藏高原的呼唤》，王志艳主编)羌族学者杨光成这样描述羌族风俗：“羌人崇拜白石是因远古羌人用白石取火成功……现金边远山区的羌人仍以白石取火，身带火镰刀。火镰刀用银皮包裹，上嵌玛瑙，成了珍贵的艺术品。”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岷县的老汉喜欢在在上衣底下穿类似于马甲的缠腰，布腰带上绑着火镰和皮革缝制的旱烟袋，同时还别着2尺左右长的旱烟锅。

#### (五)褡裢

八戒道：“不好了！我们都装进褡裢里了！”(《西游记》第二十五回)褡裢：长方形的口袋，开口在中央，两边各成为一个袋子。小的可装钱物，挂在腰带上，大的可搭在肩上。《红楼梦》第一回里，丢失爱女又在丈人家受气的甄士隐，为疯跛道人的《好了歌》作了注解，得到肯定后，“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第十二回里，这个跛足道人又出现在病入膏肓的贾瑞面前，从褡裢里掏出了一面神奇的“风月宝鉴”。我见到的褡裢属于后者，是用麻布缝制的，岷地人叫做捎马儿。上世纪80年代以前，每年隆冬天气，从外地来的男人们结伴进入“柴门闻犬吠”的村庄，他们每人的肩膀上搭着麻布褡裢，两手捅进袖口里，腋窝下夹着一头磨损的木棍，出张家进李家，念过二十四节气歌，张开褡裢口，迎接掌面柜的家庭主妇挖出来的面粉。他们点头表示感谢，不忘了从绽开棉花的棉衣怀抱里掏出一张仅有32开大的红笺，是雕版印刷的农历，掌柜的用烧得半生不熟的洋芋当糰子，把它郑重地贴在

卧室墙壁上，好安排农业生产。再说，春官将装满褡裢的面粉糰给沿途缺面吃的人家，变成钞票揣进腰包里，继续说春。贾平凹笔下的柳子言是给人踏勘坟地的风水师，他的吃饭家伙——罗盘就装进褡裢里，“柳子言耸耸肩上的褡裢，将鞋壳里垫脚沙石倒掉……”(美穴地))

褡裢是出门人装干粮的生活用具，“走哩走哩者越走越远了，褡裢里的锅盔轻下了，心上的愁肠就重下了……”(《六盘山令>)前些年，乡下人进城买零碎的时候，总要扛上褡裢。眉户剧《张连卖布》里的张连就有这样的行头：“陕西省，长安县，一个老汉没事干。背着褡裢城隍庙里去游转。”

#### (六)跟营

在古代，“城”和“市”是分开的。“城”指城墙以内供人们生活的区域，“市”指交换商品的场所，设在城里。高中二年级历史(选修1)写道：“北魏的洛阳，城西有大市，市内有钟鼓，开市、散市都以击鼓为号。”岷州见于西魏大统十年(544年)，在该政权版图内，应该沿袭北魏“开市、散市都以击鼓为号”的传统习俗。宋朝时，城市中“坊”、“市”的界限被打破，旧时日中为市的经营时间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岷县城的商业出现早市、夜市，也应该远推到北宋。宋神宗时，王韶从吐蕃手中收复岷州，开始改造岷州城的建筑面貌。

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农村交通便利的镇子形成定期开放的小市。草市历史悠久，东晋时就有了，隋唐时期已相当普遍。北方人叫草市为赶集，湘、赣、闽、粤等省区叫赶圩。临潭人和岷县人把去县城赶集叫做跟营、逢营。洪武年间，明朝大将马烨、沐英分别营建岷州卫、洮州卫(卫址在今临潭新城)。因为商业活动在军营进行，所以把到卫城赶集叫做跟营。当时规定每月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岷县学者刘光裕考证说：“原先以初一、十五为期，一月两次。协镇吕天玉令以逢一为期，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一月三次。清末直到改革开放前以一、六为期。”20世纪90年代以前，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大“营”，初六、十六、二十六为小“营”。旧时的岷县城有“二十大营(实为腊月二十一)抢画儿呢”的说法。

岷县学者王贵俭在《马坞拾遗》一书中也说：“马坞的集市，出现于唐，盛行于宋，明代马坞的集市已是岷州六大市场之一，清代增加为十处，马坞市场最活跃，每月一、六日为逢集。现改为一、四、七为集。”

### (七)吃斋

在我的故乡，老人去世的第三天，要出纸，即把冲天纸悬挂在大门外，孝子们戴孝举哀，也叫成服礼。出过纸后，乡亲们才肯光临丧家，来者自来，去者自去，所谓“不迎不送送丧家礼”。院子里，房子里，出来进去的人摩肩接踵，说明这家人活世好，维的人多。“经”丧事的人们，干完自家的农活、家务活，或独自，或呼朋引伴，踏进了贴挽联的大门。他们在总管的安排下，有给事主家担水的，打墓床的，帮厨的，招待前来吃斋的亲戚们。闲暇时，随便找个地方坐下，用旧报纸卷“大炮”放烟幕。年轻人们提起灵堂里的丧棒打孝子，用拷出来的“孝心”到大队代销铺买来的双羊烟，每个男人散发一支。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生活困难，事主家给帮忙的人、伴丧事的人，一天只做两顿洋芋下白面条；阴阳先生享受的待遇是：炒一碟菜，拾一盘斋馒头，放一瓶105散酒。晚上，点过夜纸后，少部分人已经回家了，厨房里才提出几竹笼煮熟的洋芋，分放在人们扎堆的地方，一抢而空。害怕洋芋麻嘴，又拿来几块青稞面糕子（类似现在的锅贴），每人只能分到手心大的一点。

吃斋本是儒家的讲究。老人去世了，孝子们得穿粗衣，吃粗食，停沐浴，不休整面容。“粗食”就是粥。故乡人正式吃斋是出殡那天。斋饭是用大燕麦粉的珍籽和洋芋丁焖的珍籽饭，大家坐在从学校借来的课桌、长板凳上就餐。筷子是用扎扫帚的细竹竿截切成的。找不到座位的吃斋人，就随便蹲在院子不挡道的地方。佛教徒也讲究吃斋。《西游记》第十九回：“我们是行脚僧，遇庄化饭，逢处求斋。”此处的“斋”是素食。只有携带礼品的人，才能吃上斋饭。乡亲们带的礼品，大多是在竹笼里摆一把手擀面条，上面盖几张土灰色烧纸，因此，乡亲们把吃斋又叫做烧纸。经长组织善男子们坐在土炕上念佛经，“吃斋人，不念佛，枉活一世。”吃斋人似乎

还要到经堂里念几声佛词儿，至少要搭个佛号，算是积德行善。死者若为女性，一定要念《十月怀胎》。不拿礼物的人，站在院子里，或者大门外，伸长胳膊抢吃总管扔出去的斋馒头。“斋”的另一曾意思是施舍斋饭与僧人。《西游记》第九十六回：“西方乃佛家之地，真个有斋僧的。此间既是府县，不必照验关文，我们去化写斋吃了，就好走路。”

1997年3月，祖母去世后，我去奔丧。斋饭由珍籽饭变成了焖大米稀饭。给穷人施舍斋馒头的习俗荡然无存了。最近两年，生活质量提高了，风俗习惯也大变样了。过去没有的祭猪或祭羊摆在灵堂门口了。斋饭由素变成了荤，从出纸开始就吃斋，四扣四炒全上，晚饭是臊子面，夜餐是炒菜和白面花卷。根据《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的记述，“祭品方面，一品至三品是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为特豕，八品以下为豚肩……庶人蕪（即野草莓）果蔬新物，每案不过四器。”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人的做法是越礼行为。吃斋的人，买的礼物是写有“音容宛在”、“德高望重”、“瑶池添座”字样的挽帐、整箱辣酒或者一扎啤酒等。他们坐在帐篷底下的席位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抽着一包4元以上的香烟，幸福的感觉袅袅升上蓝天。

### 瞎瞎

《实用汉字字典》对鼯鼠解释如下：“动物名。体矮胖，尾很短，无耳壳，眼很小。前肢爪特别长大，用以掘土。体一般呈淡粉红褐色或赤褐色，栖居在草原地区和田间，以植物的根、地下茎和嫩芽为食，对农作物有害。”鼯鼠不同于老鼠，一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中，它就瞎摸起来（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中，夏家老二夏天礼，连续生了四个儿子，名字依次为庆金、庆玉、庆满、庆堂，想再生一个女儿，结果事与愿违，第五个儿子的眼睛特别小，就取名瞎瞎）。瞎瞎的头圆，嘴巴不像老鼠那么尖，倒是两颗门牙标榜着它的个性。每年惊蛰过后，土地解冻，瞎瞎开始打洞，寻吃草根。岷县民间流传着一首套子花儿，叫做《扎角儿》，其中有几句是：“变个瞎瞎打个洞，一晚夕打了丈五深，两晚夕打到炕棱跟，趴住炕棱问一声，你朵脑疼么肚子疼？”

捉瞎瞎的办法是用弓箭安。这种动物打的洞

穴贴近地表,安瞎瞎的人,用撅头挖开洞穴,由鼻子和门牙留下的痕迹正确判断瞎瞎的走向,安上拉成满月似的木弓,堵上洞门,才悄悄离去。混饱肚皮的瞎瞎打道回府,发觉道路已被泥土堵塞,本能地用嘴去拱,结果顶发了弓,那枝看不见的竹箭就从后背穿胸而过,定格在潮湿的洞穴里。和我同龄的四叔,在村庄里安瞎瞎出了名。我不过是他的跟班儿,因此目睹了他从安到加工瞎瞎的全过程。拔掉皮毛,掏去内脏,洗净血水,用四跟长短不一的竹棍将瞎瞎的尸体撑成长方形,再给它加两条对角线,放在屉笼里蒸熟。刷上清油的瞎瞎,黄亮的色泽让人直流口水。瞎瞎的肉不多,图的就是稀罕,就是它的香。有人吃熟瞎瞎,像猫吃老鼠那样,连骨带肉,咯吧脆响。大概因为瞎瞎吃了庄稼的根,人们吃起瞎瞎来,才如此痛快淋漓。据岷县学者景生魁介绍,“瞎瞎性温,有散风止痛、疏瘀活络的特效,可代替虎骨入药。”(《岷县的“老字号”小吃》)撕光肉掏尽脑髓的瞎瞎头骨,可以当哨子吹,儿童们叫做瞎瞎响响儿。谁的脖子里挂有这种玩具,那是值得炫耀的。爱人讲了一个市井故事:两个泼妇骂街,一个双手掐腰,摆出盛气凌人的姿态,以为能把对方唬住,另一个正色骂道,“你那姿势活像一个瞎瞎响响儿,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那个女人红着脸,立马放下双手,钻进自家门里,

任人家怎么辱骂,都不露脸。

麦苗长到一拃高的时候,弓箭手们便停止了狩猎活动,据说这时候的瞎瞎体内有虫,就不能吃了。

岷县人和漳县人不但爱吃瞎瞎肉,而且形成了与瞎瞎有关的民俗活动——瞎瞎会。张大鹏在《牛蹄山神韵》中写道:“相传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九天圣母的诞辰。届时,除山上庙中杀鸡宰羊献猪,攒神三天三夜外,四路八乡的山民们把早已安排好,蒸熟熏干的瞎瞎用笼或筐装带来参加盛会。这就是所谓一年一度的三月三牛蹄山‘瞎瞎会’。”牛蹄山在岷县梅川镇境内。无独有偶,漳县金钟文学社的李效真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金钟乡大石门村的瞎瞎会从农历三月十七日开始,十九日达到高潮,二十日结束。白天和夜里都唱秦腔。那里的瞎瞎会时间比牛蹄山瞎瞎会略迟,恐怕只能从气候状况来推测。

岷县学者刘光裕还记述了瞎瞎肉的另外一种吃法:岷县西寨镇三三洞过会这一天,当地人将剥掉皮子,掏光内脏的瞎瞎用斧头背砸成肉泥(使人容易联想到古代的一种酷刑——醢,更能体现岷县人对瞎瞎深恶痛绝的态度),加上调料当馅包扁食。(参阅《三研斋随笔》)

(作者单位:甘肃岷县二中)



## 《水经注》选登

编者按：《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郦道元所著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全书共30多万字，较为详实地介绍了中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现将《水经注》中有关甘肃的部分内容摘录，供参考。

### 卷二 河水

……(河水)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

河水右径沙州北。段国曰：洮河西南百七十里黄沙，沙南北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于乾糒于地，都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地理志》曰：汉宣帝神爵二年，置河关县，盖取河之关塞也。《风俗通》曰：百里曰同，总名为县。县，玄也，首也，从系倒首，举首易偏矣。言当玄静，平谣役也。《释名》又曰：县，悬也，悬于郡矣。黄义仲《十三州记》曰：县，弦也，弦以贞直，言下体之居，邻民之位，不轻其誓，施绳用法，不曲如弦，弦声近县，故以取名，今系字在半也。汉高帝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张晏曰：令各自筑其城也。河水又东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东北，济川水注之，水西南出濫渎，东北流入大谷，谓之大谷水，北径洮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径洮河故城北，有二城东西角倚，东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洮河公，即此城也。河水又东北径黄川城，河水又东径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昔段颎击羌于石城，投河坠坑而死者八百余人，即于此也。河水又东北径黄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东北径广违城北，右合乌头川水，水发远川，引纳枝津，北径城东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径邠川城南，城之左右，历谷有二水，导自北山，南径邠亭，注于河。河水又东，临津溪水注之，水自南山，北径临津城西而北流，注于

河。河水又东径临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为缘河济渡之处。魏凉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塞于白土，即此处矣。河水又东，左会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下，东南流径白土城北，又东南注于河。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远望嵒嵒，若攒图之诤霄上。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栖托焉。故《秦川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导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谓之唐述水。河水又东得野亭南，又东北流，历研川，谓之研川水，又东北注于河，谓之野亭口。河水又东历凤林北。凤林，山名也。五峦俱峙。耆彦云：昔有凤鸟，飞游五峰，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记》曰：枹罕原北名凤林川，川中则黄河东流也。河水又东与漓水合，水导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东北流，历野虏中，径消铜城西，又东北径列城东。考《地说》无目，盖出自戎方矣。左合列水，水出西北溪，东北流径列城北，右入漓水，城居二水之会也。漓水又北径可石狐城西，西戎之名也。又东

北,右合黑城溪水,水出西北山下,东南流径黑城南,又东南,枝水左出焉。又东南入滴水,滴水又东北径榆城东,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细越西北山下,东南流径细越川,夷俗乡名也。又东南出狄周峡,东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东北径黑城东,东北注之榆溪,又东南径榆城南,东北注滴水。滴水又东北径石门口,山高险峻绝,对岸若门,故峡得厥名矣。疑即皋兰山门也。汉武帝元狩三年,骠骑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谓是山之关塞也。应劭《汉书音义》曰:皋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关名也。今是山去河不远,故论者疑目河山之间矣。滴水又东北,皋兰山水自山左右翼注滴水。滴水又东,白石川水注之,水出县西北山下,东南流,枝津东注焉。白石川水又南径白石城西而注滴水。滴水又东径白石县故城南,王莽更曰顺砾。阚骞曰:白石县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滴水径其北。今滴水径其南,而不出其北也。滴水又东径白石山北,应劭曰:白石山在东。罗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山下,东入滴水。滴水又东,左合罕开南溪水。水出罕开西,东南流径罕开南注之。《十三州志》曰:广大阪枹罕西北,罕开在焉。昔慕容吐谷浑自燕历阴山西驰,而创居于此。滴水又东枹罕县故城南,应劭曰:故枹罕侯邑也。《十三州志》曰:枹罕县在郡西二百一十里,滴水在城南门前东过也。滴水又东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东北流径金纽大岭北,又东北径一故城南,又东北与北水会。北源自西南径故城北,右入南水。乱流东北注滴水。滴水又东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东径白石城北,又东绝罕开溪,又东径枹罕城南,又东入滴水,滴水又东北出峡,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滴水出白石县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河水又径左南城,《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东径赤岸北,即河夹岸也。《秦州记》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东,洮水注之。《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州记》曰:洮水与垫江水俱出嶺台山,山南即垫江源,山东则洮水源。《山海经》曰:白水出蜀。郭景

纯《注》云:从临洮之西倾山东南流入汉,而至垫江,故段国以为垫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嶺台、西倾之异名也。洮水东北流,径吐谷浑中。吐谷浑者,始是东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为首类之种号也,故谓之野虏。自洮嶺南北三百里中,地草遍是龙须,而无樵柴。洮水又东北流径洮阳曾城北,《沙州记》曰:嶺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城临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临洮,上遣行车骑将军马防与长水校尉耿恭救之,诸羌退聚洮阳,即此城也。洮水又东径洪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水又东径迷和城北,羌名也。又东径甘枳亭,历望曲,在临洮西南,去龙桑城二百里。洮水又东径临洮县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见长人,受《黑玉书》于斯水上。洮水又东北流,屈而径索西城。建初二年,马防、耿恭从五溪祥犸谷出索西,与羌战,破之,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居之,俗名赤水城,亦曰临洮东城也。《沙州记》曰:从东洮至西洮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径龙桑城西而西北流。马防以建初二年,从安故五溪出龙桑,开通旧路者也。俗名龙城。洮水又西北径步和亭东,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东北流出山,径步和亭北,东北注洮水。洮水又北出门峡,历求厥川,葦川水注之,水出桑岚西溪,东流历桑岚川,又东径葦川北,东入洮水。洮水又北历峡,径偏桥,出夷始梁,右合葦垵川水。水东南出石底横下,北历葦垵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东北径桑城东,又北会蓝川水。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东北流径蓝川,历桑城北,东入洮水。洮水又北径外羌城西,又北径和博城东,城在山内,左合和博川水。水出城西南山下,东北径和博城南,东北注于洮水。洮水北径安故县故城西,《地理志》,陇西之属县也。《十三州志》曰:县在郡南四十七里,盖延转击狄道安故五溪反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径狄道故城西,阚骞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流。又北,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濫水也。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径陇坻,其山岸崩落者,声闻数百里。故扬雄称响若抵颡是也。又西北历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东有白石山,濫水又西北径武街城南,又西北径狄道故城东。《百官表》曰:县有蛮夷谓之

道,公主所食曰邑。应劭曰:反舌左衽,不与华同,须有译言,乃通也。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应劭曰:有陇坻在其东,故曰陇西也。《神仙传》曰:封君达,陇西人,服炼水银,年百岁,视之如年三十许,骑青牛,故号青牛道士。王莽更郡县之名,郡曰厌戎,县曰操虏也。昔马援为陇西太守六年,为狄道开渠,引水种秔稻,而郡中乐业,即此水也。湟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乱流,径金纽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地理志》,王莽之顺夏。《晋书·地道记》曰:县西有禹庙,禹所出也。又东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带三水,乱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东入河是也。

#### 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

金城郡治也。汉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为修远县。河水径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东径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盐池北,故阾駟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湟水又东南流径龙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临羌新县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纳西零之献,以为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东南径卑禾羌海北,有盐池。阾駟曰:县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东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东流径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范曄《后汉书》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为匈奴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弱者南入山,从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后汉西羌传》曰:羌无弋爱剑者,秦厉公时,以奴隶亡入三河,羌怪为神,推以为豪。河、湟之间多禽兽,以射猎为事,遂见敬信,依者甚众,其曾孙忍,因留湟中,为湟中羌也。湟水又东,右控四水,导源四溪,东北流注于湟。湟水又东径赤城北,而东入经戎峡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径护羌城东,故护羌校尉治,又东北径临羌城西,东北流,注于湟。湟水又东径临羌县故城北,汉武帝元封元年,以封孙都为侯国,王莽之监羌也。谓之绥戎城,非也。湟水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

川,东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东径临羌新县故城南。阾駟曰:临羌新县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径城南也。城有东、西门,西北隅有子城。湟水又东,右合溜溪、伏溜、石柱、蠡四川,东北流注之。左会临羌溪水,水发新县西北,东南流,历县北,东南入湟水。湟水又东,龙驹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东北流径龙驹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东,长宁川水注之,水出松山,东南流径晋昌城,晋昌川水注之。长宁水又东南,养女川水注之。水发养女北山,有二源,皆长湍远发,南总一川,径养女山,谓之养女川。阾駟曰:长宁亭北有养女岭,即浩亶山,西平之北山也。乱流出峡,南径长宁亭东,城有东、西门,东北隅有金城,在西平西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远矣。长宁水又东南与一水合,水出西山,东南流,水南山上,有风伯祠,春秋祭之。其水东南径长宁亭南,东入长宁水。长宁水又东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东,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远山,东北流,径牛心堆东,又北径西平亭西,东北入湟水。湟水又东径西平城北,东城,即故亭也。汉景帝六年,封陇西太守北地公孙浑邪为侯国。魏黄初中,立西平郡,凭倚故亭,增筑南、西、北三城以为郡治。湟水又东径土楼南,楼北依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楼下有神祠,雕墙故壁存焉。阾駟曰:西平亭北有土楼神祠者也。今在亭东北五里。右则五泉注之,泉发西平亭北,雁次相缀,东北流至土楼南,北入湟水。湟水又东,右合葱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乱流注于湟。湟水又东径东亭北,东出漆峡,山峡也。东流,右则漆谷常溪注之,左则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东,安夷川水注之,水发远山,西北流,控引众川,北屈径安夷城西北,东入湟水。湟水又东径安夷县故城,城有东、西门,在西平亭东七十里。阾駟曰四十里。湟水又东,左合宜春水。水出东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入湟水。湟水又东,勒且溪水注之。水出县东南勒且溪,北流径安夷城东,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号也。阾駟曰:金城河初与浩亶河合,又与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东,左则承流谷水南入,右会达扶东、西二溪水,参差北注,乱流东出,期顿、鸡谷二水北流注之。又东,吐那狐、长门两川,南流入

湟水。六山，名也。湟水又东径乐都城南，东流，右合来谷、乞斤二水，左会阳非、流溪、细谷三水，东径破羌县故城南。应劭曰：汉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门。《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门前东过。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东南径小晋兴城北，故都尉治。阚骠曰：允吾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湟水又东与阁门河合，即浩襄河也。出西塞外，东入塞，径敦煌、酒泉、张掖南，东南径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又东南与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岭下，东源发于白岸谷，合为一川。东南流至雾山，注阁门河。阁门河又东径养女北山东南，左合南流川水，水出北山，南流入于阁门河。阁门河又东径浩襄县故城南，王莽改曰兴武矣。阚骠曰：浩，读阁也。故亦曰阁门水，两兼其称矣。又东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襄水东至允吾入湟水。湟水又东径允吾县北为郑伯津，与洴水合，水出令居县西北塞外，南流径其县故城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虏也。又南径永登亭西，历黑石谷南流，注郑伯津。湟水又东径允吾县故城南，汉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远亭也。县有龙泉，出允吾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龙，或试挠破之，寻平成龙。畜生将饮者，皆畏避而走，谓之龙泉，下入湟水。湟水又东径枝阳县，逆水注之。水出允吾县之参街谷，东南流径街亭城南，又东南径阳非亭北，又东南径广武城西，故广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无戴，于此处也。城之西南二十许里，水西有马蹄谷。汉武帝闻大宛有天马，遣李广利伐之，始得此马，有角为奇。故汉武帝《天马之歌》曰：天马来兮历无草，径千里兮循东道。胡马感北风之思，遂顿羸绝绊，骧首而驰，晨发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长鸣而去，因名其处曰候马亭。今晋昌郡南及广武马蹄谷盘石上，马迹若践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号曰天马径，夷人在边效刻，是有大小之迹，体状不同，视之便别。逆水又东径枝阳县故城南，东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东，至枝阳入湟。湟水又东流，注于金城河，即积石之黄河也。阚骠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也。释氏《西域记》曰：牢兰海东伏龙沙堆，在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干鲜卑山。东流至金城为大河。

河出昆仑，昆仑即阿耨达山也。河水又东径石城南，谓之石城津。阚骠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东南径金城县故城北。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汉书集注》薛瓌云：金者，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鯀作城。《风俗通》曰：城，盛也，从土成声。《管子》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阨。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门。东流，有梁泉注之，出县之南山。按著旧言：梁晖，字始娥，汉大将军梁冀后，冀诛，入羌。后其祖父为羌所推，为渠帅而居此城。土荒民乱，晖将移居枹罕，出顿此山，为群羌围迫，无水，晖以所执榆鞭竖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涌出，榆木成林。其水自县北流注于河也。

#### 又东过榆中县北，

昔蒙恬为秦北逐戎人，开榆中之地。按《地理志》，金城郡之属县也。故徐广《史记音义》曰：榆中在金城，即阮嗣宗《劝进文》所谓榆中以南者也。

#### 又东过天水北界，

苑川水出勇士县之子城南山，东北流，历此成川，世谓之子城川。又北径牧师苑，故汉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万余人，到襄武、首阳、平襄、勇士，抄此苑马，焚烧亭驿，即此处也。又曰：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河也。

#### 又东北过武威媪围县南，

河水径其界东北流，县西南有泉源，东径其县南，又东北入河也。

#### 又东北过天水勇士县北，

《地理志》曰：满福也，属国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纪德。有水出县西，世谓之二十八渡水。东北流，溪涧萦曲，途出其中，径二十八渡，行者勤于溯涉，故因名焉。北径其县而下注河。又有赤晔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径赤晔川，又北径牛官川。又北径义城西北，北流历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

#### 又东北过安定北界麦田山，

河水东北流，径安定祖厉县故城西北。汉武帝元鼎三年，幸雍，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即于

此也。王莽更名之曰乡礼也。李斐曰：音赖。又东北，祖厉川水注之，水出祖厉南山，北流径祖厉县而西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城西，又北与麦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东北径麦田山西谷，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

……

## 卷十七 渭水

### 渭水出陇西首阳县渭谷亭南鸟鼠山，

渭水出首阳县首阳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此县有高城岭，岭上有城，号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东北流径首阳县西与别源合，水南出鸟鼠山渭水谷，《尚书·禹贡》所谓渭出鸟鼠者也。《地说》曰：鸟鼠山，同穴之枝干也。渭水出其中，东北过同穴枝间，既言其过，明非一山也。又东北流而会于殊源也。渭水东南流，径首阳县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广相溪水，次东得共谷水，左则天马溪水，次南则伯阳谷水，并参差翼注，乱流东南出矣。

### 东北过襄武县北，

广阳水出西山，二源合注，共成一川，东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南径襄武县东北，荆头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鸟鼠山荆谷，东北径襄武县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汉护羌校尉温序行部，为隗嚣部将苟宇所拘，衔须自刎处也。其水东北流注于渭。渭水常若东南，不东北也。又东，泉水注之，水出西南雀富谷，东北径襄武县南，东北流入于渭。《魏志》称：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见，身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单衣巾，拄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十二月天禄永终，历数在晋。遂迁魏而事晋。

### 又东过獠道县南，

右则岑溪水，次则同水，俱左注之，次则过水右注之。渭水又东南径獠道县故城西，昔秦孝公西斩戎之獠王，应劭曰：獠，戎邑也。汉灵帝中平五年，别为南安郡，赤亭水出郡之东山赤谷，西流径城北，南入渭水。渭水又径城南得粟水，水出西南安都谷，东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新兴川水出西南鸟鼠山，二源合舍，东北流与彰川合，水出西南溪下，东北至彰县南，本属故道候尉治，后汉县之，永元

元年，和帝封耿秉为侯国也。万年川水出南山，东北流注之，又东北注新兴川，又东北径新兴县北，《晋书·地道记》，南安之属县也。其水又东北与南川水合，水出西南山下，东北合北水，又东北注于渭水。渭水又东径武城县西，武城川水入焉。津源所导，出鹿部西山，两源合注，东北流径鹿部南，亦谓之鹿部水。又东北，昌丘水出西南丘下，东北注武城水，乱流东北注渭水。渭水又东入武阳川，又有关城川水出南，安城谷水出北，两川参差注渭水。渭水又东，有落门西山东流三谷水注之，三川统一，东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门聚，昔冯异攻落门，未拔而薨。建武十年，来歙又攻之，擒隗嚣子纯，陇右平。渭水自落门东至黑水峡，左右六水夹注：左则武阳溪水，次东得上门谷水，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则温谷水，次东有故城溪水，次东有闾里溪水，亦名习溪水，次东有黑水，并出南山，北流入渭。渭水又东出黑水峡，历冀川。

### 又东过冀县北，

渭水自黑水峡至岑峡，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则温谷水，导平襄县南山温溪，东北流径平襄县故城南，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谓平相矣。其水东南流，历三堆南，又东流南屈，历黄槐川，梗津渠，冬则辍流，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次则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长铎谷水，次东有安蒲溪水，次东有衣谷水，并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击自鸣，鸣则兵起。汉成帝鸿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鸣，声隐隐如雷，有顷止，闻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鸡皆鸣，石长丈三尺，广厚略等。著崖胁，去地百余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鸣则有兵。是岁广汉钳子攻死囚，盗库兵，略吏民，衣绣衣，自号为仙君，党与漫广，明年冬伏诛，自归者三千余人。信而有征矣。其水北径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镇戎，县曰冀治。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汉阳郡，城，即隗嚣称西伯所居也。后汉马超之围冀也，凉州别驾阎伯儉潜出水中，将告急夏侯渊，为超所擒，令告城无救，伯儉曰：大军方至，咸称万岁。超怒数之。伯儉曰：卿欲令长者出不义之言乎？遂杀之。渭水又东合冀水，水出冀谷。次东有浊谷水，次东有当里溪水，次东

有托里水,次东有渠谷水,次东有黄土川水,俱出南山,北径冀城东,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出岑峡,入新阳川,径新阳下城南,溪谷、赤蒿二水并出南山,东北入渭水。渭水又东与新阳崖水合,即陇水也,东北出陇山。其水西流右径瓦亭南,隗嚣闻略阳陷,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亭也。一水亦出陇山,东南流历瓦亭北,又西南合为一水,谓之瓦亭川。西南流径清宾溪北,又西南与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径黑城西,西南流,莫吾南川水注之,水东北出陇垂,西南流历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悬镜峡,又西南入瓦亭水。又有潞水,自西来会,世谓之鹿角口。又南径阿阳县故城东,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侵陇右,汉阳长史盖勋屯阿阳以拒贼,即此城也。其水又南与燕无水合,水源延发东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会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径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径成纪县,故帝大岷、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为天水郡,县,王莽之阿阳郡治也。又东,潜源隐发,通入成纪水,东南入瓦亭水。瓦亭水又东南,与受渠水相会,水东出大陇山,西径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流,历僵人峡,路侧岩上有死人僵尸穴,故岫壑取名焉。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唯无肤发而已。访其川居之士,云其乡中父老作童儿时,已闻其长旧传,此当是数百年骸矣。其水又西南与略阳川水合,水出陇山香谷西,西流,右则单溪西注,左则阁川水入焉。其水又西历蒲池郊,石鲁水出东南石鲁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历略阳川,西得破社谷水,次西得平相谷水,又西得金里谷水,又西得南室水,又西得蹄谷水,并出南山,北流于略阳城东,扬波北注川水。又西径略阳道故城北,壅渠水出南山,北径壅峡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将来歙与祭遵所部护军王忠、右辅将军朱宠,将二千人,皆持卤刀斧,自安民县之杨城。元始二年,成帝罢安定漣沱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从番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至略阳,夜袭击器拒守将金梁等,皆杀之,因保其城。隗嚣闻略阳陷,悉众以攻歙,激水灌城,

光武亲将救之,器走西城,世祖与来歙会于此。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盖器所竭以灌略阳也。川水西得白杨泉,又西得蒲谷水,又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龙尾溪水,与蒲谷水合,俱出南山,飞清北入川水。川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东导陇山,西径水洛亭,西南流,又得犍奴水口,水出陇山,西径犍奴川,又西径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乱流西南径石门峡,谓之石门水,西南注略阳川。略阳川水又西北流入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出显亲峡,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娲祠,庖羲之后有帝女娲焉,与神农为三皇矣。其水南流注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径显亲县故城东南,汉封大鸿胪窋固为侯国。自石宕次得虾蟆溪水,次得金黑水,又得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参差相入瓦亭水。又东南合安夷川口,水源东出胡谷,西北流历夷水川,与东阳川水会,谓之取阳交。又西得何宕川水,又西得罗汉水,并自东北、西南注夷水,夷水又西径显亲县南,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东南得大华谷水。又东南得折里溪水,又东得六谷水,皆出近溪湍峡,注瓦亭水。又东南出新阳峡,崖岫壁立,水出其间,谓之新阳崖水,又东南注于渭也。

#### 又东过上邽县,

渭水东历县北邽山之阴,流径固岭东北,东南流,兰渠川水出自北山,带佩众溪,南流注于渭。渭水东南与神涧水合,《开山图》所谓灵泉池也,俗名之为万石湾,渊深不测,实为灵异,先后漫游者,多罹其毙。渭水又东南得历泉水,水北出历泉溪,东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南出桥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涧声流,总成一川,东历当亭川,即当亭县治也。左则当亭水,右则曾席水注之。又东与大弁川水合,水出西山,二源合注,东历大弁川,东南流注于藉水。藉水又东南流与竹岭水合,水出南山竹岭,二源同泻,东北入籍水。藉水又东北径上邽县,左佩四水,东会占溪水,次东有大鲁谷水,次东得小鲁谷水,次东有杨反谷水,咸自北山,流注藉水。藉水右带四水:竹岭东得乱石溪水,次东得木门谷水,次东得罗城溪水,次东得山谷水,皆导源南山,北流入籍水。藉水又东,黄瓜水注之,其水发源黄瓜西谷,东流径黄瓜县北,又东,清溪、白水

左右夹注，又东北，大旱谷水南出旱溪，历涧北流，泉溪委漾，同注黄瓜水。黄瓜水又东北历赤谷，咸归于藉。藉水又东得毛泉谷水，又东径上邽城南，得核泉水，并出南山，北流注于藉。藉水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径上邽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经》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谓是水也。藉水又东得阳谷水，又得宕谷水，并自南山，北入于藉。藉水又东合段溪水，水出西南马门溪，东北流合藉水。藉水又东入于渭。渭水又历桥亭南，而径绵诸县东，与东亭水合，亦谓之桥水也，清水又或为通称矣。水源东发小陇山，众川泻注，统成一水，西入东亭川为东亭水，与小祗、大祗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并出东南，差池泻注。又有埋蒲水，翼带二川，与延水并西南注东亭水。东亭水又西，右则叹沟水，次西得鞠谷水，水出东南，二溪西北流，注东亭川。东亭川水右则温谷水出小陇山，又西，莎谷水出南山莎溪，西南注东亭川水。东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水导源东北陇山，二源俱发，西南出陇口，合成一水，西南流历细野峡，径清池谷，又径清水县故城东，王莽之识睦县矣。其水西南合东亭川，自下亦通谓之清水矣。又径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秦水西径降陇县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陇山，合而西南流，径降陇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历陇川，径六盘口，过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又西，羌水注焉，水北出羌谷，引纳众流，合以成溪。漾水星会，谓之小羌水。西南流，左则长谷水西南注之，右则东部水东南入焉。羌水又南入清水。清水又西南得绵诸水口，其水导源西北绵诸溪，东南有长思水，北出长思溪，南入绵诸水。又东南历绵诸道故城北，东南入清水。清水东南注渭。渭水又东南合泾谷水，水

出西南径谷之山，东北流与横水合，水出东南横谷，西北径横水圻，又西北入泾谷水，乱流西北出泾谷峡，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其水北流注泾谷水。泾谷水又西北，白城溪东北流，白娥泉水出其西，东注白城水。白城水又东北入泾谷水，泾谷水又东北历董亭下，杨难当使兄子保宗镇董亭，即是亭也。其水东北流注于渭。《山海经》曰：泾谷之山，泾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渭是也。渭水又东，伯阳谷水入焉，水出刑马之山伯阳谷，北流，白水出东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阳水。伯阳水又西北历谷，引控群流，北注渭水。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马山，北历平作，西北径苗谷，屈而东径伯阳城南，谓之伯阳川，盖李耳西入，往径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渭水东南流，众川泻浪，雁次鸣注：左则伯阳东溪水注之，次东得望松水，次东得毛六溪水，次东得皮周谷水，次东得黄杜东溪水，出北山，南入渭水；其右则明谷水，次东得丘谷水，次东得丘谷东溪水，次东有钳岩谷水，并出南山，东北注渭。渭水又东南出石门，度小陇山，……

## 卷二十 漾水

**漾水出陇西氐道县蟠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

常璩《华阳国志》曰：汉水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县漾山为漾水，《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蟠冢山，会白水径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按沔水出东狼谷，径沮县入汉。《汉中记》曰：蟠冢以东，水皆东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势源流所归，故俗以蟠冢为分水岭。即此推沔水无西入之理。刘澄之云：有水从阿阳县南至梓潼，汉寿人大穴，暗通冈山。郭景纯亦言是矣。冈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泽而流与汉合。庾仲雍又言：汉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径至关城，合西汉水。故诸言汉者，多言西汉水至葭萌入汉。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经》云：漾水出氐道县，东至沮县为汉水，东南至广魏白水。诊其沿注，似与三说相符，而未极西汉之源矣。然东、西两川，俱受沔、汉之名

者,义或在兹矣。班固《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并言汉有二源,东出氐道,西出西县之蟠冢山。阚骃云: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又言,陇西西县,蟠冢山在西,西汉水所出,南入广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獬道,东至武都入汉。许慎、吕忱并言:漾水出陇西獬道,东至武都为汉水,不言氐道,然獬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诸川,无水南入,疑出獬道之为谬矣。又云:汉,漾也,东为沧浪水。《山海经》曰:蟠冢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江。然东、西两川,俱出蟠冢而同为汉水者也。孔安国曰:泉始出为漾,其犹濛耳。而常璩专为漾山、漾水,当是作者附而为山水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经》,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而南流注于丑涂之水。《穆天子传》曰:天子自春山西征,至于赤乌氏,己卯,北征;庚辰,济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人戏,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献良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赐之黄金之鹿,戏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从高祖北巡,狄人犹有此献。虽古今世殊,而所贡不异,然川流隐伏,卒难详照,地理潜闕,变通无方,复不可全言阚氏之非也。虽津流派别,枝渠势悬,原始要终,潜流或一,故俱受汉、漾之名,纳方土之称,是其有汉川、汉阳、广汉、汉寿之号,或因其始,或据其终,纵异名互见,犹为汉、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今西县蟠冢山,西汉水所导也,然微涓细注,若通霖历,津注而已。西流与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余里,谓之龙渊水,言神马出水,事同余吾,来渊之异,故因名焉。《开山图》曰: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谓之马池川,又西流入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流,左得兰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铁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并出南山,扬湍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黄花谷水,咸出北山,飞波南入。西汉水又西南,资水注之,水北出资川,导源四壑,南至资峡,总为一水,出峡西南流,注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得峡石水口,水出苑亭、西草、黑谷三溪,西南至峡石口,合为一漾。东南流,屈而南注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径西县故城北。秦

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大骆犬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年,世祖出阿阳,窦融等悉会,天水震动。隗嚣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广死,嚣愁穷城守。时颍川贼起,车驾东归,留吴汉、岑彭围嚣。岑等壅西谷水,以縑幔盛土为堤灌城,城未没丈余,水穿壅不行,地中数丈涌出,故城不坏。王元请蜀救至,汉等退还上邽。但广、廉字相状,后人因以人名名之,故习讹为杨廉也,置杨廉县焉。又东南流,右会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东北流径戎丘城南,吴汉之围西城,王捷登城向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将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刎颈而死。又东北流注西谷水,乱流东南入于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径始昌峡,《晋书·地道记》曰:天水,始昌县故西城也,亦曰清崖峡。西汉水又西南径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蟠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其水东南径宕备戍西,东南入汉水。汉水又西南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穷溪,北注汉水。又西南,兰皋水出西北五交谷,东南历祁山军,东南入汉水。汉水又西南径祁山军南,鸡水南出鸡谷,北径水南县,西北流注于汉。汉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导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东南,二源合注,东径建威城南,又东与兰坑水会,水出西南近溪,东北径兰坑城西,东北流注建安水。建安水又东径兰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县之历城也。杨定自陇右徙治历城,即此处也。去仇池百二十里,后改为建安城。其水又东合错水,水出错水戍东南,而东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东北,有雉尾谷水;又东北,有太谷水;又北,有小祁山水。并出东溪,扬波西注。又北,左会胡谷水,水西出胡谷,东径金盘、历城二军北,军在水南层山上,其水又东注建安水。建安水又东北径塞峡,元嘉十九年,宋太祖遣龙骧将军裴方明伐杨难当,难当将妻子北奔,安西参军鲁尚期追出塞峡,即是峡矣。左山侧有石穴洞,人言潜通下辨,所未详也。其水出峡,西北流注汉水。汉水北,连山秀举,罗峰竞峙。祁山在蟠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

径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垒，垒之左右犹丰茂宿草，盖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众阜之中，亦非为杰矣。汉水又西南与甲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东北流注汉水。汉水又西径南岬、北岬中，上下有二城相对，左右坟垅低昂，亘山被阜。古谚云：南岬、北岬，万有余家。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汉水西南径武植戍南。武植戍水发北山，二源奇发，合于安民戍南，又南径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于汉水。汉水又西南径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径其戍西，南入汉水。汉水又西径兰仓城南，又南，右会两溪，俱出西山，东流注于汉水。张华《博物志》云：温水出鸟鼠山，下注汉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详也。汉水又南入嘉陵道而为嘉陵水。世俗名之为阶陵水，非也。汉水又东南得北谷水，又东南，得武街水，又东南得仓谷水。右三水，并出西溪，东流注汉水。汉水又东南径瞿堆西，又屈径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嵌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汉武帝元鼎六年，开以为武都郡，天池大泽在西，故以都为目矣。王莽更名乐平郡，县曰循虜。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顷，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马氏矣。汉献帝建安中，有天水氏杨腾者，世居陇右，为氏大帅，子驹，勇健多计，徙居仇池，魏拜为百顷氏王。汉水又东合洛谷水，水有二源，同注一壑，径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驯良，不为物毒。洛谷水又南径虎膺戍东，又南径仇池郡西，瞿堆东，西南入汉水。汉水又东合洛溪水，水北发洛谷，南径威武戍南，又西南与龙门水合，水出西北龙门谷，东流与横水会，东北穷溪，即水源也。又南径龙门戍东，又东南入洛溪水，又东南径上禄县故城西，修源浚导，径引北溪，南总两川，单流纳汉。汉水又东南径浊水城南，又东南会平乐水。水出武街东北四十五里，更驰南溪，导源东北流，山侧有甘泉涌波，飞清下注

平乐水。又径甘泉戍南，又东径平乐戍南，又东入汉，谓之会口。汉水东南径修城道南，与修水合，水总二源，东北合汉。汉水又东南于槃头郡南与浊水合，水出浊城北，东流，与丁令溪水会，其水北出丁令谷，南径武街城西，东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径武街城南，故下辨县治也。李瑄、李稚以氏王杨难敌妻死葬阴平，袭武街，为氏所杀于此矣。今广业郡治。浊水又东，宏休水注之，水出北溪，南径武街城东，而南流注于浊水。浊水又东径白石县南。《续汉书》曰：虞诩为武都太守，下辨东三十余里有峡，峡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辄溃溢，败坏城郭，诩使烧石，以醴灌之，石皆碎裂，因镌去焉，遂无泛滥之害。浊水即白水之异名也。浊水又东南，湫阳水北出湫谷，南径白石县东，而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与仇鸠水合，水发鸠溪，南径河池县故城西，王莽之乐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浊水。浊水又东南与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径河池戍东，西南入浊水。浊水又东南，两当水注之，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西南径故道城东，魏征仇池，筑以置戍，与马鞍山水合，水东出马鞍山，历谷西流，至故道城东，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山南，南流径唐仓城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历广香交，合广香川水，水出南田县利乔山，南流至广香川，谓之广香川水，又南注故道水，谓之广香交。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冈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云，远望增状，若岭纤曦轩，峰枉月驾矣。悬崖之侧，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图指状妇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圣女神，至于福应愆违，方俗是祈。水源北出利乔山，南径尚婆川，谓之尚婆水。历两当县之尚婆城南，魏故道郡治也。西南至秦冈山，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右会黄卢山水，水出西北天水郡黄卢山腹，历谷南流，交注故道水。故道水南入东益州之广业郡界，与沮水枝津合，谓之两当溪水，上承武都沮县之沮水渚，西南流，注于两当溪。虞诩为郡，漕谷市在沮，从沮县至下辨，山道险绝，水中多石，舟车不通，驴马负运，僦五致一。诩乃于沮受僦直，约自致之，即将吏民按行，皆烧石樵木，开漕船道，水运通利，岁省万计，以其僦廩与吏士，年

四十余万也。又西南注于浊水。浊水南径槃头郡东,而南合凤溪水,水上承浊水于广业郡,南径凤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阙,汉世有凤凰止焉,故谓之凤凰台。北去郡三里,水出台下,东南流,左注浊水。浊水又南注汉水。汉水又东南历汉曲,径挟崖与挟崖水合,水西出担潭交,东流入汉水。汉水又东,径武兴城南,又东南与北谷水合,水出武兴东北,而西南径武兴城北,谓之北谷水。南转径其城东,而南与一水合,水出东溪,西流注北谷水,又南流注汉水。汉水又西南径关城北,除水出西北除溪,东南流入于汉。汉水又西南径通谷,通谷水出东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为西汉水。汉水又西南,寒水注之,水东出寒川,西流入汉。汉水又西径石亭戍,广平水西出百顷川,东南流注汉,又有平阿水出东山,西流注汉水。汉水又径晋寿城西,而南合汉寿水,水源出东山,西径东晋寿故城南,而西南入于汉水也。

### 又东南至广魏白水西,又东南至葭萌县,东北与羌水合。

白水西北出于临洮县西南西倾山,水色白浊,东南流与黑水合,水出羌中,西南径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东径洛和城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东北流径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东南径邓至城南,又东南与大夷祝水合,水出夷祝城西南穷溪,北注夷水。又东北合羊洪水,水出东南羊溪,西北径夷祝城东,又西北流,屈而东北注于夷水,夷水又东北入白水。白水又东与安昌水会,水源发卫大西溪,东南径邓至、安昌郡南,又东南合无累水,无累水出东北近溪,西南入安昌水,安昌水又东南入白水。白水又东南入阴平,得东维水,水出西北维谷,东南径维城西,东南入白水。白水又东南径阴平道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虏矣,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又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东北径长松县北,而东北注白水。白水又东径阴平大城北,盖其渠帅自故城徙居也。白水又东,偃溪水出西南偃溪,东北流径偃城西,而东北流入白水。白水又东径偃城北,又东北径桥头,昔姜维之将还蜀也,雍州刺史诸葛绪邀之于此,后期不

及,故维得保剑阁而钟会不能入也。白水又与羌水合,自下羌水又得其通称矣。白水又东径郭公城南,昔郭淮之攻廖化于阴平也,筑之,故因名焉。白水又东,雍川水出西南雍溪。东北注白水。白水又东合空冷水,傍溪西南穷谷,即川源也。白水又东南与南五部水会,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东南流;东源出郎谷,西南合注白水。白水又东南径建昌郡东,而北与一水合,二源同注,共成一溪,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东南径白水县故城东,即白水郡治也。《经》云:汉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东南与西谷水相得,水出西溪,东流径白水城南,东南入白水。白水又南,左会东流水,东入极溪,便即水源也。白水又南径武兴城东,又东南,左得刺稽水口,溪东北出,便水源矣。白水又东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祁山来合白水。斯为孟浪也。水出于平武郡东北矚累亘下,南径平武城东,屈径其城南,又西历平洛郡东南,屈而南径南阳侨郡东北,又东南径新巴县东北,又东南径始平侨郡南,又东南径小剑戍北,西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张载铭》曰:一人守险,万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剑阁而叹曰:刘氏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小剑水西南出剑谷,东北流径其戍下入清水,清水又东南注白水。白水又东南于吐费城南,即西晋寿之东北也,东南流注汉水。西晋寿,即蜀王弟葭萌所封为苴侯邑,故遂名城为葭萌矣。刘备改曰汉寿;太康中又曰晋寿。水有津关。段元章善风角,弟子归,元章封笥药授之。曰:路有急难,开之。生到葭萌,从者与津吏诤,打伤。开笥得书言:其破头者,可以此药裹之。生乃叹服,还卒业焉。亦廉叔度抱父枢自沉处也。

……

## 卷四十 浙江水 斤江水

…… 汗山在扶风开县之西也,  
陇山、终南山、惇物山在扶风武功县西南也,  
西顷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  
《禹贡》中条山也。  
嶓冢山在陇西氏道县之南,  
南条山也。  
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

郑玄曰：鸟鼠之山，有鸟焉，与鼠飞行而处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鸟名为騶，似鷄而黄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处，鼠内而鸟外。孔安国曰：共为雌雄。杜彦达曰：同穴止宿，养子互相哺食，长大乃止。张晏言：不相为牝牡，故因以名山。

### 积石在陇西河关县西南，

《山海经》云：山在邓林东，河所入也。

### 都野泽在武威县东北，

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东北即休屠泽也。《古文》以为猪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径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王隐《晋书》曰：汉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内学，语弟子曰：凉州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条茂起学舍，筑阙于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门楼，与学阙相望。泉源徙发，重导于斯，故有灵渊之名也。泽水又东北流径马城东，城即休屠县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谓之马城河。又东北与横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凉州治。《地理风俗记》曰：汉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凉故也。迁于冀，晋徙治此。王隐《晋书》曰：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及张氏之世居也，又增筑四城箱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中城内作四时宫，随节游幸。并旧城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大辮官殿观阁，采绮妆饰，拟中夏也。其水侧城北流，注马城河。河水又东北，清涧水入焉，俗亦谓之五涧水也。水出姑臧城东，而西北流注马城河。河水又与长泉水合，水出姑臧东揆次县，王莽之播德也，西北历黄沙阜，而东北流注马城河。又东北径宣威县故城南，又东北径平泽、晏然二亭东，又东北径武威县故城东。汉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治，王莽更名张掖。《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俗谓之西海；一水又东径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矣。

合离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

合黎山也。

### 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

居延泽在其县故城东北，《尚书》所谓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与水流行也。亦言出钟山，西行极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两石相打，则水润，打之不已，润尽则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数丈，径日不灭。有大黑风，自流沙出，奄之乃灭，其石如初。言动火之事，发疾经年，故不敢轻近耳。流沙又径浮渚，历壑市之国。又径于鸟山之东，朝云国西，历昆山西南，出于过瀛之山。《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径夏后开之东，开上三嫫于天，得《九辩》与《九歌》焉。又历员丘不死山之西，入于南海。

### 三危山在燉煌县南，

《山海经》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圆百里，在鸟鼠山西，即《尚书》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也。《春秋传》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汉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鸣沙山，故亦曰沙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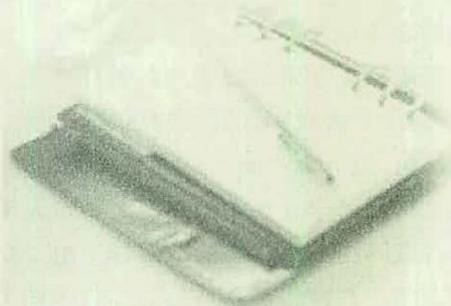
###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

即冀县山，有石鼓，《开山图》谓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则鸣，有常应。又云：石鼓山有石鼓，于星为河鼓，星动则石鼓鸣，石鼓鸣则秦土有殃。鸣浅殃万物，鸣深则殃君王矣。

###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汉书》以为湔山者也。

.....



##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2013年7月8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王三运书记、中央督导组王太华组长、省委组织部德刚部长讲话精神及《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在全省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安排部署省史志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落实工作。办党组书记、主任李虎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

会议指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大举措,符合党心民心、顺应群众期盼。王三运同志和王太华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要求具体,对于全省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

会议强调,省地方史志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精神,深刻认识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紧密结合地方志工作实际,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掀起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热潮。

会议决定,成立以李虎主任为组长,其他办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全办5个处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同志

参与具体工作。

会议要求,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统一部署,结合省史志办工作实际,尽快研究制定《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紧扣为民务实清廉主题,全面落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着力抓好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3个环节,有序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慵懒散漫、推诿扯皮、效率低下、消极应付、不作为、乱作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与党的群众路线不相适应的现象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把“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做精彩。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把教育实践活动与推进修志工作有机结合,把教育实践活动与“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紧密结合,以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工作,以地方志工作的更大成果来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确保年度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会上,办党组成员纷纷表示,中央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体现了我党一贯坚持群众路线、一贯重视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我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部署,紧密联系自身实际,认真参加教育实践活动,不折不扣地搞好各个环节的工作,带好头、作表率,既做好自身学习教育和检查改进,又抓好分管方面的工作,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 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第一次评审会议召开

6月21日,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以下简称“教育志”)评审会议在兰州召开。教育志顾问胡之德先生、胡德海先生、省史志办车安宁副主任、教育志编纂委副主任、兰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李贵富出席会议,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编委和编纂人员参加会议,省教育厅老领导李膺、王松山等提交了书面意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陈保平主持会议,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主编旦智塔介绍了编纂情况,与会专家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为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建言献策,这是教育志文稿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送审前教育系统召开的一次集体把关、提升质量的重要会议。

旦智塔全面回顾了教育志编纂8年的工作几个阶段始末和形成《评审稿》的过程,总结归纳了编纂体会,充分肯定了编纂人员的辛勤工作和艰苦劳动,感谢省史志办和专家、编委以及相关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同时指出编纂教育志是大事,应该对历史负责,对全省教育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对《评审稿》存在的差距、遗憾和欠缺提出了个人观点和看法。旦智塔表示,在教育史志研究领域我是个新兵,对教育史文本的编纂缺乏必要的学术修养和功底,我承担甘肃省教育续志的编纂主编,纯粹是工作岗位的原因,这几年通过学习阅读教育史志研究方面的著作,反复查阅我省教育史志的文献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为了避免导致编纂工作行政化倾向,我们邀请了全国教育史研究专家进行了培训和指导,认真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建议并参照和遵循编纂工作全过程。和上一轮教育志编纂工作客观条件相比,本志记述1987—2005年期间甘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史实,这一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各种数据齐全清晰,各种教育

资源逐渐完善和成熟,为教育志编纂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旦智塔特别强调,关于《教育续志》存在的质量问题不能回避,为了追求较高的水平和质量,才拖延到今天,但是离打造精品的目标差距仍然很大,主要表现在:文本仍然存在原始资料堆砌的痕迹明显;各章之间叙述风格存在差异;对不同阶段改革发展出台政策、执行政策、取得效果的过程跟踪性叙述不够。改革发展前后、新旧变化情况比较研究不够;对各个发展阶段的划分,国家宏观背景、甘肃中观省情特点,阶层微观发展变化等比较分析欠缺;人物记载录入比例过大;各章节资料来源单一(基本为教育年鉴的摘录);加之遵循与旧志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对志书结构缺乏大胆的创新和新的探索,志书的框架结构不尽科学合理的情况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名校、名校长、名师队伍未能凸显出来;缺乏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智力保障和贡献情况;特别是对后世具有借鉴价值的重大理论研究成果,重要的教育思想体系、重大的改革实践经验、重大的科研教研成果、重大的教学成果、重大的课程资源等方面梳理、归纳,提炼不够等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遗憾和缺陷。

旦智塔表示,今天的送审稿是全省教育工作者共同的创业成果和付出心血的结晶。我们继续努力的信心没有动摇,打造精品希望仍然没有放弃,对今天的会议期望值很高,在未付梓出版发行之前由史志权威专家参与教育志的编纂,提出宝贵意见作为最后一次难得的修改、完善、提高质量的机会,有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向甘肃教育人交一份优秀的答卷作最后的冲刺,也力争向更高的科研成果奖冲刺。真诚希望与会专家提出重大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真诚欢迎提出颠覆性的完

善补充的修订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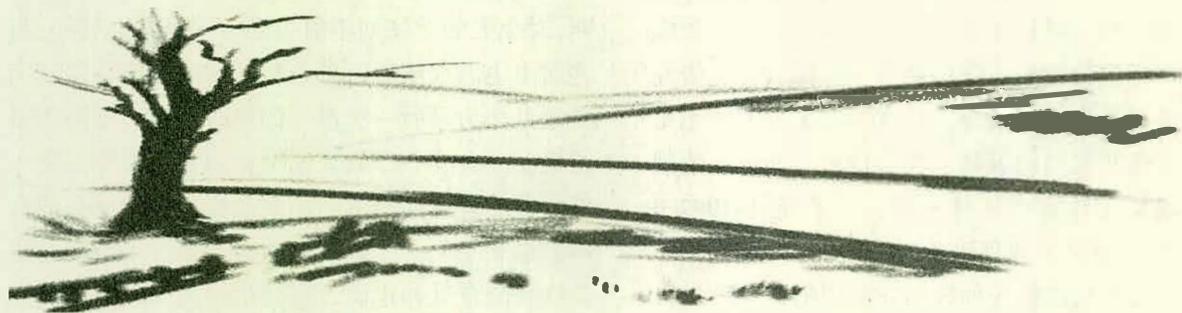
车安宁分析了全国、全省史志编纂工作进展情况,认为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要求编纂人员充分认识教育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大历史观整体把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贡献,科学修志,依法修志,定稿出版前还要广泛听取不同层面的意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确保志书的品位和质量。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评审稿),对整体编纂工作和志稿质量给予较高评价,并从不同层面、角度、环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希望加强和改进出版前最后的统稿把关,从而能够保持志书的完整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内容取舍要侧重全省性的事件、人物和节点,入志一定要有严格的标准、界限和范围。特别是对志稿的结构、体例、表述、图片、内容提出了大量的具体修改意见,要求编纂撰稿人员进一步斟酌、推敲、调整,努力做到框架清晰、行文规范、细节完美。

巨智塔最后提出五点建议和要求。一是鉴于本次会议缺席专家过多,与会人员和各方面对教育志(评审稿)提出的意见内容丰富,涉及方方面面,意见多修改量大,修改任务相当艰巨、繁重,建议将本次评审改为第一次评审会,对《评审稿》进行一次重大修改后再组织召开参会范围更广的第二次评审会。二是鉴于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有根有据,科学合理,对提升教育志整体质量针对性强,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要求省教育志编纂办公室要按照省志办、省教育厅和编委会的要求,严肃认真、全面系统、仔细具体的逐项逐条整理好各方

面征集反馈的意见和与会人员的建议,并将修改意见梳理、归纳、分类后,以书面形式提交各位撰稿人和各相关单位,各相关单位和具体撰稿人都要全面贯彻落实这次评审会议的精神和要求,重新认识和把握修志工作的职责权限,虚心听取并尽快消化评审会议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各自分工对志书内容做出修改完善,拾遗补缺、改错纠偏、不留遗憾,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第二轮《甘肃省志·教育志》。三是鉴于撰稿人员按本次会议建议修改完成以后,还有一系列重大修改任务需要完成,建议在此基础上重新组织一部分(10人以内)权威专家对《评审稿》进行集中通稿、修订和把关,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报酬。四是建议对撰稿人员是否署名、人物部分实录还是表录、资料来源是否保留、教育志文本编纂完成时间期限等重大问题向省教育厅主要领导汇报再确定。五是要加强与省志办沟通与协调,对修志规范性标准等相关问题加强请示汇报,争取有计划、有准备地筹备召开第二次评审会、复审会和终审会。

陈保平指出,这部志稿是撰稿人辛勤努力的结果,是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教育系统集体智慧的结晶,希望编纂委员会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凝心聚力,再接再厉,不辱使命,做好这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历史文化工程,鉴往知今,以志育人,认真挖掘和提炼近二十年积淀的经验,全面梳理和总结近二十年形成的思路,为行政决策提供历史借鉴,为科学研究提供可靠资料,为事业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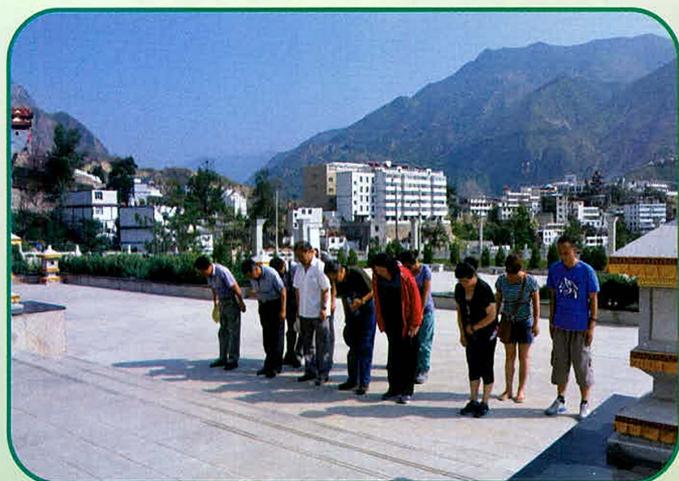
# 省史志办组织《救灾重建志》部分篇章牵头单位主要撰稿人赴舟曲实地调研考察



为方便编纂人员实地了解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相关情况，亲身感受感知灾后重建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进一步提高《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编纂质量，8月14日-17日，省史志办组织《救灾重建志》7个篇章牵头单位的17位撰稿人赴舟曲县实地调研考察。

调研组通过实地查看三眼峪、罗家峪等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重灾区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环境整治工程、受灾群众安置住房和峰迭新区等重建项目，对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的成因、灾情灾害从感性上有了进一步认识，对灾后重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有了切身感受。在舟曲县政府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省直各牵头单位在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的基础上，对各篇章编写进程中遇到的疑难困惑及缺失的资料与舟曲县直各供稿单位进行了直接交流沟通，研究讨论了进一步提供资料的重点和具体做法。

通过实地考察，各牵头单位撰稿人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认识，深感收获颇丰，进一步坚定了做好《救灾重建志》编纂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高峰  
摄影作品



青海湖塔林



冶力关秋色



居延海



丁香韵